

越地春秋

目录

特 载

- 2 突出转型升级 致力科学发展
——2011年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推进发展纪事(一)

党史纵横

- 7 绍兴县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
——中共绍兴县一大/木 羽

志鉴论坛

- 11 绍兴后马周氏《典礼志》解读/吕 山

专题研究

- 18 陆游一脉在齐贤/孙伟良
24 《蔡元培全集》对联补录考/邓政阳
40 黄琢山不在越城内/娄如松
43 拯救南半截胡同和绍兴会馆/王 滔 王 迁

百年辛亥

- 47 辛亥前后绍兴人的兴农活动/蔡 彦
50 徐锡麟创办热诚学堂和大通学堂始末/陆 杨
54 辛亥革命前夕绍兴新式学堂兴起成因初探/董思思

补遗订讹

- 59 《中国家谱总目》所载山阴安昌娄氏宗谱资料正误
/娄仲安
61 对宋人凌景夏的几点考证/凌基强

山会人物

- 62 李慈铭年谱(续七)/傅振照
90 刘宠散论/钱茂竹
95 王羲之与会稽/余德余
106 张岱与项里/闻 雁
109 近代科学教育先驱杜亚泉/黄 斌
118 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民族英雄——姚长子/应志铨



2012年第1期

总第38期

主 办

绍兴县史志办公室

绍兴县史志学会

主 编：何鸣雷

副主编：徐炳荣
陈飞燕

编 辑：孙 羽
宋如玲 陆 杨
郑文燕 韩兰芳
韩 英 董思思

地 址：柯桥寺岔96号

邮 编：312030

电 话：0575-85561398

传 真：0575-85561395

E-mail: sxxshizhi@126.com

网 址：www.sxxszb.com.cn

制作印刷：绍兴县报印务有限公司

出刊时间：2012年2月29日

突出转型升级 致力科学发展

——2011年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推进发展纪事(一)

编者按：2011年，是绍兴县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年来，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突出转型升级、致力科学发展”工作主题，大力推进经济、城乡、社会转型升级，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现将2011年县委、县政府重要决策和重大部署梳理总结，以为存史、以备资政。

一、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突出转变发展方式，围绕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整体推进轻纺城提升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现代农业、加大产业投资、加强要素保障等工作重点，多措并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1月21日，县委召开十二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中共绍兴县委关于制定绍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会议提出，按照“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现代农业”总体思路，强化产业提升和规划落地，

重抓经济结构优化和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致力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上取得新突破。

2月12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出，重抓发展载体，加快工业转型升级，重点启动实施纺织产业“4个千亿”计划、优势产业“5个500亿”计划和新兴产业“金种子”计划。

2月19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建筑业发展大会。会议指出，建筑业企业要强化创新意识、机遇意识、争先意识，加快转型升级。

3月1日，市委书记张金如到县调研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走访浙江宝业住宅产业公司、浙江精功科技有限公司，指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3月11日，县委县政府专题召开推进政府性投资项目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实施“325”重大项目建设计划，明确2011年全年实施政府性投资项目373个、当年目标完成投资65亿元，充分发挥投资项目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3月1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钱建民到县专题调研，走访延锋伟世通怡东汽车仪表公司、厦门金龙汽车绍兴分公司、精功科技有限公司，强调要坚持转型发展、集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抓住有利机遇，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3月17日，县领导出席滨海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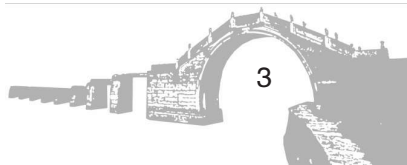
区5个总投资超22亿元的新能源、住宅产业化、新型建材、装备制造和高档面料项目的奠基仪式，这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又一力作。

3月17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产业投资暨招商选资动员大会。会议提出2011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0亿元，其中工业投资200亿元、现代服务业（含政府性投资）投资165亿元、农业投资5亿元，力争在引进20亿元以上或5000万美元以上的新兴（优势）产业项目上有新突破。

3月18日，绍兴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网上轻纺城”主题新闻发布会，宣布斥资20亿元建设“网上轻纺城”，打造纺织业B2B航母，有效实现有形市场和网上市场互动发展，加快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和轻纺城提升发展。

3月29日至30日，2011中国职业时装设计师创意设计大赛启动仪式暨2011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2011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启动仪式暨柯桥·中国轻纺城推介会先后在北京举行，推动创意与产业无缝对接，塑造柯桥流行面料风尚策源地的行业地位，促进柯桥纺织企业改善相对薄弱的研发能力和营销机制，提升柯桥的时尚话语权和创意文化内涵。

3月31日，“名校大院”绍兴县技术转移中心在柯桥创意大厦正式启动，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西安工程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5所院校入驻，进一步完善县



域科技创新体系，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4月11日，全球纺织网总部正式迁址柯桥，实现中国轻纺城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联动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中国轻纺城，加快绍兴县纺织产业集群升级。

4月12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何加顺调研全县旅游工作，指出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旅游业是优化三次产业的需要，是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要系统谋划，加快形成以鉴湖—柯岩旅游度假区为“一核”，安昌古镇和齐贤羊山旅游圈、南部山区休闲旅游圈为“两圈”的规划设计，精心谋划各景点规划，抓好与旅游相配套的各类专项规划。

4月20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何加顺调研中国轻纺城，指出中国轻纺城是全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要围绕打造国际性纺织制造中心、贸易中心和创意中心，着力提升市场整体品位，加快推进“二次创业”。

4月21日，由国家发改委、中国工程院等组织的“循环经济院士·专家行”调研组到县调研。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涌等十多位专家，先后到国家循环经济产业园区试点单位——滨海工业区及部分印染企业调研，为绍兴县循环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4月28日，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转型升级的若干政策意见》，要

求提升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致力推进创新发展、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做强做大建筑产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表彰发展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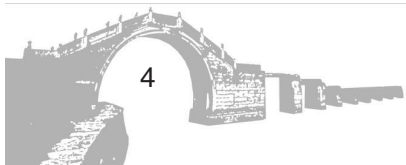
4月28日，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提升发展现代农业的实施意见》，确定要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培育提升农业精品基地、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积极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等为发展导向，加快农业转型升级。

4月28日，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决定在加大产业投资力度、加强龙头企业培育、强化发展要素保障、健全服务支撑体系等方面制定相应优惠政策，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5月6日至7日，2011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面辅料（春季）博览会、2011中国职业时装设计师与面料企业零距离对接会先后在绍兴县举行，为广大客商提供高质量交流沟通平台。

5月10日，县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农业产业生态布局、大力发展节约型农业、实施生产全程清洁生产、推进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开展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工程建设、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制定相应保障措施。

5月12日，副省长毛光烈一行到县调研工业经济和科技工作，高度评价绍兴县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



快转型升级做法，希望绍兴县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引进和培育一批高素质科技人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狠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不断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推动工业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

5月19日，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施意见》，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全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5月21日至31日，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何加顺为团长的绍兴县招商引资（智）代表团，对加拿大温哥华、美国圣地亚哥和洛杉矶等地进行友好访问，在美国圣地亚哥市组织开展绍兴县赴美创新人才引进和科技项目对接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6月17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到县调研，先后考察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宝业住宅产业化有限公司、浙江杭一电器有限公司。赵洪祝对绍兴县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大胆创新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推动转型升级。

6月30日，全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工作现场会绍兴县举行。副市长陈月亮在讲话时指出，绍兴县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在全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起到典范作用，绍兴县要进一步加大总结、规划，加快推进、推广。

7月5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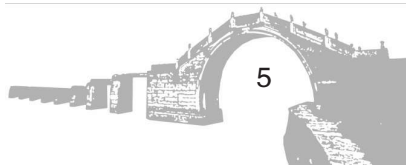
何加顺走访浙江梅轮电扶梯成套有限公司、绍兴金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普乐迪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索密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指出全县要着力培育壮大科技型、成长型企业，加快优化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7月11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何加顺专题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强调要围绕“现代服务业占GDP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十二五’末占GDP比重达到40%”的目标，制订规划、系统谋划，抓好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把现代物流、创意产业、风险投资、服务外包、旅游、商贸等作为现代服务业下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

7月26日，县委召开十二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在经济上，要重抓标准提升，全力加快转型升级，更加注重“质”的提升；要重抓项目投入，坚持转型升级主攻方向，全力抓好一批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度的大项目好项目。

8月15日，县政府出台《关于印发〈绍兴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提出“十二五”期间总体思路、产业导向、空间布局、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进一步明确绍兴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

8月24日，绍兴县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工作汇报会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到‘十二五’末，使全县80%以上印染企业集聚滨海”



既定目标任务，激情工作、创新工作。

8月29日，市委书记张金如调研绍兴县现代农业发展工作，指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农业发展，紧紧依靠改革和科技创新，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不断推动农民创收、增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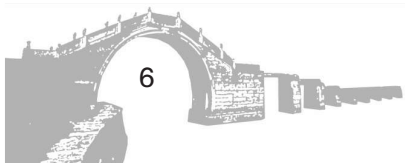
9月7日，县政府下发《关于2011年污染减排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控制增量、削减存量等方式，形成节能减排倒逼机制，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改善全县生态环境质量。

10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县视察，先后走访中国轻纺城、绍兴轻纺城创意园、绍兴县汇金小额贷款公司等。同时提出，纺织业发展关键是淘

汰落后产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科技创新；金融机构要把规范经营、防范风险与搞好对企业的服务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

10月25日至29日，2011中国柯桥国际纺织品博览会在绍兴县举行，首设创意展区。展会期间，除专业展览采购、商贸洽谈外，还举办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日本印染新技术及管理交流会、亚洲青年设计师沙龙、海外买家与纺织企业对接洽谈及中国职业时装设计师创意设计大赛颁奖等活动。

11月18日，中国产业用纺织品集群创新发展论坛在绍兴县举行。论坛围绕集群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建设议题，展开一系列探讨，有力助推绍兴县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





绍兴县党建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

——中共绍兴县一大

□ 木 羽

1949年5月7日绍兴解放以后，处于执政地位的绍兴县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民主建政、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到1956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县广泛开展，农业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已经完成；全县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大好形势下，1956年5月20日至25日，中共绍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绍兴南门干校

礼堂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中共绍兴县第一届、中共绍兴县监察委员会和出席浙江省第二次党代大会的代表。

一、第一次党代会的准备

1956年，经过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全县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快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进一步提高，党的组织也进一步壮大。根据事业的发展需要，县委大胆培养提拔“德才兼备”的干部，培养和提拔了大批干部。七



年中，全县共发展了3183名新党员，其中候补党员1361人，是1949年党员总数（245名）的近13倍，建立了51个总支委员会和328个支部。有青年团员13542名，成为党的坚强助手。这一切，为召开中共绍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好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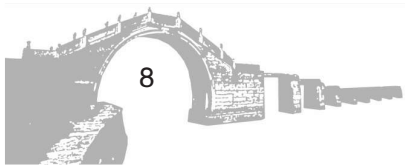
1956年4月25日，根据省委《关于召开市、县党的代表大会》及《市、县党的代表大会的要求、步骤和做法的指示》，县委作出《关于召开党的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县各行各业掀起了向党的代表大会献礼的热潮。26日，县委下发《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绍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确定正式代表314名。1956年1月3日，县委研究成立筹备委员会和办公室，对当选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从政治历史与社会关系、关于党的团结与集体领导、贯彻执行方针政策指示、总路线以来几个主要运动中的表现等方面进行逐个审查鉴定。根据选举办法的规定，全县有正式党员2449人，选出代表332名（多选18名，选举时新增加了1个选举单位），当选代表平均得票数85%以上。经筹备委员会对当选代表的审查，5名代表未获通过。代表中妇女36人，占9.18%，农村代表213名，占66.77%。对列席大会的88名代表也进行了审查，其中2名被取消资格。

二、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

1956年5月20日至25日，中国共

产党绍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绍兴南门干校礼堂召开，实到代表319人，列席代表83名。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团成员13名，梁耀东担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县委常委商恒玉致开幕辞，县委书记张树森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绍兴县委员会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工作报告分析了解放7年来的工作成绩：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兴修水利、增积土肥、改进耕作技术、改变耕作制度，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年年提高。1955年亩产605斤，比1949年的380斤增长了60%，根本改变了历来所谓“长路粮食江西米”的依靠外地供应粮食的严重情况。曾经的缺粮县，成为了余粮县，1955年支援国家建设的粮食达5864斤。六谷从1949年的每亩100斤增加到1955年的175斤，番薯从800斤增加到1440斤。特产作物也迅速发展，恢复了2万多亩荒芜茶园，改进了采茶技术，茶叶产量由1949年的15100担增加到1954年的26200担。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55年全县每人的平均收入比1949年增加了60%，热水瓶进入千家万户。文化教育长足进步，过去读不起书的读得起了，入学的中小学生比1949年增加146%，工农子弟的比重日益增长。同时办起998所民校和社校，全县4077人摆脱文盲不识字状况；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体质增强，疾病减少，儿童死亡率亦大为减少，7年中人口净增



10.5余万人。

《工作报告》总结检查了在执行上级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上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在领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是执行“坚决收缩”的方针时犯了严重错误，转退880个农业社，使组织起来入社农户的一半以上离开合作社，走上个体经营的道路。其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对占30%的山区、半山区和沿海沙地的领导不够具体，强调水稻生产，对茶叶、六谷、棉麻与盐业生产比较轻视。最后，在执行“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上，部分地区教育简单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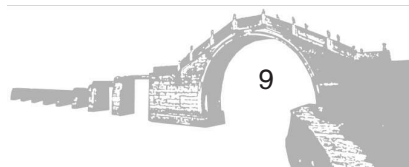
中共绍兴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推选书记卢继荣向大会作《六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总结和今后监察工作任务》的报告。通过整风、土地改革、“三反”和“新三反”以及总路线、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历史运动，向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展开斗争，审查处理违纪案件214件，加强和纯洁了党的组织，维护党的纪律，保证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贯彻。

中共绍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回顾了绍兴县党组织的发展历史，充分肯定党的建设成就，全体代表热烈讨论绍兴县解放七年来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和今后两年的工作任务。大会审议通过张树森代表前届县委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绍兴县委员会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和卢继荣代表前届纪委所作的《六

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总结和今后监察工作任务》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绍兴县委员会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报告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 加强党的监察工作的决议》和《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委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决议》。

中共绍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绍兴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7名（常务委员7名），候补委员7名，书记张树森，副书记梁耀东、卢继荣、信荣传；选举县监察委员会委员7名，书记顾茂文，副书记王志道；选举出席省第二次党代大会的代表13名。

在绍兴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党规划：要求1956年发展新党员4865名，使全县党员总数达到总人口的1.01%，到1957年再发展3368名，达到1.51%。其中，农村党员1956年要求发展到农村总人口的1.12%，做到乡乡有总支，社社有分支；1957年发展到1.61%，做到社社有总支，队队有分支或小组。手工业中，1956年党员数要求达到全县手工业从业人数的3.5%，做到社社有党员，镇镇有支部；1957年达到4.5%，做到社社有支部。工人中，1956年要求党员数达到全县工人总数的7%，做到厂厂有支部，1957年发展到9.7%。店员中，1956年党员数要求达到店员总数的5%，1957年达到9%，逐步做到镇镇有支部。文教界中，1956年党员数要求达到全县教师总数的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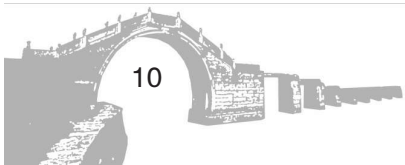
1957年达到10%，做到乡乡有支部。机关干部中的建党工作，也要继续进行。

三、第一次党代会的意义

绍兴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历时5天半，圆满完成了大会计划：总结了7年来的工作，确定了会后的任务，完成了3个选举，作出了3个决议。这次大会是全县党员思想作风的转折点，也是整个工作的转折点，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全县党员的积极性。一是进一步提高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一致认为既要发挥集中优势，又要发挥集体的智慧。会议肯定了前届县委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对重大问题都能够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做法。二是进一步肯定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大会批评了不实事求是，将水稻最高指标定到每亩8000斤的完全脱离

实际以及县委领导不够全面，长期重水稻轻什粮、重平原轻山区、重区乡轻部门，导致砍伐森林严重、部门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的现象。三是进一步严肃了党的各项纪律，全体代表以严肃的态度对主席团提出的每个候选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与群众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认真负责的审查，否决了2个县委委员的候选资格，并根据大会通过的选举办法进行无记名投票。不仅充分发扬了民主，表达了每个代表的意愿，而且也深刻地教育了每个候选人和到会代表。

绍兴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是第一次按照党章规定选举产生了绍兴县党的领导机构，为绍兴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在绍兴县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绍兴后马周氏《典礼志》解读

□ 吕 山

后马周氏（位于今绍兴县华舍街道东周、西周两村）素称“越中望族”。始迁祖周茂，一介寒士，绝无功名，而五世后名起胶庠，明清两代先后有十二人中进士，许多人做过级别不低的官，太史湖畔一时间司寇第、司马第、秋官第、大夫第、大司成第等，陆续地建立起来，显赫无比。周氏《典礼志》由裔孙周勋编述于清末封建社会已处于剧烈动荡的时期，他一方面痛感世风日下、礼法废弛，一方面也觉得时移势易，确有改革的必要，因此就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四大核心，追溯源流，阐明礼的本来的意义，而以“从简”、“从今”的原则，修订了一整套他认为必须遵行的礼仪规范。它是一个家族内部的成文法，已载入后马的《周氏家谱》。许多家谱都有各自的族规，但如周氏

《典礼志》这样作出礼法层面上的细化，一一具有可供依循的可操作性，则不多见。它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具有真实可信的力量。本文选择其中婚礼、祭礼二章略作解读，或有助于我们了解绍兴礼俗的变迁。

婚 礼

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是也。越俗婚礼大约亦有六：初以媒氏说合二姓相允，曰出口；次以二姓尊属具名相见，曰会亲；次纳果帖首饰，曰拜门；次纳币帛、彩胜，曰过礼；次送吉期，曰约日；迎娶、曰合卺。朱文公家礼略去问名、纳吉、请期，止用纳采、纳币、亲迎，以从简者。今我家酌乎古今之礼，或用六，或用三，大概故旧结亲则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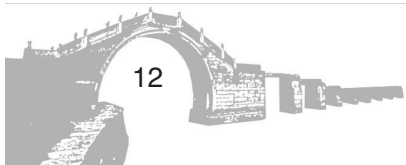
简,新为婚姻者则从繁,随时酌用,无定数也。

上文引婚礼的第一节。婚姻为什么是大事,《礼记·昏义第四十四》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说白了,婚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繁衍生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合二姓之好”的大事,亦即两个家庭(或家族)间的大事,换句话说就是双方父母的事,对于婚姻当事人的意志完全可以不闻不问。所以,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的繁文缛节,也几乎是双方父母一手包办的。旧式婚礼有一道道极烦琐的程序,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四礼是为订亲礼,在整个婚姻过程中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如果说纳采、问名还有一个斟酌考虑的过程,进入纳吉、纳征,双方都已经到了无可反悔的地步,好歹就这样定了。绍兴俗语:只有拣日子许女,没有拣日子嫁囡。既已接受了男方的彩礼,男方什么时候来娶,女方已不再拥有主动权了。

纳采问名的过程,如上文所言,“故旧结亲则从简,新为婚姻者则从繁”,绍兴旧时特多一种所谓“老亲结亲”,双方对于包括婚姻当事人在内的状况早已一清二楚,本来什么也无须问,到时间一说就成。有所谓“娃娃亲”,男女双方还在娃娃的阶段,父母就预为他(她)们订下终身。还有一种“调亲做”,双方互娶对方女儿为媳,两家新郎互为郎舅,即“交换式婚姻”。采取这种方式,当然无须纳采问名,并且省却了纳吉纳币的许多周折。双方事

周氏家譜 典禮志	昏禮	并及之	或失之過亢皆時風之急宜革者爰論命字之禮故	先生之義今則直呼其字者有之凡此或失之過謙	輩降年老者在遠服則呼為某先生此恰有古人鄉	老者更有弟亦以某老呼其兄者又如輩尊年幼見	論兄之子弟之子兄弟之孫多有不呼字而呼為某

先言明,男家不发彩礼,女家不嫁妆奁,既省事又省钱,也算是贫困对于贫困的平等。至于“新为婚姻者则从繁”,情况就要复杂许多。本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人父母者谁不期盼着一个好媳妇、好女婿?撮合者这时候无疑是备受欢迎的人物。在绍兴,媒人大体有专业和非专业的两类。非职业性的媒人,多是亲戚故旧,容易得到信任。职业媒人自有一番职业场上的历练,最会察颜观色,揣摩主人的心思,加之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因此成功的概率也比较大。当然遇到聪明的主人,不敢轻信,她们会从媒人的对话中,发现某些瞒骗的蛛丝马迹,还要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绍兴俗语:“会拣拣儿郎,不会拣拣田庄。”意思说有人嫁女,只贪图男家有多少土地多少财产,却不问新郎品行如何,将来会不会让女



儿吃亏？由于父母不慎造成婚姻的悲剧，戏剧舞台和旧小说多有描写，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更多更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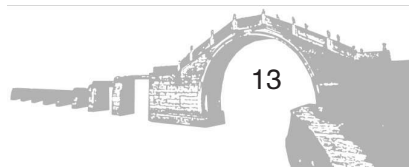
婚有六礼，《礼记》纳采、问名……是一种说法，周氏《典礼志》另有一种说法，即出口、会亲、拜门、过礼、约日、合卺，叫法有所不同，实质其实是一致的。男方求婚，女方允婚，之后就下礼。绍兴俗语叫做“发彩礼”，为了比阔斗富，讲排场，甩派头，铺张浪费在所不惜，由此造成恶劣后果，不但连累自己，还败坏风气，影响极其深远。绍兴民间有一句“有钱人家嫁女什么不嫁完”的话，传说豆姜鲍家嫁女，发嫁妆的大船头咬尾巴咬成串，后面望不到前面，最后面几只船装的不是器物，是水，摇到男方河港岸出，意示新娘这一辈子要喝要用的水，也由娘家带来。反过来说，这不是对男方的蔑视吗？

绍兴婚俗中的“抢亲风”，可以说是对于这种“重聘厚奁风”的反动。贫寒之家，度日艰难，以“抢亲”的方式达到结婚的目的，实在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此中也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双方经过预谋达成默契，摆出“强抢”的形式，实际出于自愿（至少是父母愿意）。还有一种是“真抢”，原因却很复杂，多半因为女方嫌男方彩礼不足数，或期间发现准新郎有毛病，因此有意拖延，男方被迫无奈，雇一班人来抢，等拜了堂就成事实。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的被抢，是她的婆婆把她卖掉的，祥林嫂反抗过，挣扎过，然而终于不济。祥林嫂属于二婚，旧俗出门时不准梳妆打扮，上轿不许坐“红轿”只能

坐“黑轿”，且只许在途中上轿，上轿前把旧鞋抛在路边，防止死去的男人跟来，如此等等。可是祥林嫂竟连这样的屈辱的权利也得不到，她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原因是她虽然反抗过，最终还是和祥林生了孩子阿毛。

主婚以婿之祖父主之，无则期功尊长主之。柬帖初用某郡某姓某名，问名后用忝姻、用称谓，辈同称弟辈，长称侍生，辈降称晚生，再降亦称晚生，称再晚者非也。或云，婿氏书端肃，女氏书熏沐，于礼无考，不必从。

这一节文字纯粹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关于婚礼期间往来柬帖，相互间怎样称呼落款，陈规也罢，俗套也罢，无不如此，但因为礼仪攸关，所以特为列出。最初的帖称为“问名帖（亦称请庚帖），问姑娘名字，出生年、月、日、时，是时双方家长都互不熟悉，因此开头须先自报家门（某郡某乡某里某某人），简写曾、祖、父三代名及求亲男子名并生辰八字。”“请庚帖”不用封套，对折以后书“天作之合”四字即可。两家达成初步意向，行“通名帖”（即“纳吉”），男家发“求”帖，书“敬求 台允”，落款始自称“忝姻”或“忝眷”某某顿首拜或鞠躬；女方发“允”帖，书“敬允 台命”，落款同样自称“忝姻”或“忝眷”。周勋在文中批评某些柬帖落款失当，纵双方年纪有长幼之别，社会地位有高下之分，既为儿女亲家，彼此地位平等、不必过于谦卑。即便年纪较对方小些，称“晚生”可矣，何必“再晚生”。“期功”本是古代丧服名称，期，服丧一年，功，大



功服丧九月，小功服丧五月，本文的意思，如果作主婚人的祖父已经故世，应由相当亲等的尊长代之。

古人行六礼，皆告庙，我家祠堂并祀远祖旁支，故不告于祠堂而告于寝。至期，厥明设香案祭品，合祭高祖以下，主人率将婚者拜跪，奠献如常仪，默告不用祝文，亦惟纳采合卺时行之，余不尽行也。

合卺之礼，婿西妇东，交拜，婿导妇入房，并坐于床，命妇以两卺杯酌酒进，婿妇各饮，婿揖，妇肃拜。少选，设饌于房，婿西妇东，肃拜就席，此现行之礼也。《仪礼疏》云：卺为牢瓢，以一瓢分为两瓢，谓之卺。婿妇各执一酌故曰合卺。而司马温公云：古者同牢之礼，婿在西东面，妇在东西面。以今征之，与古相合，惟亲迎奠雁，越俗都不举行。昏以为期，越俗皆用昕旦，此则不得不从俗者耳。

这是婚礼中浓墨重彩的一章，似乎都是表面形式，但一定的形式表现一定的礼仪，所谓“行礼如仪”，仪式规定，谁也不许违反。周勋在这里说了两个步骤，完婚当日“告庙”，由准新郎的父母率领到祠堂祭祖。因为后马周氏祠堂，大祠堂并祭远祖旁支，另有寝堂（亦即小祠堂）祀本支近祖，所以只到寝堂行祭祀礼。“合卺礼”俗称“拜堂”，是迎娶进门以后的一项重要仪式。为什么叫做“合卺”，周勋据《仪礼疏》作了解释：“卺为牢瓢，以一瓢分为两瓢为之卺，婿妇各执一酌故曰合卺。”简言之，卺就是剖为两半的瓢，合二为一即成夫妇矣。照《礼记》的说

法：“共牢而食，合卺而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主旨并不在于吃喝，其象征的意义是同吃一锅食，同饮一壶酒，以后夫妻尊卑相同，相亲相爱。现下人称“合卺酒”为“交杯酒”，可以追溯到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关于交杯酒有这样的说法：“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这里说要用彩丝连接杯足，以表同心，显然也是为了突出象征性的意义。今人变“交杯”为“交臂”，别是一种理解。

上文中还规定新郎新娘站立位置：“婿西妇东”。古人以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有尊卑的不同。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所著《日知录》称：“古人之室，以东向为尊。”故新郎站西面东，新娘站东面西，还是“男尊女卑”的意思。后面说“亲迎奠雁，越俗都不举行。”据《礼仪》的说法：“纳采用雁”、“纳吉用雁”，即问名之后得到女家应允时和到女家送聘礼时，带去的礼物中必有活雁。古人以为大雁一生配偶一次，无论雌雄，半途丧偶，抛下的一只不再续配，因此被视为恩恩爱爱矢志不渝的象征。但大雁不容易得到，故代以别的物品。送礼的时间古人以为应该在黄昏时候，现在改为白天。

明日见舅姑，夙兴盛服，侍者以贄币从舅姑坐堂上，婿妇朝拜，妇献贄币，纳讫，乃拜见同居尊长，尊长受之；卑幼拜见妇，妇答拜。舅姑饷妇设席于姑座下，妇酌酒先奉舅姑，乃就席。是日，妇有具酒饌肴楮陈于厅事，为妇馈舅姑之礼。



三日庙见。此礼重于见舅姑，今惟婿妇至祠堂，而主人不亲诣，殊为未安。古礼所以见舅姑者，原为便于带引入庙也，法当设香案祭品于祠堂，主人率婿，主妇率妇，躬诣跪拜，奠献如告庙，礼乃合。近日，二见同日，以从省便，如此亦当先见舅姑为顺。过此以往，七朝、十四朝、朔望、弥月，诣近服尊长前行礼，诣舅姑问安，则日三朝焉。

上文说婚礼第二、第三两天中必须完成的程序，即次日见公婆，后日告祠堂。绍兴风俗看重见公婆一节，小俩口早早起来，梳妆打扮，到堂前拜见翁姑，家中族中凡长辈无不集，团团圆圆坐满堂前，对于新娘来说当然都是陌生的，这时候就有专人从旁指示，一一以比丈夫低一辈的身份加以称呼。夫妻无分尊卑，为什么要降一辈？是盼望早生贵子。堂上如已三代见面，此时仿佛四世同堂。在中国，人丁兴旺从来被看作幸福的气象。“妇献贄币”为古礼，初次拜见长辈所送的礼称为“贄礼”。现下绍兴又有一个说法：“媳妇大娘开金口，这一声叫不是白叫的。”小俩口拜见以后，公婆要给媳妇红包（称“见面礼”），其他长辈也都要送。这道仪式过后，才“舅姑饷妇”，即公婆招待吃饭。依例新妇须先敬公公婆婆，以下依次敬酒如仪。

第三天“庙见”，其象征性的意义是让已故长辈意见这位新媳妇。周勋以为，其顺序应先拜公婆，然后由公婆引领新郎新娘到祠堂跪拜。今多已不行。

妇人拜。《少仪》曰：“妇人吉事，虽有君赐，肃拜。为丧主则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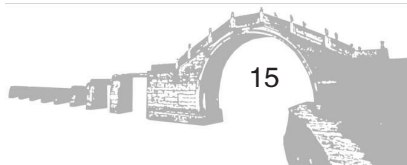
拜。”《仪礼》曰：“妇拜扱地。”肃拜者低头立拜也，手拜者手至地，头在手上也。妇人吉礼则立拜，凶礼则手拜，为丧主则稽顙，故曰不手拜。新来见舅姑当尽礼，故亦手拜即扱拜也。今我家妇人拜，悉如古礼。

这也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接续前面新妇拜见舅姑怎么拜？其三种姿势，即肃拜、手拜、稽顙。肃拜取站立姿势，上身稍前倾，双腿微弯曲，双手覆合于腹腰间一侧，向下按三次，这是古代妇女通常的拜见姿势。手拜须双膝跪地，弯腰至额触手即止，亦三次。稽顙如手拜，双臂撑开手按地，额头着地，即是叩头，无论男女这是最重的礼节。周勋说，新妇初见公婆要行重礼，故须手拜，然止初次，也不必稽顙。妇人稽顙只在丈夫故时。

祭 礼

中国祭礼，源远流长，对象广泛，仪式庄重，有学者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祭礼是人类从尘俗世界通向神圣世界的桥梁，是跨越时空的人灵对话。在古代，祭祀的对象包括天神地祇，先王圣贤，列祖列宗，祭祖属最低级别的礼仪。周氏《典礼志》所述仅为家礼，即陆游诗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家祭”。

南门《周氏祠堂记》曰：《礼》：士、庶人无庙，祭于寝，有大宗、小宗焉。凡为人子，别为后世祖，长嫡之继之为大宗，历百世不迁；庶子之嫡继庶子为小宗，五世而迁，复一世而一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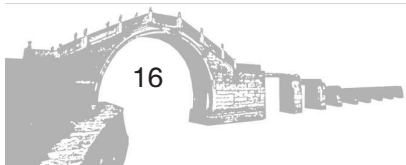


之，乃不得祭祖，明有大宗也。我家自始祖来迁是土，祖降而为大宗，迨而小宗为盛，逮吾辈凡六迁，既无大宗之子以定祭，既迁之小宗又惓惓不忍废其祀事，于是每岁元日、寒食，自始祖、高祖以下各诣先茔祭之；家建祠堂设龛，按古礼尊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祢又次之。旁亲以昭穆列两序。主人朝夕谒，出入必面，冠必筮，婚必告，生子必口，见亲必荐，凡有事必白，朔望俗节必奠，分至忌日必祭。菜盛有田，奠荐有器。祭前，三日斋戒，一日正席，设器皿，省牲具膳，厥明夙兴，设饌，主人盛服入门，立阼阶北面，主妇立西阶下北面，余属列左右，皆再拜参，神乃降。主人盥洗，升，上香，执事者实爵，主人灌于茅，俯伏兴，再拜，复位，乃进饌。主人升，主妇从之，执事者奉饌，主人主妇先后授奠，毕，复位，乃初献。主人升，诣高祖、考妣主前，执事者斟酒，主人奠酒，祭酒，俯伏，兴祝以故，再拜。诣曾祖主前，礼如之；诣祖祢主前，礼亦如之。高祖之小宗，其嫡子孙行礼亦如之，主妇亚献如初，礼惟不宣祝。长子终献如亚礼。乃侑食。主人主妇升，益酒正箸，再拜，复位，乃阖门，乃启门，乃受胙，乃辞神，主人以下皆再拜。彻而退，退而餽。是礼也，我高祖作之，曾大父述之，俾世世子孙，永有遵行，仪式法度虽不能尽合于古制，其尊祖敬宗合族之道亦庶几矣，惟务守之，以来仁让，斯不负先人启后之贻谋也。恪谨记。

家祭可有三种形式，即墓祭、庙祭、寝祭。墓祭不难明白，合族共祭，

不局限于小家。庙祭，上文说“士、庶人无庙”，因为明清两代惟皇帝祭祀祖先神灵的场所称“庙”（太庙），王公大臣奉祀祖先的场所可称祠堂，庶人则称“寝室”或“寝堂”。这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实际所行并非完全如此。《红楼梦》荣宁二府的贾氏宗祠亦称“家庙”。而民间无论“寝室”“寝堂”统称祠堂。稍有气象的祠堂，前享堂，后寝堂，享堂是奉祀大典的场所，寝堂安放牌位。有的氏族无力兴建祠堂，各家自设“神龛”（称为神堂）。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宗族或家族内部血统远近作为礼制的思想基础，西周形成的一套完备的礼制，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下，为了区别众多子女的地位，规定正妻为嫡，媵妾为庶，以嫡长子为法定继承人，于是嫡长子为“大宗”。当然，“大宗”、“小宗”是相对而言。大宗衰落，小宗崛起，小宗未尝不可以成为大宗。周氏《典礼志》当中“祭礼”一篇，非出于周勋，而为诸暨南门族七世祖周恪所撰，他说迁来迁去六次，是诸暨时的情形，说主祭的长房一系子嗣零落，已无力担当祭祀重任，小宗犹有拳拳不废祭祀之心，于是如大宗所应作的那样，小宗挑起了这付担子。

照周氏祭礼，墓祭于每年元日、寒食举行。元日为大年初一，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因与清明相连，唐以后并为祭奠亡灵的日子，祭高、曾、祖、祢四代。“祢”称已故父母。旧礼，生称父母，死称考妣，入庙称祢，上了神堂也算是入庙了。祭高、曾在祠堂，祭



祖、祭祢各家自为之。还有一种情形，如“朝夕谒”，出入必面，冠必筮，婚必告，生子必口，见新必荐，凡有事必白，《礼记·曲礼上第一》：“夫为人子者，出必告，返必面。”出入都要说一声，犹如祖祢尚在眼前。所谓“见新必荐”，指有鱼米茶果新获登场，先行供于祖祢前面，特别是祖宗生前喜爱食物，特别恭敬以供。事死如事生，这是日常的不太拘于形式的祭礼，极备亲切之感。再一种“常日祭”，“分至忌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设香烛酒馐，仪式稍隆重些。本文所载按古代礼仪，有种种规矩，如“祭前，三日斋戒，一日正席”。“斋戒”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意思，“斋”是清心洁身，摒除杂念，只想父母生前种种景象，“进入角色”。根据这样的理念，当然就要约束自己的行为方式，不与妻妾同寝，不出外参加庆吊、娱乐活动。“戒”不戒肉食，戒葱、韭、蒜等辛味，古代以为辛味是对神灵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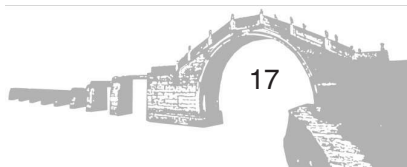
祭祀次序首先是神，然后高、曾、祖、祢。文中说到“乃阖门，乃启门”，因上下代不同席，一开合表示一代。今绍兴民间祭祖简化程序，通常只请两桌，先是曾、祖二代（俗谓太爷爷、太娘娘、爷爷、娘娘），同时还请“外客祖宗”（即外曾祖、外祖），后一桌请已故父母（也可包括岳父母）。先后二请，各燃烛一次，灭烛一次，代替合门启门的意思。期间与祭者要行拜礼。古代礼仪有进馐、实爵、奠酒、祭酒、俯伏祝、拜等等仪式，今

则拜而已。“灌于茅”是敬神的礼仪，主人把敬神的第一杯酒洒于地下。当代只在年底请神还有这一形式，家祭时不再请神。“兴祝”、“宣祝”即以言语告祖宗祈福。讲究的人家也有书面的祝文，有的长达数千字，主祭者照本宣科就是。当代家祭口头说说罢了。“彻而退，退而餽”，《礼记》：“餽者，祭之末也。”说祭礼食品都是祖宗吃剩的，即所谓“余荫”。风俗重家祭，有它道德层面上的意义。而总的来说，《仪礼》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是中国封建时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礼仪风俗、思维方式、人际交往以及各种名物典章，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许多繁文缛节，极琐碎，今天现实生活中还有它们的影子。阅读这样涩滞的文字，或许还会有所感悟和收获。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作进一步的探索。本文解读或有不符不合之处，敬请高明赐教。

月日多言
不容入室其死何幸此流俗忍心害理之見仁人孝子所急當痛改者也然則宜何如日長喪歸當殯於正廳幼喪歸當殯於旁室成服治喪發引出葬如常儀如是則生者順死者安耳雖然非概無區別也檀弓死而不弔者三日畏自經於溝日壓立巖牆日溺下之類無故不舟而游之類凡若此者禁之不得入家門以為輕生於非命者戒焉可也

祭禮

南門周氏祠堂記曰禮士庶人無廟祭於寢有大宗小宗焉凡為人子別為後世祖長適子繼之為大宗歷百世不遷庶子之適繼庶子為小宗五世而遷復一世行一遷之方不導祭祖明有大宗也我家自始祖



陆游一脉在齐贤

□ 孙伟良

即将建成的杭甬客运专线绍兴柯桥站迤北三华里，烟火数百家，为齐贤镇山南村，村以处羊山之南而得名。其西居多陈姓、蒋姓，俗呼大山南。东居以姓陆、姓韩为大宗，习称小山南，小河贯村，咸安桥南北架构。迄今陆姓30余户130余人，乃南宋大诗人陆游后裔也。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氏族编^①所述“一百二十四氏、四百八十三族”，内有“小山南村陆氏”。陆放翁之四世孙浩然，宋末进士，元初隐居石姥山（今名壶瓶山）北丈午村，成宗

召为修撰，不就。赐号“江南第一先生”，镌金字旌其闾。浩然之四世孙廷相，字朝宰，自丈午村迁居李家步。传八世，名子成者，因父“行礼蚤（早）卒”，幼随祖母张氏避乱迁居羊山之南^②。嗣后人齿渐盛，“再从而下百余口衣无常主，门无异烟”^③，清“道咸间簪纓文物，极一时之盛”^④，蔚为齐贤望族。展阅清光绪丙戌科陆寿臣会试硃卷，数叹“文豪文脉有赅续”！

陆寿臣，谱名政綬，字廉史，又字莲诗，号枚生。同治十二年（1873）浙江乡试中式第87名，光绪十二年

①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编，民国27年（1938）7月刊印。

②参见清同治癸酉科陆寿臣乡试硃卷，载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26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

③民国《绍兴县志资料》人物编《陆灏传》，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编，民国28年（1939）10月刊印。

④见顾燮光《陆风齐事略》，载民国《绍兴县志资料》人物编。

(1886)殿试二甲第42名，朝考第一等第19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散馆授刑部主事。《清代硃卷集成》中陆寿臣会试硃卷^①所载人物，上至高祖辈、下至侄孙辈计男丁145人，读书有功名后缀以“附贡生”、“国学生”、“邑庠生”、“太学生”、“廩贡生”、“廩膳生”者，有82人。其中举人7人，内1人即陆寿臣中进士、晋翰林。《左传》提出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即“立德立功立言”，并称“此之为不朽”，则小山南陆氏犹可浓墨重彩而书之。

陆寿臣的曾伯叔祖辈：陆廷芳，候选县丞，著有《卧云诗钞》；陆蕞，乾隆乙卯（1795）科举人，由内阁中书升内阁侍读，军机处行走，京察记名御史，历任山东泰安、沂州、青州府知府，诰授中宪大夫；陆茂，嘉庆辛酉（1801）科举人，原选山西岳阳县知县，改任江苏阜宁县知县；陆英，附贡生，候选训导，著有《梅花轩诗草》。

陆寿臣的祖辈：堂伯叔祖陆简金，道光壬午（1822）科举人，历任工部营缮司主事、都水司员外郎、营缮司制造库郎中，诰授中宪大夫，晋封通议大夫，著有《红杏山庄文稿》、《自怡集诗钞》；陆庆恩，国学生，江苏候补巡政厅，署镇洋县县丞，著有《祭总集录》。

陆寿臣的父辈：本生父陆宝枢，道光甲辰（1844）恩科举人，咸丰癸

丑（1853）大挑奉化县学教谕，著有《即斋诗文稿》；从堂叔陆灏，谱名秉钰，附贡生，候选训导，著有《聊自存钞》、《感应篇》、《二十四孝便蒙诗》及《鄂不书斋集》十卷；陆语新，谱名秉全，咸丰壬子（1852）科举人，拣选知县。

陆寿臣的兄弟辈：胞兄陆寿南，谱名政绅，廩贡生，候选训导，著有《长生草庐诗文稿》；嫡堂兄弟陆政绪，国学生，著有《家学清规》二卷、《课花谱》一卷；陆寿民，谱名政缙，光绪乙亥（1875）恩科举人，处州府庆元县学教谕；从堂兄弟陆寿芝，五品衔，著有《篆隶辨正》二卷。陆寿昌，廩膳生，著有《时敏斋诗文稿》。

陆寿臣的子侄辈：堂侄陆敦儒，邑庠生，即补县丞，著有《求自谦斋诗文稿》。

斗转星移，物换景变。欲履痕陆氏科举，昔日文魁台门、大夫第台门、翰林台门等，仅存翰林台门残址一处。翰林台门口，原有四块雕花石刻旗杆石，旗杆顶上有一硕大红漆魁星斗，象征其官衔之显赫。宅的周围建有五板萧墙，房屋系砖木结构，有七间三进，建筑气势恢宏。时在2004年，据85岁韩越轩（女）口述：陆府内专门建有一个供奉圣旨的圣旨堂，雕梁画柱，门窗上雕刻出八仙过海，狮象虎豹，梅兰竹菊等图案。圣旨堂光彩夺目，堂上供奉皇上御赐“天地君亲师”红底金字匾牌一

^①《清代硃卷集成》第58册。



块，乃陆翰林家之荣耀。只可惜1976年，因邻居失火，殃及陆府，圣旨堂被毁^①。而镌刻有“桑苎家风”的台门门罩尚存。虽显赫官邸不存，然翰林文气当在，且有所浸润学子。如近代名人邵元冲童年时就在这里读过书。

邵元冲（1890~1936），字翼如。出生于齐贤下方桥，祖籍绍兴漓渚下岭村。父邵兴法、兄邵鹤松在下方桥后市街开设天成银楼^②。元冲童年时在翰林私塾读书且长于斯，今存“邵界”界碑。其13岁中秀才，20岁举拔贡。辛亥革命后，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后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国民党中常委，北京《民国日报》社长，立法院代理院长。1936年应蒋介石电召入陕，西安事变中受枪伤，死于医院。其夫人张默君，于1937年仲夏回绍，在羊山石佛寺名胜厅石柱上镌有一副楹联，联曰：“挹石气灵光六茎俱净，听晨钟暮鼓五蕴皆空”，署“张制默君并书”。所书“制”字，乃依礼守丧之意。

笔者经眼之陆氏著作，有陆灏《鄂不书斋集》，此书一名《陆善泉遗集》^③，或名《陆善泉先生遗稿》^④。陆灏（1818~1887）字善泉，号虎道人，又号病隐山人，别号南麓赘翁。“七岁能诗，博闻强记，工勾股音律之学，皆有著

述”^⑤，“为山会萧三邑文人所崇拜”^⑥。《鄂不书斋集》成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光绪元年（1875）举人、安昌人马逸臣（1856~1909）写刻并序，厘订成五册，其内《聊自存草》二册，《劫余草》一册，《唾余漫钞》一册，《鄂不书斋文钞》、《鄂不书斋词钞》合作一册。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有藏。

山南村之北为羊山，连亘数里，蜿蜒若卧龙，故又名龙山。自隋朝杨素开羊山采石筑罗城，村民遂世其业，然峭壁悬崖，奇险万状，习是而死者相继。《聊自存草》之《开山哀》，记述道光庚子年（1840）春，西邻大山南蒋某晨炊而往，忽危岩坠落，人觅其尸于乱石中之事。诗曰：“刀锋杀人犹可逃，山锋杀人厉于刀。……呜呼！石吃人兮甚于虎，少妇孤儿泪如雨。”读罢，令人唏嘘不已。《石佛寺》诗云：“路尽小山南，登临度石龛。当空瞻佛面，近俗厌僧谈。蝙蝠宵缘壁，鱼龙夜沫潭。下看尘外路，村树锁烟岚。”《鄂不书斋文钞》有《龙山石佛寺附立机神云机圣府碑记》，其略言：“粤稽我杭机业之兴，在宋南渡，而后元明之世，迄乎本朝，组织之工，甲于天下。计夫经纬之属，爰及机料，诸工凡为官、为私，衣

①王云根主编：《绍兴村落文化全书·齐贤卷》第61页《小山南陆家圣旨堂》，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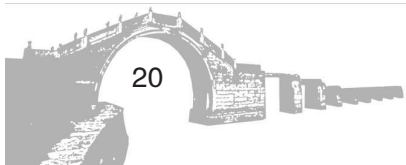
②陈元泰主编：《齐贤镇志》第835页《邵元冲传》，中华书局2005年7月版。

③韩百年编撰：《羊山韩氏宗谱》参考书目，民国20年（1931）刊印。

④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第12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⑤民国《绍兴县志资料》人物编《陆灏传》。

⑥《羊山韩氏宗谱》第一集《韩迪周传》。



兹、食兹者，万人不啻焉。”该文是研究越地纺织史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而嵌砌于羊山石佛寺侧厢壁、清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由下方桥绸业各同行公具的《云机圣府碑记》^①，乃是陆灏所撰文。

陆氏诸子，好学不倦，满腹经纶，佳话连连。陆寿臣的从堂叔陆风齐，字燕生，太学生，随宦北京，文学能得风气之先，为侍讲罗訏庭所器重，许女为之妻，后为福建候补县丞。其弟陆凤称，字艾生，亦太学生，尤善词章^②，于同治六年（1867）、九年、光绪二年（1876）、五年、八年、十一年参加了6次乡试，虽屡试不第，但均获“荐卷”、或“堂备卷”之褒奖^③。陆灏、陆凤称从兄弟还成就一段士林佳话，上海图书馆所藏钱塘吴俊琪（字半耕）《有至乐斋吟稿》四卷，朱墨斑斓，此乃经其友陆灏评选所致，卷首尚附粘其致陆凤称原札，乃吴俊琪乞陆凤称评定其文稿之函^④。

山南陆氏“巾幗不让须眉”。南京图书馆藏陆韵珊《梅修馆诗存》一卷，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前有其弟陆寿芝序，后有女琴仙跋^⑤。陆风齐的女儿陆珊（1875~1901）亦有诗集存世。近代目录学家、金石学家，会稽人

顾燮光（1875~1949）的妻子是陆珊。顾氏著有《非儒非侠斋诗集》^⑥，是集附有陆珊《福艳楼遗诗》一卷，存诗66首。今录存一二，以飨读者：

夏日即事

水云深处芰荷香，画阁千里绕绿杨。
天际远垂红螭螭，池边双戏碧鸳鸯。
行噙人倦催诗急，刺绣工多任梦长。
女伴阿谁多逸兴，采莲歌听起沧浪。

秋夜

蟋蟀庭中鸣，萧然夜已半。
天际淡微云，双星隔河汉。
欲睡不成眠，披衣坐待旦。
静观景物移，坐看流年换。
儿女铸英雄，阴阳冶鑪炭。
渺兹九点烟，全球弥浩漫。
会当凌风行，秋高健羽翰。

可叹陆珊红颜薄命，其《病危》诗云：“薄命谁怜我，深情竟累君。五年鱼水得，一旦燕钗分。永诀无多日，相思已化云。他生安可卜，恻绝赋离群。”顾燮光有挽继配陆恭人联：“恨海竟难填，叹一生倚马能文、惊鸿舞武、博览古今典籍，淹通豁达不愧须眉，德貌言功並超巾幗，百年永订同心，方期琴瑟长调，福艳楼高仙梦稳；情天终莫补，忆当年萍川合盃、汴省偕归、流连风景河山，英雄历史都付噙

①陈五六主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第643页收录《云机圣府碑记》，中华书局2005年12月版。

②顾燮光《陆风齐事略》。

③光绪丙戌科陆寿臣会试陈卷：“陆凤称，太学生，同治丁卯顺天乡试荐卷，庚午顺天乡试堂备卷，光绪丙子本省乡试荐卷，己卯荐卷，壬午堂备，乙酉荐卷。”

④柯愈春：《清人诗人集总目提要》第123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⑤《清人诗人集总目提要》第1750页。

⑥顾燮光、陆珊撰：《非儒非侠斋诗集》一卷，附《福艳楼遗诗》一卷，民国7年（1918）石印本，绍兴图书馆藏。



篇，儿女情怀悉供诗料，五载俄惊弹指，诩意膏肓莫起，侠儒斋冷风台空。”^①光绪二年（1876）进士顾家相（1853~1917）也有挽次媳陆氏联：“苕菜慕周南，欣逢十乱多才，太姒宫人，得共邑姜赉雅什；萱花谢堂北，岂料三年未阕，有齐季女，遽随文母驾鸾骖。”^②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有像陆韵珊、陆珊这样的才女，的确难能可贵。

陆游后裔“读圣贤书，行仁义事”。《绍兴市志》引述王廷凤1937年所编《绍兴之丝绸》^③：齐贤缎“始产于清道光年间，首创者为当地陆氏，曾供职京师，睹宦显绅商，多以服缎为荣，业是者颇有供不应求之势。其时杭州之织造公署，极具官气，不擅贸易，陆氏因于齐贤设机制造，经运京师倾销，获利数倍，由是业者日繁。迨至光绪间，制造地域已散附近山头、兴浦等地，年出缎类二万二千匹，值一百十万元。”^④时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绍兴境内出现第一家近代丝绸企业山南村“瑞云祥”绸厂。三十年，又有“元泰韩”绸厂。民国18年（1929），山南瑞

云祥绸厂率先自备发电机，使用电力织机，嗣后，齐贤一带20余家绸厂也相继跟进^⑤。1926年前后，齐贤一地12家绸厂有织机550多台，日产绸缎达三百疋左右。其时，小山南较有规模的绸厂有“瑞云祥”、“元泰韩”、“泰昌”、“全昌”、“承余”、“乾昌”、“广昌”等。随着机坊的发展，丝绸产业链就此形成，如绸庄增到七八家，原料店十多家，摇坊二十几家，染坊四五家。由于齐贤丝织业盛极一时，镇上人口剧增至近万人，有“小上海”之称^⑥。丝织业的日益繁荣，行会随之产生，这就是机业公会。其初为机神庙，原设于山南，后因庙屋被龙卷风刮倒，将机神菩萨和《云府圣机碑》移至石佛寺^⑦。

山南作为齐贤丝绸业发祥地，其所波及的范围甚广。以下所述，略窥一斑。在《浙江省丝绸志》^⑧、《杭州丝绸志》^⑨，以及本县《安昌镇志》^⑩、《盛陵村志》^⑪里，均有民族实业家徐吉生传。徐吉生（1864~1934），绍兴山阴盛陵村人。其父徐茂顺，生于清道光年间，早年在下方桥山南村习织绸，后与妻陆氏迁居该地，自织自卖。咸丰末

① 联见顾燮光：《非儒非侠斋文集》之《联语偶存初集》，民国24年（1935）杭州顾庐石印本。

② 联见顾家相：《勳堂文集》之《勳堂联语录存》，民国13年（1924）排印本，绍兴图书馆藏。

③ 据袁宣萍、徐铮：《浙江丝绸文化史》第230页“民国时期的蚕桑丝绸专著摘要”，《绍兴之丝绸》出版于1937年。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

④ 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70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⑤ 此段史料，依据《齐贤镇志》第十章《工业》第四节《丝绸业》。

⑥ 笔者2004年参与齐贤村落文化普查及编撰工作，见到1964年编的丝绸调查资料，原件藏齐贤镇下方桥社区西街居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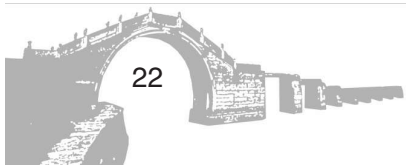
⑦ 《齐贤镇志》第259页。

⑧ 陈钟主编：《浙江省丝绸志》第548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7月版。

⑨ 杭州丝绸控股（集团）公司编纂：《杭州丝绸志》第477页，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⑩ 包昌荣主编：《安昌镇志》第436页，中华书局2000年8月版。

⑪ 包昌荣主编：《盛陵村志》第68页，中华书局2009年7月版。



年，茂顺去杭州发展，渐具规模。徐吉生承父衣钵，民国元年（1912）独资开办杭州庆成绸庄，随后又创办上海益新、庆丰、纶祥等丝厂，并提倡实业。蔡元培题词赞扬有“领袖商场能造时势，丝织改良起衰救敝”。徐茂顺是徐氏纺织业的创始人，其渊源来自山南陆氏。

百川归海，须追本溯源。王廷凤《绍兴之丝绸》中“道光年间”、“首创者陆氏”、“曾供职京师”等关键词，浓缩着一段辉煌历史。光绪丙戌科陆寿臣会试硃卷载：“陆简金，原名庆霖，谱名朝鑫。道光壬午科举人，由内阁中书历任工部营缮司主事，都水司员外郎，营缮司制造库郎中。随带加十一级，纪录五次，赏加按察使衔，遇缺尽先即选道。钦派定陵万年吉地奉移安总办，赏穿黄缎靴。钦派大婚典礼总办。钦差稽察京通十七仓。钦派清查钱法堂。钦命提督两窖厂。钦命木仓监督、皇木厂监督、皇史宬监督、采绸库监督、冰窖监督、工部饭银处监督、清档房监督、则例馆总校。派查铅子库、硝磺库事务，营缮司制造库司务厅、料估

所主稿。”陆简金自道光二年（1822）中举后在工部任职，如以同治十一年（1872）总办同治帝大婚典礼^①止，其供职京师逾半个世纪。履历中“定陵万年吉地奉移安总办”，乃是咸丰帝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二日驾崩^②后，陆简金于“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奉移梓宫，至东陵西峰口外隆福寺暂安，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辰时葬定陵”^③之事，事后被“赏穿黄缎靴”。陆简金曾任“采绸库监督”职，客观上成就了齐贤丝织业的发展与繁荣。在绍兴的历史上，理当为陆简金记上一笔。《绍兴市志》引述了王廷凤《绍兴之丝绸》，牵出一段往事，幸甚至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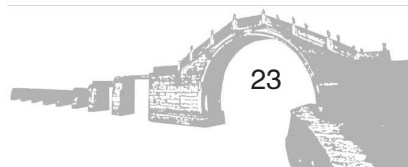
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三十二《宋朝散大夫陆公墓志铭》中曾描述自己的家世：“陆氏自汉以来，为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绝书。”又在《剑南诗稿》卷五十五《示诸孙》诗中曰：“但令学业无中绝，秀出安知有后来？”^④这是陆游七十七岁时对孙子的期待，实际也是对后裔的期待。上述齐贤羊山陆氏后裔实况种种，应该说是令九泉之下的陆游欣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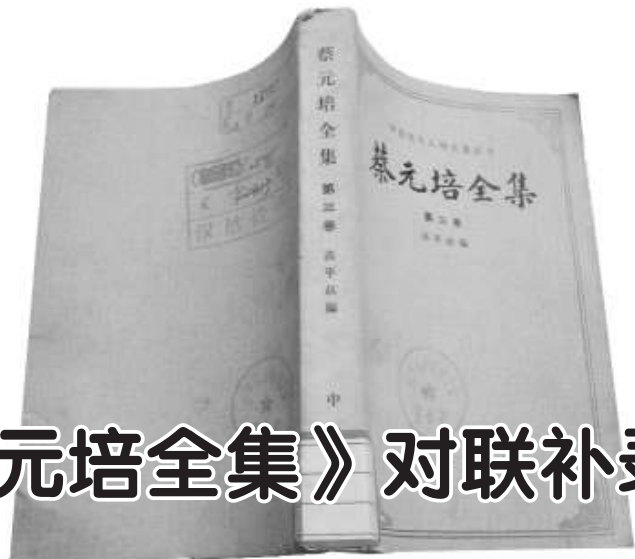
①李治亭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第3册《人物荟萃》第17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②《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第3册《人物荟萃》第148页。

③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第19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0版。

④转引自邹志方：《陆游家世》第17页、第310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8月版。





《蔡元培全集》对联补录考

□ 邓政阳

蔡元培（1868~1940），清浙江山阴人。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庐，后改号子民。曾用名有蔡振、周子余、锷青、会稽山人等。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获二甲第三十四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入民国，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

在研究者的眼里，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成就备受世人关注。很少有人关注其在对联领域的成就。作为前清翰林的蔡元培，自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对课教育。

蔡先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就概述了其在私塾接受对课教育的概况：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具，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要用圈发的

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角，上声在左上角，去声右上角，入声右下角。学生作对子时，最好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对联“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蔡元培对对联作用的评述，成为当时许多学校开设对联教学的有力支持，对我国现代对联教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创作了大量的对联。他所作的对联用典贴切，不事雕琢，浑然天成。或赠人，或挽人，或颂人。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写的《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收录了蔡元培撰写的对联65副。随着我收集蔡撰的对联的不断深入，发现《全集》实则不全，而且还有些许错误。在检阅文献时，笔者又发现了蔡元培先生撰写的对联，为翁同好，现就收集的《蔡元培全集》中未录入22副对联和已录入的2联以及讹传的1联录考如下：

题上虞谷氏宗祠联

秦封受氏，徵桂阳碑，九族洪源追颯子；

京易名家，稽兰台传，一经遗彦播虞宾。

上虞谷氏宗祠，位于上虞百官上堰头，上堰头的谷家祠堂在百官是首屈一指，虽历经岁月沧桑，至解放前仍然金碧辉煌。到了解放初期，谷家祠堂被征用为粮贸公司，在文革中，随着“破四旧”的浪潮席卷全国，谷家祠堂被彻底破坏，随之又在上虞的城市建设中谷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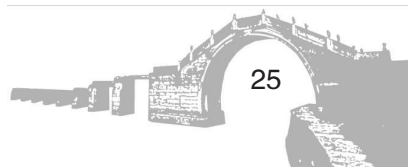
祠堂被拆除。《古今联语汇选补编·祠庙二》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铅印本）载：蔡鹤庵题上虞谷氏宗祠联：“秦封受氏，徵桂阳碑，九族洪源追颯子；京易名家，稽兰台传，一经遗彦播虞宾。”鹤庵即蔡元培先生的号。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庵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蔡元培的书法落款也多处钤印“鹤庵”。另《清稗类钞》载：“山阴蔡鹤庵编修元培夙持素食主义，惟不能屏绝肥甘。其于宴会，亦从众进食，然不多，固非饕餮者流之见有盛饌，恣为饮啖，一赴宴而隔宿犹饱，至患河鱼之疾也。”罗振玉民国七年（1918）6月19~21日致王国维信说，“北京邀公任教授事，弟于前致函蔡鹤庵（蔡元培）时附告以‘前嘱致语静安（王国维）征君，已遵致意，随后或有书致公’云云。此事忘告先生。”（《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文字中都用“鹤庵”或“蔡鹤庵”，因此，综合这几方面考虑，此联为蔡元培先生所作无疑。上联“秦封受氏”，典指谷氏的来源。下联“京易名家”，典指西汉谷永，精通京氏《易》。

挽陈孟冲联

南阮竹林游，家学不愆，方冀雕龙虞祭酒；

北风万里感，楹书具在，会有雏凤展清声。

此联见陈洵《瑞安陈孟冲先生哀挽录》（瑞安敬业石印局民国十一年石印本）。陈孟冲本名陈怀，乳名启明，学名



商。因五岁丧父，故字孟冲，或作孟聪。家学盖指陈孟冲出身于家学渊源的世家。祖父麟书，字琳山，精通天文历算之学；父煜生，字燃石，十岁为县学生员，年二十七卒，遗著有《独见晓斋集》，二叔父黻宸，字介石，是温州近代的杰出人物，和陈虬、宋恕合称“东瓯三先生”，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北京大学教授。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与蔡元培、汪康年组织成立保浙会，交谊甚深。民国五年（1916）年6月，陈黻宸逝世，蔡元培撰写了挽联表达了深深的赞美和惋惜之情。联曰：“数故乡人物渺然，若志三、若仲容、若平子，死别经年，而今又弱一个；得天下英才而教，在杭州、在广东、在北京，师承作记，相期共有千秋。”后蔡元培聘任陈孟冲为史学教授以继黻宸遗缺。所著《清史要略》便是北大文科史学课本，《中国近百年史要》是北大预科一年级史学课本。在校首尾六年，兼主北京高等师范讲席。民国十一年（1922），“因编纂讲义过勤，得目昏。继患软脚病，在讲堂晕而仆。”6月22日逝世。十二年1月，厚道的蔡元培、马叙伦、朱希祖、马裕藻等联合发起召开追悼会。这次追悼会上北大师生大部分都参加。怀念这位清史奠基人、怀念敬业教授。北大校长蔡元培对其逝世深为悼惜，含着眼泪宣读悼词并题挽联：南阮竹林游，家学不愆，方冀雕龙虞祭酒，北风万里感，楹书具在，会有雏凤展清声。

挽唐学曾联

事亲孝，与弟友，清介持

身，忠恕是传家，千载仪型光垂史；

建朱节，握虎符，贞诚护法，勋猷允敷国，大名彪炳颂佳儿。

此联见《会泽唐氏荣哀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

唐学曾（1864~1919），字省三，云南会泽人。云南督军唐继尧之父。唐学曾逝世后，蔡元培撰写了挽联，署名：愚侄蔡元培。可见蔡元培对唐省三的尊敬以及钦佩之情。而廖道传为唐省三所作的《传》也恰好可为蔡元培先生所作的这幅对联作注。梅县廖道传为唐省三《传》中曰：性纯孝，本其孝亲之诚，而施于家，推之州乡，以暨于天下，如木之有本，水之源深，而流渊广也。廖道传曰：吾观于唐公而知孝治之效之广大矣……公承庭教，六龄失怙，即知哭泣，稍长入学，聪慧过人，为母服劳役，筮出纳，井整有法。既冠，游簧序，文誉隆，督诸弟、子侄就傅内外国，以慰亲心。而仲弟学闵举于乡，子继尧，侄继虞等皆以军学专家著，遂立大功，显赫于天下，皆公之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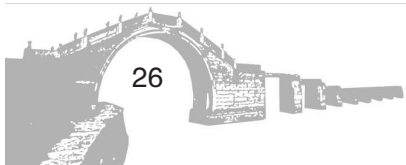
赠徐以懋联

与同志数人，考求农学。

筑小屋几架，罗列奇书。

此联见胡君复《古今联语汇选四集·投赠一》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徐维则（1866~1922），字以懋，清浙江山阴人，与蔡元培同为清光绪己丑科举人，光复会会员，辛亥革命后绍兴农会负责人。金石收藏家、目录学



家。曾在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工作。自幼笃学好古，治金石目录及碑帖、古物等。命收藏精舍为“铸学斋”、“叙史楼”。其著有《东西学书录》、《石墨盒碎锦》等。此联的上联写徐以恣与志同道合的同人致力于农学。下联写以恣好藏书。此联估计为徐以恣新居落成不久蔡元培赠送给他的。蔡元培与徐维则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们不但是同科举人，蔡元培还是徐维则的伴读兼好友。蔡元培因家道衰落，十八岁那年听说徐氏要为其侄徐维则找一位伴读，就由好友田宝棋介绍进了徐府。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的寒窗苦读，以他的静气博览群书，精研小学，涵养大进。他不但校勘了《绍兴先正遗书》和《铸学斋丛书》等许多古籍，使耗费徐氏心血的私人藏书楼条分缕析，初具了雏形，还于光绪皇帝完婚的那年（1889），领着伴读的徐维则赴杭州一起中了举。胡君复《古今联语汇选三集·庆贺》上册还记有当时绍兴贤人赠送给徐以恣的对联。会稽鲍清如贺徐以恣新居落成联：乡土旧感情，聚族已居七百载；楼台新结构，凭栏可数九十峰。此联后注曰：宅在栖凫，栖凫之徐，始自南宋，以恣乃祖移家铅城，复筑室栖凫。又，田祥伯代胡锦涛贺联：大好著书庐，释说文九千言、纂学记三十卷；斯是通德里，与秦望万年古、挹天柱四时春。又，田春农贺联：万古藏书，澹生堂、世学楼，无此峻固；四时选胜，朱华云、花蕊月，俱孕灵奇。此联后注：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越中藏书之最著者。朱华、花蕊，山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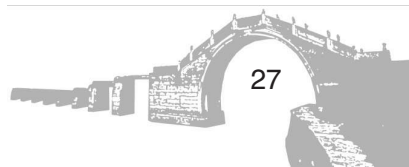
挽杨昌济联

言有物，行有伦，论人格
可谓君子；
学不厌，诲不倦，惜本校
失此良师。

此联见《板仓先生哀词录》。是书是杨昌济逝世后，各方所赠挽联汇编。为杨昌济的侄儿杨开明所抄，伏加芬先生整理。后收入《杨昌济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此为蔡元培先生挽杨开慧的父亲、著名教育家杨昌济生的对联。杨昌济逝世后前曾在北大教伦理学，与蔡元培私交甚笃。此联从大处着墨，知人论世，言简意赅，无一浮词。“君子”、“良师”之语，从朋友和领导者蔡氏的口中说来，很切身份，又很有说服力。蔡元培对杨昌济的尊敬不仅能从挽联中看出，我们还可从另两则文稿中体会到。杨逝世后，蔡元培、范源濂等于民国九年（1920）1月22日再《北京大学》日刊第521号第一版刊登了启事。是启概述了杨昌济生平。启事开头用“敬启者”。文中有“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先生乃来北京，任国立（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参稽群籍，口讲之暇复有译述。精神过劳，因遂致病”、“医者谓其脏腑俱有伤损，医疗非易，而先生之病竟以不治。以吾国学术之不发达，绩学之士寥落如星辰，先生固将以嗜学终其身，天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为教育、为个人均重与可伤也”。做此联旁证，最为合适。

赠印若联



得句旋题新竹上；
寄书多向远山中。

此联现藏于国家博物馆。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辛亥革命名家墨迹展”，展出时间为2011年9月13日~10月20日。展览从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中精选了120件（套）辛亥革命名家的珍贵墨迹。其中就有这幅对联。印若即为翁绶祺，字印若，江苏吴江人。翁同龢门生，工诗文。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后官广西梧州、平安等县。酷嗜金石、书、画，尤精鉴古，善画山水。印摹秦、汉，古拙中含有秀润。画法四王，进窥宋、元妙境。著《汉铜印笈考》。是联为集句联。上联出自宋代苏舜钦诗《秀洲城外》：“当年共醉此桥边，道旧狂歌至暮天。得句旋题新竹上，移舟还傍乱花前。”下联出自唐代陆龟蒙诗《奉和袭美病中书情寄上崔諫议次韵》：“或偃虚斋或在公，藹然林下昔贤风。庭前有蝶争烟蕊，帘外无人报水筒。行药不离深幌底，寄书多向远山中。西园夜烛偏堪忆，曾为题诗刻半红。”联语之间印若的清新浪雅跃然纸上，蔡元培对其的赞美，由此可见一斑。

挽门振翎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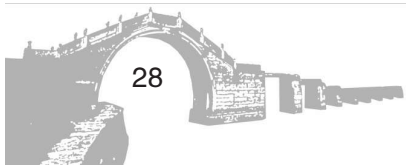
济世具雄才，看桃李成林，自是文儒兼武侠。

返魂无妙术，伤惠兰失荫，不堪风雨望灵旗。

这是邝摩汉逝世后蔡元培送的挽联，后收录于江西寻乌邝氏族谱。邝振

翎（1885~1932）江西寻乌人。二十世纪初国内知名的翻译家、教育家、理论家。字摩汉，号石溪，别署石溪词客。少时家贫，聪明好学；高小毕业后，进南昌宪兵学校读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邝摩汉在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回国之后，从事推翻清廷的活动。民国政府成立后，邝摩汉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政治经济；俄国革命爆发之后，日本国内亦掀起了马列思潮，在这期间，邝摩汉接受了共产主义，并致力于翻译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向国内传播1921年初，邝摩汉回国，任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教授。民国十六年（1927）初，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同年冬，转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上校政治教官。十七年，邝摩汉出版《石溪词存》。后来邝摩汉离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来到北京，任北京文化大学教授和教务主任，于二十一年11月25日病逝。

此联先在网上文章中搜索到，言此联收录于《邝氏族谱》。为了确定其准确性，后通过多方查找，联系上了江西寻乌县留车镇留车村前书记、现寻乌圣维实业有限公司任经理邝春景先生。邝先生肯定的说：十六年前，我在邝氏续修族谱时看过蔡元培、何应钦写给邝摩汉的挽联照片，这几天我去问了几个长辈说是邝摩汉女儿提供的，现在底稿没有了。邝摩汉的女儿叫邝文陵，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已退休，没她的电话。北京寄过来的资料，当时挂在修谱办公室的墙上，有很多挽联，蔡元培、何应钦各一副，他们是历史知名人物，



我对他两个名字记忆很深。

鉴于此，我又给中国人民大学打电话询问，终于辗转得到了邝文陵老师的电话。无奈老人年事已高，再加上我是一陌生人，交流多有不便。不过，邝老师还是告诉我有这么一事情，但是至于对联在哪里，她不记得了。我遂将邝老师电话转给邝春景先生。邝先生很快给我回复了：邝文陵家事大部分由她儿子管，叫邝德生，是四川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我还叫长辈打电话到四川去问。蔡元培、张治中、何应钦给摩汉的挽联真迹复印件，我邝家95年造家谱我都看过。我记的很清。第二天，邝春景先生又给我回复：长辈已联系过，文陵的儿子邝德生已不在世了，他的子女在国外。德生弟在北京，联系过，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无法找到。德生的妻子又精神不正常。所以无法落实！

挽某君联

晓凭闼橐，夜放毡帘，宿学知名，悲君未缮传家易；
已伤刘子，复悼王生，故人书断，累我重题思旧铭。

此联见胡君复《古今联语汇选四集·哀挽二》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铅印本）：蔡鹤庠先生挽某君联云：晓凭闼橐，夜放毡帘，宿学知名，悲君未缮传家易；已伤刘子，复悼王生，故人书断，累我重题思旧铭。蔡鹤庠即蔡元培。《传家易》即《郭氏传家易说》的简写。宋郭雍撰。雍字子和，洛阳人。上联借此言明逝者未完成自己的著作便离世了。遗憾之情溢于言表。《思旧铭》本是南梁著名文学家庾

信为伤悼梁观宁侯萧永而作。萧永与庾信在侯景之乱后，同受梁元帝萧绎命，出使西魏，一同被羁留北方，皆终身不得南归，客死异乡。萧永先逝，庾信为作此文，抒发丧友之痛。此联下联借此表达蔡元培对逝者的思念和悲痛之情。

赠唐世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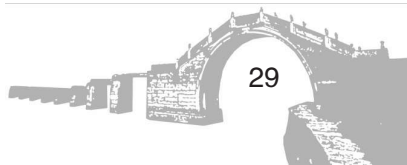
新栽竹始开三径；
大厦人先庇万间。

此联现收藏于我国著名海洋学家唐世风的儿子唐乐明处。唐乐明的父亲曾经为建青岛水族馆，向蔡元培先生提请为青岛水族馆题写过馆名。唐先生的父亲唐世风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都曾多次到过青岛。因为他父亲是搞海洋生物研究的，又知道青岛要建水族馆，所以恳请蔡元培给题写了馆名。至今，唐先生还收藏着当年蔡元培给他父亲题写的一副对联，即：“新栽竹始开三径，大厦人先庇万间。”唐先生说，从这副对联上，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先生对于一个有志青年的提携和鼓励。他的父亲就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激励和关心之下，到英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毅然回国，成了我国著名的海洋学家。

题新昌大佛寺大雄宝殿

理哲家言，同源西圣；
华严法界，现象南明。

此联见《新昌文史》17辑《新昌大佛寺》（政协新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7年8月版，内部资料）。此联写于民国六年（1917），正是蔡元培先生从德国回来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蓄”办学方针之际。此联系他应好友新昌人童



学琦（1868~1939）之请而撰写。蔡元培、童学琦二人同年生又同为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乡试同科举人，可称年友而兼乡友，交往密切。蔡先生长北大时，国史馆改名国史编纂处，附设在北大，蔡即敦聘童任国史馆编纂。当时，新昌大佛寺已由上海哈同夫人罗迦陵出资重裱大佛金身，并修缮五层楼阁，童请蔡先生撰此佛联可惜已毁于“文革”。1982年，大佛寺修复，由沙孟海重书。1987年，赵朴初莅临大佛寺，仰观此联，赞赏有加，作诗称道：“大雄宝殿曲园俞，高阁楹联元培蔡”。前一句指晚清国学大师德清俞樾所撰“大雄宝殿”的匾额，后一句指本联。

赠李捷

亦能画马穷殊相；

欲遣吟人对好山。

此联已毁。此联为蔡元培先生赠送给我著名地质学家李捷先生。李捷（1894~1977），字月三，河北成安人。民国二年（1913）考入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学习地质，师承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中国学者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仅22名，李捷是其中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矿产调查队队长，河北建设厅厅长，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总工程师，水利部勘测设计管理局地质总工程师，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等职。李家在北京东城住一个四合院，不远处是鼓楼古旧的檐阁。院子占地一亩，北房六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子没有倒座房，空地大，遍植花木，树影轻摇。家中客厅一幅山水中堂，两旁是蔡元培的草书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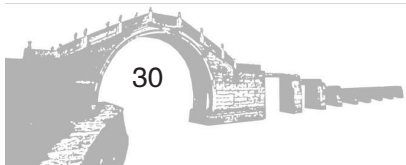
联，首题是“月三先生正”，联曰：亦能画马穷殊相，欲遣吟人对好山。“文革”浩劫一夜之间撕毁了家里的安详宁静，悬挂多年的对联被撕毁。此联为集句联，上联出自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下联出自黄庭坚《李大夫招饮》：“……欲遣吟人对好山，暮天和雨醉凭栏。……”

挽王金发

生死何常，湖山无恙；

智勇俱困，天地不仁。

此联现以照片存。原物已毁。该照片由浙江工商大学理工学院教授、杭州历史建筑研究专家仲向平在杭州二百大后面的收藏品市场淘民国时期的地图时，无意中发现的。两张老照片，一张是王金发就义前，反手绑在木棒上，表情镇定自如；另一张，就是王金发墓局部，主体部分是墓碑。墓冢前面的碑文写着：中华民国六年四月，王君季高之墓，蔡元培敬题。墓碑上没有写王金发，而是写了他的字（王金发字季高）。碑文两侧刻有对联：生死何常，湖山无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这是蔡元培根据孙中山当年闻讯后感叹：天地不仁，歼我良士而写。王金发（1883~1915），嵊县董龙岗人，字季高，号子黎。幼聪颖，性豪侠，爱习武，善射击。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乌带党。二十八年归附平阳党，任首领。三十一年加入光复会，后加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的大通学堂，打算起



义；起义失败后，徐锡麟和秋瑾被捕牺牲，王金发躲过一劫。后曾任绍兴军分都督。民国二年（1913）7月二次革命时，王金发在上海召集旧部，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讨袁失败后，又遭悬赏通缉，亡命日本。三年11月，以巨款贿赂段祺瑞亲信，并由其母出面，向陆军部投诚，准免通缉。四年5月，王金发与同盟会会员姚勇忱到杭州活动，在章介眉的策划下，遭浙江都督朱瑞软禁，6月2日下午4时被枪杀于杭州陆军监狱。孙中山先生闻讯后感叹天地不仁，歼我良士，并誉之为东南一英杰。故蔡元培挽联中云。王金发死后，在杭州昭庆寺为他开了追悼会，王金发“生前的好友，不论在杭与不在杭，均有挽诗挽联以示哀悼”（裘孟涵《王金发其人其事》，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些挽诗挽联当时编成《哀思录》一册，可惜至今遍觅不得，无法一窥时人的评价。只能从一些资料中零星的收集到一些，如马逢伯挽：“怪事起风波，谁教热血男儿，报国未酬吾党愿，英魂归月下，忍见白头老母，倚闾犹是望儿归”；沈颀民联：“沾巾瞻遗像，浩气若长虹”；刘大白联：“生未及见北极新朝，与洪宪皇帝势不两立耳。死犹得葬西湖片土，问兴武将军有此一抔无？”

题台州赤城山玉京洞

山中习静观朝槿；
竹下无言对紫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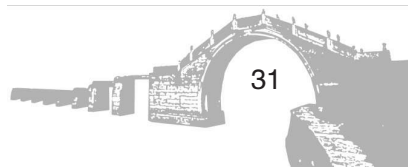
此联收录于李一、周琦编著的《台州文化概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5月版）。此联为集句联。上联集自王维

《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下联集自钱起《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原诗中为“忘言”，对联中为“无言”。疑联误。道教认为，神仙所居住的名山洞穴，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道书说：“十大洞天者，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第二洞天委羽山洞，第六洞天玉京洞，第十洞天括苍山洞都在台州。玉京洞为上青玉平之天，茅司命真君之所治，在天台赤城山。相传元始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说法，令神仙们住在这里。《会稽记》则说：“赤城山有宝室睿台”，许迈曾经在此憩居。许迈给王羲之的信中写道：“从天台山到临海，有很多金台玉室和仙人芝草。”蔡元培所题楹联，极写玉京洞地环境之幽雅。

题陶孝子墓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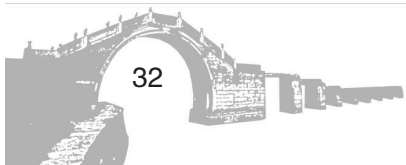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卜云其吉终然允臧。

此联是从《绍兴年鉴（2002）》（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的“地方珍闻”栏目中的《市区新发现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一文中获得。不久，又碰巧在浙江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网络平台上获得此联的信息。但是两则文章中下联有一字之异。前文为“藏”，后文为“臧”。查阅字典后，知应为“臧”。但



是，这也不足以说明道理。为了证实其准确性以及获得更多的详细的资料。2011年12月25日下午，我和夫人乘车到皋埠，下车后，再换乘一辆电动三轮车。到西湖岙村后，询问了一位年纪大约四十岁地中年男子，但是没想到地是我带上夫人去翻译“孝子牌坊”他也不理解，后来了一位中年大姐，一番比划后，我们来到了吼山风景区的石牌坊面前，这自然不是我们要找的。无奈的下车后，穿过坝头山村又来到西湖岙村。这时已是下午3点半。去村委询问，但是无人上班（周末），后来顺道想去请教西湖岙村的村委书记。没想到中途来了一位热心的老太。从她的话语中，我知道她是带我们去看他们村以前的一大户人家的门匾。我心想，反正都来了，不妨去领略一下。中途刚巧碰到一批休闲的老人，老人们说，我要去看的，应该是陶家大坟，在山上。后来，这位热心的老太一路披荆斩棘，好不容易来到了“陶孝子牌坊”面前。一切不假。我拍照后正欲离去，这位老太太说后面还有一块石碑。当我来到石碑旁，一看，原来是“陶孝子”的墓志铭和传，文字精美。石碑坊横头有“大总统题褒”、“孝以流芳”、“中华民国八年”字样，两侧上题“陶孝子墓道”、“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下题“卜云其吉终然允臧”、“蔡元培敬书”。在牌坊的后背不远处，还发现了陶孝子的墓碑。墓碑上有《陶孝子墓志铭》和《陶孝子墓表》。现将《陶孝子墓表》抄录如下：孝子陶姓，讳以桐，字叶封，世为会稽人，晬而孤，母苦节，抚之以长，家

贫，母善病，辍读，营懋迁，以承菽水欢。既娶益艰，困辄斥妇。夤谋甘旨，与妇忍饥而不言，母素患痰喘，体羸甚，旋又便血，继患伤寒，且病胀腹如箕，俱濒危，殆孝子躬厕溺，措汤药，祇粟在视，寝食具废，惫极而病，讳不令母知，夜焚香吁天，祈以身代，精诚所感，母辄因是获瘳。母病中思食菱与豆荚，非时有，东西走百数十里，卒购致之。营一肆，须以时责偿，因母病亟置弗问。侍疾十五年，跬步不忍离，未尝一入私寝，致忧敬先意承志，匆匆如也。里有某甲素忤逆，过孝子，见事母状，乃大感悔，至泣下。母既歿，哀毁几灭性。岁时供饷，忉然追慕，至老弗衰。既为母以苦节请旌如例，复躬习堪輿，茧足行万山中谋兆域，曰：“非迷信，以徼福也。盖不忍吾亲体魄之所安，而为风水之所蚀，卒获吉壤以葬其亲。”盖《孝经》所谓“生事爱敬，死事哀戚”者也。孝子有从父某，饶于资，丧其成年之子，为谋立继，分宜以孝子之仲子为之。后有成言矣，而为人所惑，乃不立孙，而立子。从父见孝子则忸怩，孝子转善慰之。以《孝经》所谓“以敬事长则顺”也。孝子少时尝两拒私奔女，而不以告人。晚年因诫勉其子孙而语及之，然终隐其名，以存忠厚，则又孝经所谓“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孝子以民国癸丑九月十二日寿终里第，春秋七十有二。阅五年，有司采访以闻。大总统玺书褒扬，并颁题额曰：孝闾流芳。宜哉！夫人韩氏，亦贤孝，生女子一，适任。男子四：德新、德滋均先歿，德微由县幕积资授荐



任赞樞运，有声。德聪，前清候选县丞。孙十：为璋、为珩、为璜、为琛、为琥、为珏、为琮、为琪、为璿、为瑶。曾孙四人：本蕃、本藻、本芑、本苞。以民国癸酉十一月卜葬于本邑吼山之原，德微与庆澜次子桐同僚，相友善，以状来乞为文，是不可以无述为刺状，而表之如此。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岁次丁丑四月。

国民政府振务委员会委员长，前广东省省长愚弟朱庆澜拜撰，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愚弟徐谟谨书。

从《陶孝子墓表》中不难看出，陶以桐是无愧于这幅对联，而且也恰如其分。此联的上联出自《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意思是：孝顺的子孙孙层出不穷，上天会恩赐福祉给孝顺的人。下联出自《诗·邶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孔传：“允，信；臧，善也。”意思是占卜的人说，这一卦很吉利，结果真好。从联语中，也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对其的赞美以及对其后代子孙的祝福。

挽高奇峰

岭云江花失知己；

天风海涛为招魂。

此联见《高奇峰先生荣哀录》（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辑，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高奇峰（1889~1933），晚清画家，名崑，字奇峰，以字行，广东番禺（今广州）人。留学日本，同盟会员，与兄高剑父、陈树人画脉相连，画技高超，有“二高一陈”、“岭南三杰”、“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等盛誉。素有

画圣之称。高奇峰于民国22年（1933）11月2日下午3时5分病逝于上海。12月7日，在中国殡仪馆公祭。12月9日由皮亚士总统号运枢归粤。12月19日，国民政府颁发命令，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发治丧费二千元并派吴铁城前往致祭。23年2月10日，遗体由高氏家族葬于广州河南新凤凰岗基督教坟场。24年12月17日孙科、中委蔡元培、孙继、监院院长于右任、财长孔祥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以高奇峰逝世业已二周年，生前对党国殊多建树，且为一代宗师，特呈请国府，准予迁葬首都陵园附近。由此可见，高奇峰在蔡元培心中的地位。除此以外，蔡元培、孙科、罗家伦、于右任、黄宾虹、林森等人合撰《高奇峰先生行述》。生前，蔡元培还推荐刘海粟与高奇峰成为美展的代表，由他们代表中国赴欧展览画展，后来因为高奇峰病逝于上海，此次赴欧画展只有刘海粟一个人去。民国26年（1937），高奇峰遗作《高奇峰先生画集》出版，蔡元培为他写下挽诗：“革命精神彻始终，政潮艺海两成功。介推岂肯轻言禄，笔底烟云供养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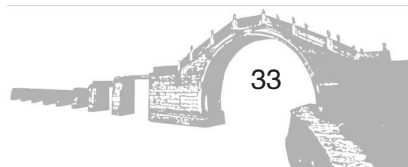
此联虽简短，但是蔡元培对高奇峰逝世的悲痛之情溢于联表。

题王卧山百龄追纪

立德立功；终古不朽；

善继善述，事亡如存。

此联见王家襄《绍兴王卧山先生百龄追记徵文集》（民国十二年铅印本）。王卧山即王家襄之父王官亮（1824~1879），原名人龙，榜名恩宝，字卧山，山阴人，道光二十九年



(1849) 顺天举人，咸丰三年(1853)以知县揀发广西，由河南奏留补用。此联上联概括总结了王官亮的一生。下联是对王家襄对其父追记之举大加赞赏。王官亮的一生的“德”、“功”，我们可从凌文渊为其所做传中窥见一斑：前清咸同间，粤匪之乱，中兴诸将帅以书生将兵，立功名于天下者，指不胜数，要皆有所凭籍，从未有孤身远寄，邂逅临戎，以客将而将士卒，以却大敌而立奇功，如钱塘张勤果公及绍兴王卧山太守，尤足多焉。然勤果之功，载在国史人尽知之，而太守之功，则人有不尽知者矣。太守以道光己酉科顺天乡试举人，官永康教谕，擢知县，揀发广西道，出河南巡抚。陆公奇其才，奏留之。太守有姑丈余公炳燾，知怀庆府，太守往省之，会粤匪入河南向怀庆，太守说余公及河内县裘宝塘募团勇千余人备城守，余公壮之，以太守总其事，贼昼夜环攻城，几危者数矣，太守激励士卒，更番抵御，或乘夜缒。死士斫贼营，杀其骁将，贼愤以地雷轰城，城堕，余公陷瓦砾中，太守驰往救之，身率健卒，冒烟突火，设法堵御，贼不得逞，死守五十七日。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及钦差大臣胜保以大军至，内外夹击，贼败去。当是时，洪秀全方据金陵，乘锐分兵两道北犯，东入山东，西入河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闻贼至，即望风弃城走，贼行千数百里，如入无人之境，清廷震惊，不知所措。及怀庆大捷，而贼东道兵由山东入直隶者，亦为天津民兵所挫，贼逐夺气南归。至是，不敢复轻中原，而湘淮两军

因是得併力，南方卒以灭贼。向使怀庆不守，贼由晋入燕，湘淮两军阻於南方，寇而不得进，清之为清末，可知也！故怀庆之功与天津等，清之存亡系焉！捷闻太守晋同知知河内县，既而署怀庆府，补浙川同知，署归德督粮通判，所在有声，以劳晋知府，逐归，以疾终于家，子四人，前参议院议长幼山先生，其季也。先生以太守卒时，年甫八岁，于太守功德不及纪述，今年五月六日，为太守百年冥辰，乃撰次太守事迹，乞当代立言君子，为文以纪之，文渊不文，谨论次太守怀庆之功，以为关于兴亡者，甚钜立言，君子庶有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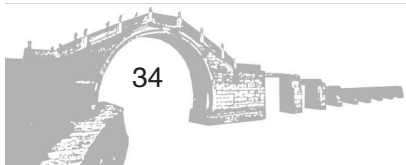
世愚侄凌文渊敬撰并书。

挽王佐联

直谅多闻，平生风义兼师友；

刚讷近仁，邦国老成有典型。

此联见《上虞声三日报》(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二日)：王佐(1853~1931)，字寄庵，上虞丰惠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恩科举人。学问、人品受人称道。蔡元培曾专程到丰惠向王求教“经学”。十六年，知县唐煦春主修《上虞县志》，王荐蔡任总纂，自任分纂。二十四年在丰惠经正书院开办上虞算学堂。二十九年，八县学务公所在绍兴大善寺成立，蔡任执行部长，王任纠察部长。三十一年被省民政厅委任为上虞县商务分会总理。三十三年任省保路会副会长。宣统元年(1909)先后任省咨议局、清廷资政院议员。三年任永嘉教谕，不久离职返乡。同年与陈春澜、朱鸿儒等在丰惠创设春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提倡实业，改良农田，振兴



地方经济。为振兴教育，王佐与经亨颐多次与陈春澜会商，最终促成陈于垂暮之年出20万元巨资创办春晖中学，并出任校董事会首届董事长，擘划筹备事宜。民国20年（1931）病逝。墓葬横塘王家埠。王佐在世，百姓得惠；王佐病故，举城哀悼。在他的丧期里，虞城乡贤、远近生前友好都曾来吊丧，学界泰斗、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也赶来丰惠沉痛悼念。气氛之肃穆、声势之浩，堪称空前。《上虞声三日报》刊载《王寄老先生哀挽录》。其中，有大部分时人所送的挽联。如蔡元培的撰写的挽联是：“直谅多闻，平生风义兼师友，刚讷近仁，邦国老成有典型。”经亨颐撰写的挽联是：“尽瘁一生，人往梦魂临北海，阔别十月天，寒桃李哭春风。”范寿康撰写的挽联：“入资政院、列众议会、对于变法、改制、利国、强兵之大政方针，概持正论，真所谓：心如可以尽则尽，事如可以为则为，德风偃草播万里；筑沙湖塘、兴春晖校、举凡育婴、赈饥、修路、濬河等公益事宜，躬行首创，诚堪称：先邑人之忧而忧，后邑人之乐而乐，口碑载道足千秋。”徐锡骥撰写的挽联是：“出而代表国民，议政矫唯阿陋习，处则广培学子，养蒙申勤俭良箴，人去典型存，长留不死精神，明明在上；

教伯兄图光复，宜专心物色同仇，怜仲氏被幽囚，为尽力呼号营救，交亲患难见，深感先生侠义，耿耿当中。”

蔡元培先生所撰挽联的上联中，“直谅多闻”，语出《论语·季氏》：“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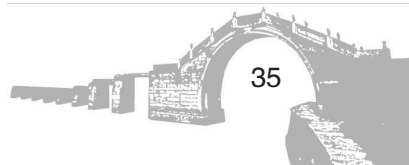
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也。”言王佐为人正直信实，学识广博。“平生风义兼师友”，摘自李商隐的《哭刘蕡》，一是借此说明与王佐的关系，一方面表达怀念之情。下联中的“老成有典型”，语出明·袁宏道《书念公碑文后》：“及余归柳浪，而念公适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极言王佐年老有德，深孚重望，堪为人师表。

赠马鉴

万卷藏书宜子弟；

十年种木长风烟

此联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由其子马临先生捐赠。马鉴（1883~1959），字季明，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文史学者。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曾流血美国，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有藏书斋名“老学斋”，藏书甚丰。马鉴在南洋公学读书时见到蔡元培常鞠躬行礼。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后，他随特班同学一起转学至爱国学社读书，受恩师蔡元培的影响，毕生主张教育救国，与日伪势不两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赴香港大学执教，任中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蔡元培为他的书房老学斋题写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以资鼓励他终生从事教学活动。此联摘自黄庭坚《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其一：“食贫自以官为业，闻说西斋意凛然。万卷藏书宜



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未尝终日不思颍，想见先生多好贤，安得雍容一尊酒，女郎台下水如天。”此摘句联并非蔡元培先生首创，在之前，已有多人写过。如清朝时的瑶华道人赠摘此句题写在孔府。后孔府后人孔令贻在自己经常读书学习的前上房西里间墙壁上，也题写了一副对联：“万卷藏书宜读，十年种木长春。”与此类似。

为少湖书

醉来谰语关经济；

手把奇书慰寂寥。

此联为手迹，存于绍兴市文物管理局。款署“蔡元培”，铃白文印“蔡元培印”、朱文印“鹤庐”二方。下联有“金懋鉴藏金石文字书画印”朱文印一方。

此为集句联。上联集自道光乙未（1835）举人蒋湘南所作诗《醉来》：广厦长裘意已疏，文章报国更谈虚。深源诂系苍生望，韩愈犹怀宰相书。西极屯田烦将帅，南中民力尽河渠。醉来谰语关经济，腐气豪情两不除。下联出处待考。此联是否为蔡元培先生首集，还值得商榷。近览博客，偶读画家、美术评论家、新闻传播学者曹鹏博士的博文，得知郁达夫曾在《语美画刊》上刊发了这副对联：“又立读了一本《语美画刊》，1937年终刊，办了三年多，是天津的上流社会的文艺小报，内容很精彩。……我抄下了里有一副郁达夫的楹联：醉来谰语关经济；手把奇书慰寂寥。”由此可见，两联有一字之差。《语美画刊》1937年终刊，办了三年多，是天津的上流社会的文艺小报。而

两位此时都是在世之人，孰先孰后。待考。

挽刘半农联

其人如春风冬日；

尽瘁于文字语言。

此联见于2005年5月20日《江阴日报》：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病歿。他44年短暂一生是与文字打交道的一生，留下著书立说约五六百万字，正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亲手题写的挽联所称：“其人如春风冬日；尽瘁于文字语言。”刘半农曾创办并主撰《世界日报》副刊，虽然只有短短的7个月，却是他一生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他专业从事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拐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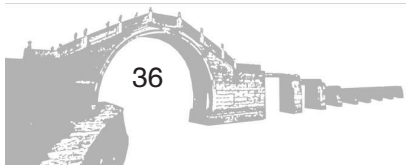
此联极力概括了刘半农的人品性格和学术成就。其逝世后有人辑《刘半农先生挽词》于民国23年（1934）10月13日北平《世界日报·国语周刊》，惜未能查阅到其藏于何处，未能窥其全貌。不知里面是否收有此副对联。但观此联，不合传统对联的标准，平仄不协，词性不对。“其人”，名词性词组；“尽瘁”，动词性词组。而且上联是主谓结构，下联是动宾结构。倒更像是题词。待考。

题《越铎日报》

春风吹开锦绣谷；

晚岁犹存铁石心。

此联见娄国忠《蔡元培与对联》（《绍兴县报》2001年1月21日第七版）：1912年1月，由鲁迅、陈子英、孙德卿等发起创办的《越铎日报》在绍兴出刊。报馆落成之日，蔡元培题写“春



风吹开锦绣谷，晚岁犹存铁石心”的对联相贺，同时加横批：“铁心绣肠。”上联说愿报纸像春风吹开锦绣谷一样，文采斐然。锦绣谷，庐山山谷名；南宋庄季裕：“《庐山记》载：‘锦绣谷三四月间红紫匝地，如被锦绣，故以为名。’”下联说人即使到了晚年，也要斗志不衰，保存毫不动摇的铁石心肠。联语寄语报社同仁既要用文人的锦绣心肠为文办报，又以矢志不渝的铁石意志坚持原则，为民请命。笔者就这副对联的真实性先请教了文章的作者娄国忠，问其引自何处，无奈成文已久，忘其出处。笔者遂又致电蔡元培研究专家、绍兴文理学院钱斌老师，她表示也不得而知。再后来，笔者听绍兴市图书馆古籍部的鲁先进老师说鲁迅纪念馆藏有《越铎日报》，遂请原鲁迅纪念馆馆长裘士雄先生查证，看《越铎日报》上是否有此联。最后查证的结果是没有，当然，也并不能据此说明蔡元培没有题写这幅对联无。待考。

题西湖艺术专科学校联一

濒湖望波，天水一色；

旧楼新颜，书画五彩。

题西湖艺术专科学校联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此两联收录于俞泽民先生编著的《西湖楹联与景典》（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民国十六年（1927），哈同花园由浙江省政府勒令收回，作为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名国立西湖艺术专科学校，即今中国美术学院最早前身）校址，蔡元培先生亲自撰写两幅联文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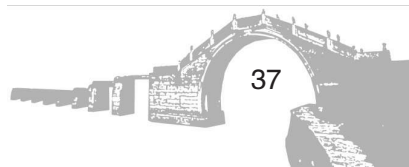
贺：濒湖望波，天水一色；旧楼新颜，书画五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联文对仗工整，含义深刻隽永，一时引为杭州文坛佳话。”为了确认其准确性，我通过西湖文化研究会辗转联系上了俞老先生。当我在电话里说明用意后，俞老先生肯定的说，这对联他见过，可惜书稿积累多年，忘记了从何处抄录这两幅对联。俞泽民先生是西湖文化研究会顾问，俞平伯后裔。抗美援朝前期入伍，尔后长期在空军军事院校执教，文革后期进入杭州照相机厂，主持创办我国第一本摄影器材专业刊物《照相机械》（现名《照相机》）。曾被聘任《浙江协作论坛》常务副主编，晚年致力于杭州西湖文史研究。断然不会杜撰此两联。但在《全集》中，题“西湖艺术专科学校联二”是“为新加坡中华俱乐部书联”。且上下联颠倒，并有跋：“新加坡中华俱乐部以提倡同国人实业教育为鹄的，而陈设均用国货，爰集语为联以祝之。”题联的时间是民国六年（1917）5月，并著名此联原件藏于浙江美术学院，现据张晓夫提供之复印件。自然，蔡元培先生的“为新加坡俱乐部书联”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但俞泽民先生的关于题西湖艺术专科学校的这两联还待考。

题浮山朝阳洞

藓崖直上飞双屐；

云洞前头岸幅巾。

此联现存刻于青岛浮山朝阳洞，朝阳洞是建于元代朝阳庵道观遗址上的一个天然花岗岩石洞。洞口左右现存有蔡元培先生题字刻石楹联，右联是：“藓



崖直上飞双屐”，旁款：“性全先生雅属”左联是：“云洞前头岸幅巾。旁款：“蔡元培”。此联为摘句联。摘自陆游《游城西诸僧舍》：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薛崖直上飞双屐，云洞前头岸幅巾。万里欲呼牛渚月，一生不受庾公尘。非无好客堪招唤，独往飘然觉更真。据原崂山文物研究所所长张开明先生考证，朝阳洞门口的楹联刻石是20世纪40年代时任燕京大学堂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题写，联中的“性全先生”就是曾国藩的亲嫡孙曾明本的道号，满清政府败落后，曾明本遂进山入道教当起了道士。而《蔡元培全集》（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据青岛大学张亚利抄录提供说这副对联是为“青岛湛山寺所做”、“性会先生雅嘱”，这是两个错误。此联非为“湛山寺”所作而是为“浮山寺朝阳洞”所作。湛山寺位于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太平山东麓，是繁华市区内唯一的佛寺。始建于民国21年（1932），山门有两石狮，传为明代遗物。我致电湛山寺工作处询问，答曰此处无朝阳洞，亦无蔡元培所题的对联，反倒是在网络上搜索可见朝阳洞的存在。而朝阳洞在朝阳庵之左，朝阳庵又名全圣观，浮山寺、浮山庙、潮海观等。原崂山文物管理所所长张开明研究员据考证，朝阳庵道观始建于元代，是北七真谭处端所创全真南无派道场，被列为《崂山道教建筑群庙宇名录》119座中的45位。现已不存。只存这朝阳洞。可见，抄录有误。根据实物可见，“性会”实为“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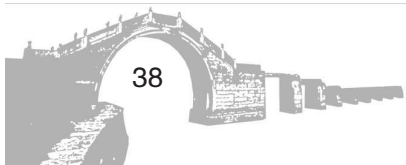
题赣县湖江乡夏府谢氏宗祠敦五堂

先人有燕翼贻谋，无论为
文德为武功，承绍允推贤子弟；
地势得象山灵秀，从此产
英雄产豪杰，勋名彪炳泰东西。

此联见于赣县湖江乡夏府谢氏宗祠敦五堂《赣县县志》记载：在夏府谢氏宗祠“敦五堂”中厅楹联为蔡元培先生所题，联曰：“先人有燕翼贻谋，无论为文德为武功，承绍允推贤子弟；地势得象山灵秀，从此产英雄产豪杰，勋落彪炳泰东西。”款处为：梅庵蔡世信敬撰宣统己酉元年孟冬月立。梅庵是地名，蔡世信是元培先生的别名，蔡元培先生是浙江梅庵人，所以如此落款。清朝末年重修该祠时元培先生赠联于此。还有人认为：蔡元培是清光绪进士，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何以为夏府谢氏宗祠撰联？这是因为在清末年间，夏府谢氏族入谢成珪任国立京师大学教授时，与蔡元培先生共事教育，交往甚密，结下了深厚友谊，故在重建谢氏宗祠敦五堂时，特请蔡元培撰联增辉。蔡元培为表示对友人族中建祠的祝贺，就撰了本文前面所列这副楹联。

后来，我在绍兴市图书馆查阅了与蔡元培有关的各种图书，都没有蔡元培先生的别名是“世信”的信息，蔡元培先生祖籍是绍兴市诸暨东白湖镇陈蔡村。后迁居山阴笔飞弄。亦无悔庵之地名。为此，笔者还专门请教了蔡元培研究专家、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钱斌老师和绍兴蔡元培纪念馆馆长章大来先生，他们都不认同这种观点。

其实蔡世信是真有其人。蔡世信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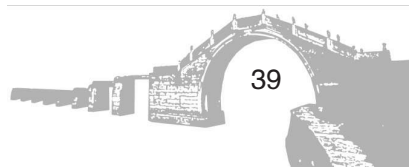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曾任歙县知县。网上有文说其故居在现在的赣州西大街菜市场的对面。赣州市老年集邮协会会长谢宗瑶老先生见过这位蔡先生，甚至记得他的名字叫蔡世信，是清代留下的赣州籍最后一个进士，解放前才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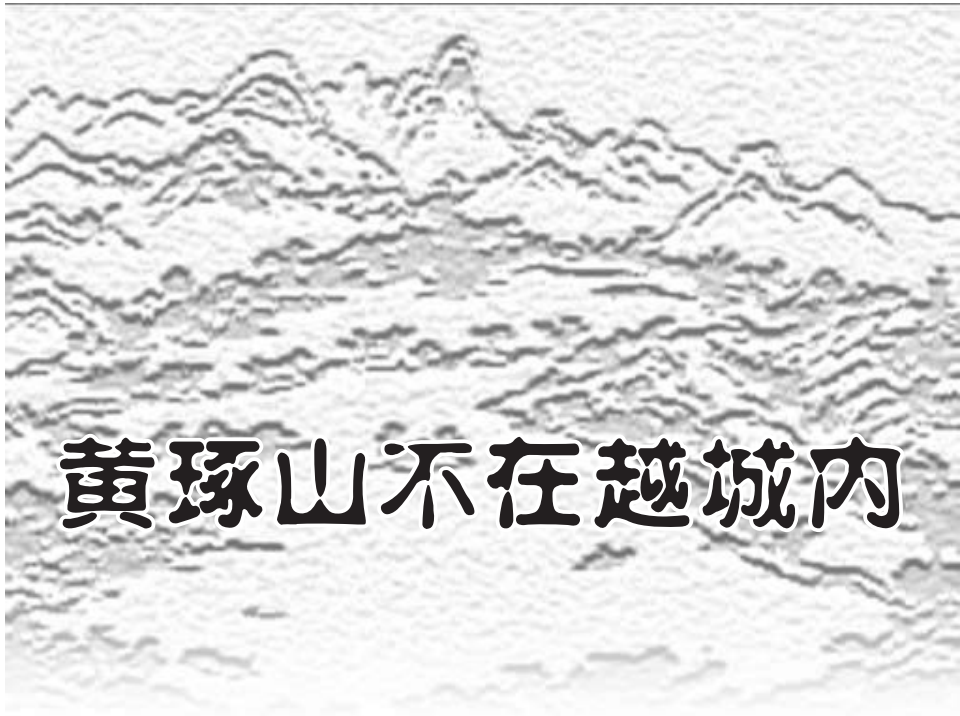
后来我打电话到江西赣州联系谢宗瑶先生，无奈谢先生所在的老年集邮协会没在114上登记电话。本打算就此作罢，碰巧的是在新浪博客里看到了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赣州市散文学会会长、《赣南日报》主编龚文瑞先生的博客。遂把意图告诉龚先生，龚先生表示已有两年未与谢宗瑶先生联系。而谢老先生年事已高（90多岁），我与之交流恐怕不便，本打算就此作罢，没想到龚先生给我发来了如下一段文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赣南各县编印的县志中，由于一味提升本土形象或取悦领导意图，结果出现了一些将民间谬误或口头文化当作正史进入县志的现象，如上犹将苏东坡到了安合乡阳孝本家并题匾、留诗、垂钓等情节补入，如赣县将孙中山、蔡元培到过湖江夏府留了对联等补入。结果，一些研究者或发现其伪而唾弃，一些研究者不知真情而信以为真，于是苦苦寻根，却难以得到更多的史料佐证。比如孙中山真来过湖江吗？没有！真实情况是戚家有人在南洋组织捐款支持同盟会，而同盟会中恰好有人在孙中山身边，正值戚家宗祠建成，遂请孙中山撰联；比如蔡元培真为戚氏宗祠

撰写过对联吗，没有！对联中落款为“梅庵蔡世信……”，蔡世信其人并非名闻天下的蔡元培，而是清末赣州城的最后一名进士（谢宗瑶老先生早年甚至见过此人），而“梅庵”则不是地名，乃其书斋名或别号，如同李可染的师牛堂或有君堂等一类，文化人多取书斋名或印章或字号来表达内心一种理念或追求，梅庵为世信先生书斋名，传达他时常自悔过失的高尚品质。“梅庵蔡世信”的意思是指赣州城西大街居住的清末进士，试想，在民国初夏府建成宗祠时，戚家人请当时的赣州城的学界名人世信先生来写对联完全是一件相匹配的事。梅庵世信先生本属于当时一方名人，然而当代人却嫌不够味，硬要把此蔡世信与彼蔡元培混淆，似乎以此可以提升夏府的地位与荣耀（其实，夏府的文化已然很有品位，大可不必！）让人觉得当代人太过功利与无聊和无知！

后来，我又就对联落款的问题请教了绍兴书法家朱非老师，朱先生也认为：书画落款在名字上面加斋号或地名是通用做法。绍兴无悔庵地名，蔡元培亦无悔庵斋号。朱非老师还针对我传给他的夏府的所谓的“蔡元培”所作的对联做了一个评价，认为：此联字体明显脱胎于颜体，用笔浑混。蔡元培的书体较为瘦劲，用笔似不经意，此联非蔡元培所作。

据上所述，这副对联非蔡元培所做，应是赣州蔡世信所作为确。





黄琢山不在越城内

□ 娄如松

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并序》在描述绍兴城内山丘时，有曰：“八山中藏”。句下有细注：“府城内有八山：种山、怪山、戴山、火珠、鲍郎、蛾眉、彭山、白马山。”无黄琢山也。

《嘉泰会稽志》卷第九，府城内对山的记载，也只八座，亦无黄琢山。

清雍正间山阴举人成周助为《山阴旧志续考》作序。序略云：

越城向传八山，张岱定为九山。九山者何？黄琢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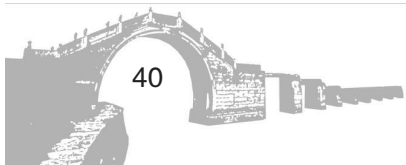
在华严寺后，南去予家不远。

由此知之，在府城内华严寺后有“黄琢山”，此论起自明代张岱。

陈桥驿先生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引回的《越中杂识》，认为绍兴城内是存在第九山，即黄琢山的。其在上卷《山》篇，开篇记述完府城内八山后，又有黄琢山的记述。文曰：

黄琢山，在草子田华严寺后。

按：张岱记越城内为山者



八：卧龙、火珠、蛾眉、宝林、鲍郎、蕺山、白马、彭山是也。而不知华严寺后尚有黄琢一山，土中带石，大过蛾眉，岂可于鞋鞞下失之，则越州城内之山当称有九。按卧龙、火珠、蛾眉、塔山、鲍郎、蕺山，隶山阴；白马、彭山、黄琢，隶会稽。

张岱定黄琢山为越城第九山，以其史学家的眼光，应不会有错。成周助家在华严寺北不远处，对黄琢山应是知根知底的。《越中杂识》作者西吴悔堂老人，仿佛是曾履黄琢山，“土中带石，大过蛾眉”的描述，能不相信吗？

此以后，尤其是在今天，在记述绍兴的史地著作中，多将黄琢山排列其中，认为绍兴城内，是有“九处山丘”的。如《绍兴市志》载曰：

正是因为时间紧迫，小城的建筑不可能把这一带九处孤丘聚落都包罗在内，而是选择了在九处孤丘中最高的种山东南麓兴建。

与小城在一处的这“九处孤丘”，除王十朋所言之“八山”外，另一处即是“黄琢山”了。

绍兴城内究竟有无“黄琢”此山，考证一下，就显得有点意义了。

《越中杂识》载曰：“黄琢山，在草子田华严寺后。”看来，黄琢山与华严寺有些关系。《康熙会稽县志》有“华严寺”的记载。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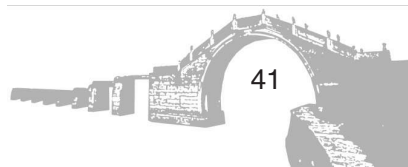
华严寺，在县东南二里。旧去县七十里。陆游记略：会

稽五云乡有山曰“黄琢”。山之麓原野旷，水泉冽，岡峦抱负，岩嶂森立，而地不治者，不知几何年矣。或谓古尝立精舍，以待天衣、云门游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后寺废石亡。庆元三年，马君正卿闻而太息，乃与弟崧卿，以事亲收族之余赀，买地筑室，择僧守之。乃告于府牧丞相葛公以“华严”额徙置焉。严维诗：“福地华严会，王家少长行。到宫龙节驻，礼塔雁行成。莲界千峰静，梅天一雨清。禅庭未可恋，圣主寄苍生。”

《康熙会稽县志》只载华严寺“在县东南二里”，而无华严寺有“黄琢山”的记载。记述有“黄琢山”者，只是在所引录的“陆游记略”之中。“县东南二里”，正在绍兴城内，说明康熙时期，华严寺在绍兴城内了。而《康熙会稽县志》又载曰：“旧去县七十里”，句中这个“旧”字，省略了华严寺在南宋庆元三年（1197），曾在“会稽县五云乡”黄琢山之麓，新建“华严寺”这一段史实。“去县七十里”，《嘉泰会稽志》载为“县东南七十五里。”

南宋时期，新建在黄琢山山麓之华严院，是在绍兴府城内，还是在绍兴府城外，这将直接给出“黄琢山”是否在绍兴城内的答案。这，可以从《嘉泰会稽志》卷第七所载“华严院”条入手。其文云：

华严院，在县东南七十五里。咸通九年赐今额。寺久



废。后移五云乡。今方广院乃其子院尔。

先要说明的是：《嘉泰会稽志》对寺院的记载，寺院在府城内，载在“府城”名下；寺院在府城外的，则载在该寺所县邑名下。如“华严寺”，不在府城内，而在会稽县五云乡，它就因此载在了“会稽县”名下。从这一点看，黄琢山，不在绍兴城内。

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九，有《会稽县新建华严寺记》。《康熙会稽县志》对“华严寺”的载文有曰“陆游记略”者，即其开篇语也。开篇首言：“会稽五云乡有山曰‘黄琢’”；又继言：“山之麓原野旷，水泉冽，岡峦抱负，岩嶂森立”；所有这些对华严寺的描绘，都说明“华严寺”不应在府城内。

又：“岡峦抱负，岩嶂森立”，与《越中杂识》所言“土中带石，大过蛾眉”，相差何其大也。所谓“大过蛾眉”，“蛾眉”，即旧绍兴城内八山之一“蛾眉山”。蛾眉山在轩亭口，《越中杂识》载为“山高丈余，阔三丈，长数十丈”，“望之如蛾眉一弯”。陆游描述黄琢山的文字“原野旷，水泉冽，岡峦抱负，岩嶂森立”，当不是虚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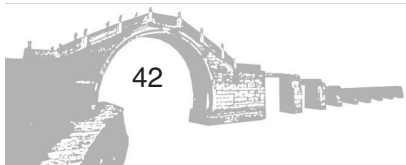
而“土中带石”，现在，绍兴城中这种“土中带石，大过蛾眉”的“山丘”，不知又添了多少座，如以此计之，绍兴城内岂止“九山”哉！还要在此补充一

句的是：数十年前，在华严寺址，未曾见有所谓的黄琢山。近几年，在其址建新寓，亦未见有黄琢山被平去。

《会稽县新建华严寺记》撰于“庆元五年八月”。又从文中有曰：“以‘华严院’额徙置焉”，新建在五云乡之“华严院”，是当时“府牧丞相葛公”，从“去县七十五里”处拿来“华严院”额，到黄琢山麓新筑华严院的。因为这处黄琢山曾有“古尝立精舍，以待天衣、云门游僧之至者。”因此，南宋庆元间筑于黄琢山麓之华严院，应该在去天衣寺、云门寺之道上，即五云乡也。明确地说，是出稽山门至黄琢山这一片地域，都在宋时会稽县五云乡的范围内。对于五云乡黄琢山麓之华严寺，《康熙会稽县志》无记载。

主要参考文献：

- 1.《陆放翁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6月版。
- 2.《嘉泰会稽志》，采鞠轩藏版。
- 3.《康熙会稽县志》。
- 4.《绍兴地方文献考录》，陈桥驿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 5.《越中杂识》，西吴悔堂老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 6.《绍兴市志》，任桂全总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拯救南半截胡同和绍兴会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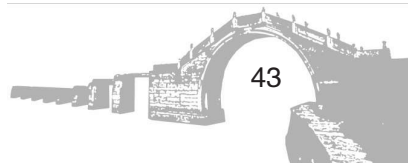
□

王洛

王迁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提高，一批具有历史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古迹正在被人们遗忘和毁掉。特别是坐落在民居与古迹犬牙交错的旧里中，或是即将被改造开发的地段中，摇摇欲坠的古代名胜与建筑将被商业大厦、新建住宅所代替。在党中央提出文化强国战略的今天，这种无视历史和文化的势头值得我们引起重视，否则将成为一件令人痛心和绝望的遗憾事。如何处理好开发与保护，将是政府（尤其是区、县、镇政府）刻不容缓的责任和任务。

众所周知，北京是一个文化城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集中地，也是许多封建王朝建都之地，古今中外许多优秀人士和文人墨客曾在这里留下过许多辉煌的历史、轶事，更有文脉和典故佳话。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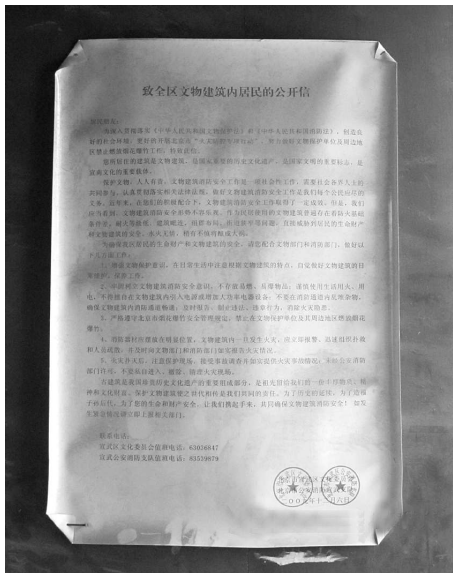
而，北京要成为现代化城市，要开发和发
展，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背街小
巷、四合院和民居胡同将要随着城市大发
展、大开发而被改造或拆除，而淹没在其中的
北京南半截胡同以及绍兴会馆的命运也岌
岌可危，这是值得引起重视与思考的。

本文之所以提及南半截胡同和绍兴会
馆，不仅是因为有家乡情结，更是因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保护和传承中华文
化，当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南半截胡
同、绍兴会馆、湖南会馆等将会在城市大
发展、大建设的浪潮中奄奄一息时，每一
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都会发出拯救
的呼声。

说起南半截胡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
和文化趣事的地方。它形成于明朝年间，
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的菜市口以南，这里也
叫做牛街地区，被统称为“绊脚胡同”。其
范围大致是，北与北半截胡同相连，南至
南横西街，东西则分别同菜市口胡同和烂
幔胡同相邻，其中部的东侧还有一个天景
胡同。“绊脚胡同”全长约385米、宽4.2
米，门牌号码从1号开始到55号。因为地
形的“s”形折弯故定为南北各一半，被叫
做南半截胡同与北半截胡同。

在历史上，与绊脚胡同有关的历史轶
事和古迹比较多。明朝崇祯年间，菜市口
一带是刑场，为防止抢劫刑场根据地形的
特点曾部署防卫军事力量以大兵横贯，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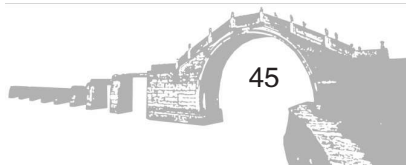




使有人劫刑场进了北半截，也进不了南半截，过不了南横西街。清朝康熙时期，绊脚胡同的南端至米市胡同一带，有礼部尚书王崇简和他的儿子大学士王熙时的别业（即“怡园”）旧址，由江南叠山园林大师张然建造，园内叠石凿池、花木葱郁，足有二十余景，是清初有名的江南宅第和特色园林。在绊脚胡同靠近南半截北端的地方，有一座始建于清朝道光六年（1826）的大院落叫“山会邑馆（后改称绍兴县馆）”，这就是著名的绍兴会馆，旧址位于南半截胡同4号，现为7号，主要用于接待来自浙江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会馆门前曾有一棵大槐树，如今大槐树虽已不在但院落的模样与先前大体一致。据资料记载，这座绍兴会馆的建筑，有“仰级堂”、“涣文萃福之轩”、“藤花别馆”、“绿竹舫”、“嘉阴堂”、“补树书屋”、“贤阁”、“怀旭斋”和

“一枝巢”等。其中，中国伟大的文化先驱鲁迅先生也曾在此居住过七年之久，1912年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诞生在这里。绊脚胡同分为两半的名称（即南半截胡同和北半截胡同）一直被沿用至今，绍兴会馆也被北京市命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笔者注意到，在这些胡同里建造的房屋都不高，一座座砖瓦砌城的墙垣式门楼一个挨着一个，走进门楼内全是砖木结构的大杂院，院内年久失修杂乱无章，密密麻麻的私搭乱建比比皆是，从斑剥的红漆中依稀可辨旧时的辉煌。绍兴会馆经过历史的变迁已经面目全非，如果不是门口挂着“文物保护单位”这块牌牌，人们不但很难说出它的历史，而且也早已同文化无缘了。前不久，笔者走访了南半截胡同和绍兴会馆。眼前看到的到处是高楼耸立，而谭嗣同故居、绍兴会馆、湖南会馆等一批名胜和古建筑都被淹没在都市化的高楼大厦之中，有些地方已被圈为拆迁的范围。笔者走进绍兴会馆，右边第一间58岁的刘姓住户告诉笔者：民国时期这里有大红柱子，墙上有直挂的老式电话，嵌有7至9块石碑，石碑上镌刻着绍兴人历年科举考试中举的人名，还有许多匾额悬挂其上，后均不知去向。大殿中间原有大鱼盆和石头栏杆，四周的窗户是用纸糊的。后来，大殿被拆掉盖起了居所房子，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人们纷纷在家门周围搭起了防震棚，后来这些防震棚经过加固成了现在的模样。这位刘姓住户还说，他的母亲





是1949年搬来住的，门口的这棵石榴树就是她母亲所种，至于原来的那棵大槐树直径有近1米，结果被锯掉了，后来补种的大槐树现在也已经很苍老了。如今，在紧靠大门朝西尚有一排

颓败了的房子，从屋檐和横梁还能看见经历了几百年沧桑的灰瓦。据说，这里家家户户臭虫很多，又是板壁房，条件简陋又没有暖气，卫生设备也是公用的。

有意思的是一个时期来，随着房价和地价的升值，“南半截胡同什么时候拆迁！”，“请问谁知道菜市口南半截胡同会拆迁吗？”的呼声越来越强劲，一些开发商也正因为此办着动迁、圈地、造房等手续而兴致勃勃。也许是因为审批的程序比较麻烦和需要时间的等待，更需要资金的筹备等等许多原因，这才使这一地块的改造和扩建不能“如愿”办下来。可是，这一趋势告诉人们：这里早晚会被拆掉的。开发商在等着，盼望拆迁和改善的居民在等着。如何妥善处理开发与保护，如何传承中华文化，人们拭目以待。



辛亥前后绍兴人的兴农活动

□ 蔡彦

辛亥前后，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给民族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一部分绍兴人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企业丰厚利润的引诱，投资兴办实业；一部分人投入商界，积累起一定财富，逐渐形成了“绅商”阶层。其中“兴农”活动的出现由于与传统的“农为邦本”和“不仕则农”思想最为接近，而率先在社会上形成高潮。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虞人罗振玉和会稽人徐树兰等人，在上海集会研究农业科学和从事农业科学实

验，并在当时的维新报刊《时务报》和《知新报》上刊登征求会友的《公启》和《章程》十二条。罗等申言“农学为富国之本，中土农学，不讲已久，近上海同志诸君，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表示要“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公启》登出仅一个多月，东南各省官员、士绅纷纷来函表示赞成，并提出了种种实施方案。当年夏，在一批绍兴人的推动下，我国近代第一个有组织，有章程、有活动、并有一定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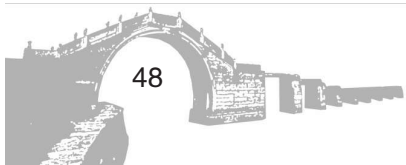
的农学组织——上海农学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由该会创办的《农学报》开始出刊。《农学报》的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各省农政，即国内各级地方官员关于农业方面的奏折、公文；二是各地农事消息和务农会办事情形；三是自东西洋农业报刊上翻译的文章。虽然从表面看《农学报》仅是一份科技期刊，但纵观《农学报》的筹备和编辑过程，已经体现了一部分开明官吏和士绅顺应时势，力图对原有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进行改造的愿望。只是他们不知道农业部门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只凭一己之力对现代化进行囫圇吞枣式的学习和应用，其结果可想而知。

“农学会”中“学会”的含义，梁启超解释说：“士群曰学会”，意思即士大夫们所组织的团体，这与现在所说学会涵义是不同的。农学会的《试办章程》里说“本会应办之事：曰立农报、译农书，曰延农师、开学堂，曰储售嘉种，曰试种，自制肥料及防虫药，制农具，曰赛会，曰垦荒”。对于会员资格，《试办章程》规定：“凡官绅士商及寓外国之中国人，寓中国之外国人均可入会。惟妇女及方外人，并品行卑下人不得入会。新入会之友必求其品学名望在会之友素知者”。又规定会员每年须缴“会费三至六元”，因此一般民众是难以加入该会的。

农学会的成立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言：“农学会，

梁启超与诸同志共创之于上海者也，至是乃采章颁行，破旧例愚民抑遏之风，开维新聚众讲求之业”，这是“智民而利国”的大好事。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为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曾下令督饬各地方官振兴农务：“农务为富国基本，亟宜复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垦者尚多，著各省督抚督饬该父母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当其了解到“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后，感到“颇开风气”，即“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其海外农学诸书，并著各省私塾广为编译，以资肄习。”六月二十日又发布上谕：“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在“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号召士绅阶层参与兴农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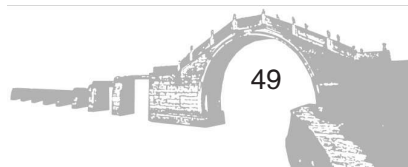
宣统二年（1910）正月，山会农务分会假借郡城汤公祠为会所成立，但“并未举定总理，仅推职员俞官圻领衔，又仅据造送章程一份。诸多未和。”宁绍道指示说：“随时劝令进行。”当时农事试验场有：“十七都一图银山坡（今上虞东关）地方，有官荒一百五十九亩零，于光绪三十三年，有职员王世柄等集合股本，禀县批准开办农场，招工开垦，约得田六七十亩，余者皆山，循用旧法栽种谷类。宣统元年转租于朱绅念慈，除谷类外，加种桐、桃、李、竹、橘、柑、柏、麻各种，只以土质饶薄，每岁收入不抵支出。又白塔荒山，去年



由江苏候补知县邵闻洛禀奉宪台批准，试办农场，招工开垦，种植各种农产品，经费困难，未甚得手。其余若孟绅宗鲁之在黄墩泾，马绅图南之在樊江，均设有农桑试验场，禀由县署立案。地址较小，试品无多。”据宣统三年《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记载：清末山会两县除沙地、山荡外，已无可供开垦田地。这些农事试验场由于规模小，地处偏僻，普遍生存艰难。

辛亥时期，在土地紧张的状况下，绍兴人开始向“粤匪乱后，土民稀少”的浙北杭嘉湖和江苏昆山、松江地区迁移。光绪二十六年（1900），绍兴人汤寿潜、徐尔谷，上虞人罗振玉与张謇等人发起成立通海垦牧公司，“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俾垦与

牧”，兴办农企从事农业生产。集股股本以“规银22万两为准，每股规银100两，共2200股”。《公司章程》明确提出公司创办的目的：“一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一为国家增岁入之资，收本富之利；一储通海小学堂、农学堂经费；一务使公司获最优之利，庶他州县易于兴起。”通海公司先后出资230万元用于垦牧区农田水利建设，这些资金的投入，逐步改变了原有小农经济的种植模式，为机械化作业创造了条件。《会稽劝业所报告册》称：“绍人置产乐业与土著殊览和洽”。在通海公司创办同年，陈春澜在上虞试办春择垦牧公司、农事试验场、大同殖业银行，实行农产品产销一体化，这是绍兴本地较大的近代农企。



徐锡麟创办热诚学堂

和大通学堂始末



□ 陆 杨

徐锡麟出生在绍兴东浦的一个名门望族。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革命活动家，著名的革命烈士，在安庆起义中，他以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徐家有田地百余亩，在绍兴城里开有“天生绸庄”和“泰生油栈”两家商铺，父亲是绍兴颇有声望的士绅。

一般人会认为，这样一位刺杀朝廷命官的革命党，一定是言辞激烈、性格刚强、行为粗豪之侠客，但少为人知的是，徐锡麟同时也拥有着极高的天赋，中过秀才，又在乡试中被列入“副榜”，还热心办学。徐锡麟喜欢读书，特别喜爱天文数理，常通宵观察天象，绘有不少天象图，并自己动手做了个浑天仪，上缀群星，十分精细。因为他精通数学，1901年被聘为绍兴府学堂教习，后提升为副监督（副校长）。后来

在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副监督期间，还亲自教授代数、天文、地理等科目。1903年夏，他编了《代数备旨全草》共四册，供学生学习之用，是中国最早开始自编教材教授科学知识的教师之一。

1903年春，徐锡麟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到日本后，耳闻目睹的与国内情况大为不同，大大打开了思路 and 眼界。身在异国，对祖国的受侵略、被欺凌的感受更加具体、更加深刻，深深感到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在日本期间，他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各项活动，并结识了革命志士陶成章。这次日本之行，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使徐锡麟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从日本购买了武器和大量书籍带回中国，准备开展宣传，进行斗争。

近年有人统计，在中国历史上，1903年是“革命党”一词出现最多的

年份。但是鼓吹革命党、争取民族独立、积极追求个人权利，仍是在国外留学生的广泛接受和为之奋斗的思潮，国内虽然暗潮涌动，但是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和培训的地方却少之又少。

因此，徐锡麟从日本回国后，萌生了在家乡东浦办学的想法，于是四处物色校舍。有一次，他到西周淩附近的吕祖殿斗坛去参观，斗坛里的司事（即负责人）以为他是去捐助的，所以把徐锡麟迎进庙里。交谈之后，徐锡麟提出了将斗坛的一半地方改办成学堂的要求，司事的脸上满的笑容顿时显出尴尬的表情，徐锡麟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就若无其事的告辞而回。

徐锡麟回去后，与同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陈志军、陈赞钦等人商议，决定派人直接去斗坛里推倒神像。这样一来，触怒了司事，他以“破坏斗坛、扰乱治安”为罪名，向山阴县控告徐锡麟，不久，山阴知县就令差役到东浦捉拿徐锡麟，由于他不在家，所以差役直接把陈赞钦带回山阴县。徐锡麟毫不畏惧，向绍兴知府熊起繙提出了拟将东浦西周淩斗坛改办成学堂的要求，还禀告了山阴县纵容“司事”、逮捕留学生这件事。知府熊起繙认为，地方热心办学应当奖励，因此不但答应了在斗坛办学一事，还斥责了山阴县，同时当即下令放出

陈赞钦。而陈赞钦这时却摆起留学生的架子，不肯离开牢房，非要山阴县给个说法。最后知县当众赔礼，才勉强离开，也算是给了山阴知县一个教训。徐锡麟回到东浦，立刻把知府的办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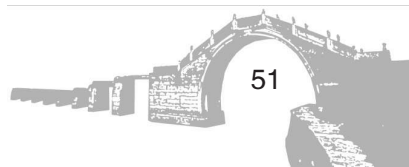
示贴上了斗坛的墙壁，司事见到不但陈赞钦被无罪释放，绍兴知府还出了办学的告示，只好服从。于是斗坛的一半地方被改办成了学堂。

学校开办时，徐锡麟联合了当地十位乡贤，共同捐资200银元。200银元是什么概念？据相关研究，1901年与1903年的物价指数相当，1901年有记载100斤（合597克）米2个银元，一亩中等田地20银元到30银元之间，一个农民的年生活费大约合15银元到20银元。可想而知，这200银元的购买力有多少，因此，初建学校时，设施是比较先进的。

学校刚开办，一切具备，却没有学生来报名。徐锡麟便借东浦的土地庙开起了动员大会，动员家长们让子女上学，承诺免费入学，且有免费糖果吃，因此入学者颇为踊跃。斗坛的一半场地改办成了学校，但另一半每逢节日却依旧是敲敲打打，影响孩子的学习。徐锡麟便以此为理由，进一步向知府提出了将斗坛剩下那部分场地也改办成学堂的要求，不久就成功照办，校舍也得到了扩充。

由于办这个学校的初衷在于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和培训革命志士，在1904年4月18日，徐锡麟更亲撰一副楹联：“有热心人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明确指示办学宗旨，要求学堂的师生要具有救国热心与革命诚意，学校遂以“热诚”命名。

热诚学校由当初和徐锡麟一起筹备的东浦名士曹钦熙担任总理，任教的有徐锡麟和留日同志，还有后来五四名人



列大白、魏金枝，以及当地文人沈复生、沈重九、许瑜舟，秋瑾留日回国后曾来校任教。学生数十人，当代作家许钦文及其妹妹是首批学生之一。此外，还招收城内和诸暨上虞来的住宿生，由于办学经费不足，本地教员完全义务，外地教员多是徐锡麟在府学堂教过的学生，都是他培养中的革命者，因此薪给很低。因此课程的设置比较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除国文课外，还设有算学、天文、体操、修身、历史、地理等课程，四年级更开设了英文课。对于兵武体操课尤其注重，学校中设置了多个操场和池塘。

徐锡麟他爱护学生，常出资给清寒子弟购买生活用品。有一次，徐锡麟带了一队学生去绍兴大校场看比赛，一名叫全坤生的学生突然生病，他马上亲自带学生去附近诊所看病，还负担了医药费。正是因为这些，一年之内，学生人数从几十人猛增到一百多人。暑假后，学校增设高小一班，但对普通学科不甚研究，特别注意兵武体操，徐锡麟还从南京兵轮上雇来一名军乐家，教学生军乐。

当时，徐锡麟一面在绍兴府学堂任教，一面在热诚学堂兼课，每天往返于绍兴和东浦之间，十分忙碌。早上晨操毕，去绍兴府学堂教课和处理校务，午后回热诚学堂，步行往返，风雨无阻。他在授课时，经常介绍时事政治，宣传革命，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904年以后，热诚学校一度成为绍兴光复会的活动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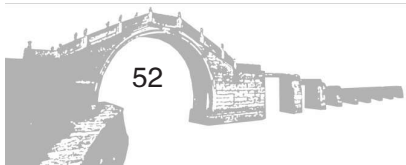
在创办热诚学校之后，徐锡麟对兴

办教育更为热衷。1904年，他又和教育家蔡元培、王子余等人在绍兴万安桥创办明道女校（即现北海小学前身），成为浙江省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的秋瑾放假回绍兴后，徐锡麟邀请她担明道女校当体操教习。秋瑾把从日本学来的柔软体操教给女生，代替以往拳术训练。所谓柔软体操，就是现在喊口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的这种体操。因此秋瑾也是近代中国第一名女子新式体操教员。

1904年底，长江下游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光复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徐锡麟闻讯后前往上海拜访蔡元培，当天陶成章也在蔡住处。蔡和陶向徐介绍了国内的革命动向，以及光复会的组织经过和奋斗目标。徐当场表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同时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加入了光复会，成为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后更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与各地会员联络中，徐锡麟发现，虽然会员众多，也有一定势力，但明显素质偏低，要想联合各派并发挥作用，必须加以培训和教导。因此，徐锡麟萌生了创办一所“武备学校”以培训会员骨干的想法。

1905年7月，筹备工作开始。创办学校首先面临办学经费的困难问题，徐锡麟于是与热诚学校总理曹钦熙商量，曹钦熙早年在党山许仲卿家教书，深得许信任，由他出面，向光复会会员、绍兴富商许仲卿借银5000元，以绍兴府学堂学生进行体操演习为名，请绍兴知府熊起蟠批准，从上海购得后膛九响枪



50支，子弹20000发。有了经费和武器，徐锡麟又开始为学校选址。

当时东浦有座下大桥，也叫大通桥，是徐锡麟的祖上所造，后来为了使过路人能有一个避雨休息之处，又在桥边建了几间屋子，后来发展成为一座寺庙，即普济（大通）寺。因为大通寺是徐家祖产，于是和住持商量后，徐锡麟就借用几间寺里空屋，把武备学校的地址选在了这里。一开始学生仅10多人，大都从热诚学校物色调来，以练习游泳和射击为主。但是大通桥上往来农民很多，有些人看到这里的学生总是练习游泳，感到奇怪，总是切切私语。时间一长，这件事就被徐锡麟的父亲知道，唯恐发生意外，于是就到大通寺要住持收回房屋。

就在徐锡麟为重新选址感到为难的时候，绍兴城内山会两邑豫仓（备荒谷仓）董事、候补知县徐貽孙所得知了此事，他想从提倡学务中获得好评，以求进阶，便主动找到徐锡麟，表示愿出借豫仓的空屋作为办学之用。学校马上就从东浦迁到了古贡院前，以豫仓空屋为校舍。名称仍为大通师范学堂，但以军事训练为主。还向浙江学务处递交办学申请，提出专门设立体操专修科，学员经过6个月的培训后，回乡替政府创办团练。当时的清吏们被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迷惑，认为言之成理，便批准了大通学堂的创办申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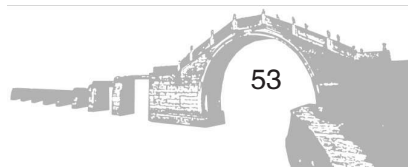
大通学堂的课程设置以体育为中心，尤其重视军事体育，包括兵式体操、器械体操、夜行军、爬山、泅水、军号等，学校的教学设备也主要是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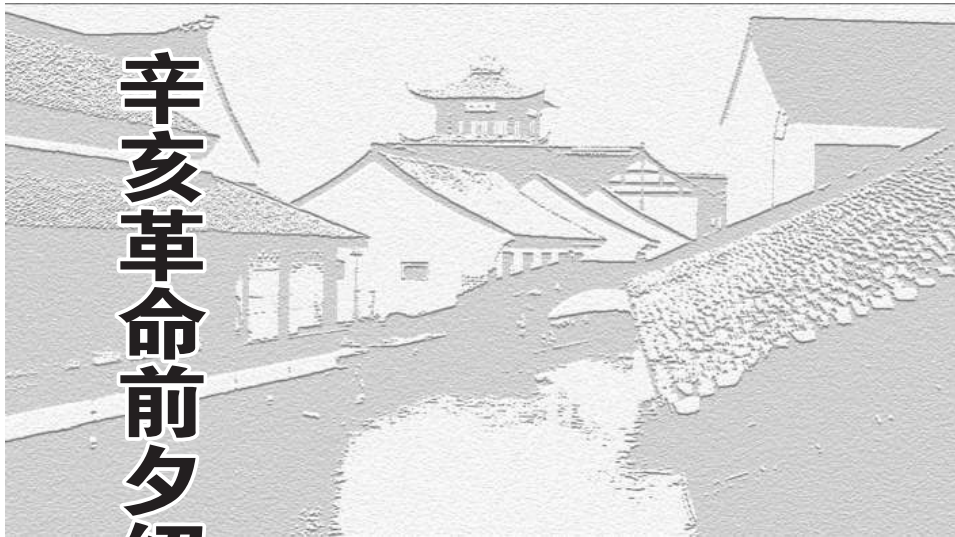
演习用的枪支弹药，并配有天桥、榴木、平台、铁杆、木马、秋千、铁环等体育操练器械。大通学堂设特别班和普通班，特别班学生全部都是会党成员，只练操习武，不修其他学科。而普通班招收一般的青年学生，文武兼学，除学习文化基础课程外，也同样重视军事训练。

徐锡麟亲自担任射击教员，每次练习前必先作示范，对学生动作的要求一丝不苟，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则不论多少，即兴加以奖励。在生活上，他对学生十分关心，晚上常为学生盖被子，夏天则为学生掖蚊帐，对生活困难的学生，还自掏腰包给予资助。由此也获得了学生的爱戴。

1906年12月，徐锡麟赴安徽从事革命活动，大通学堂由女革命家秋瑾接办。为筹备皖浙起义，秋瑾进一步加强学堂军事训练，并于此创建光复军。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案件涉及绍兴大通学堂，7月13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在此被捕，学堂即遭清政府的查封。辛亥革命胜利后，大通学堂旧址创办了“大通女子工艺学校”。1928年，绍兴“徐社”社员为纪念徐锡麟烈士，在旧址创办“锡麟小学”。

徐锡麟与早期革命党人在绍兴开办学堂，虽则初衷是作为革命宣传的中心和革命武装的训练基地，但也为开绍兴学风、介绍西方思想做了大量实际的启蒙工作。可以说，绍兴近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与徐锡麟的努力息息相关，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辛亥革命前夕绍兴新式学堂兴起成因初探

□ 董思思

众所周知，教育在传播思想、普及文化、启发民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重要前沿阵地，绍兴不仅为辛亥革命贡献了大量民主革命志士，而且在传播近代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深远影响。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绍兴掀起一股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包括绍兴府学堂、会稽县学堂、明道女校、大通学堂在内一大批倡导新式教育的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这些学堂有别于传统教授“四书”、“五经”的封建私塾书院，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知识理念，特别是有关经济、科技等实用主义学科内容，倡导革新、追求创造。新式学堂不仅大力培养实用技术人才，而且积极宣传民主进步思想，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和组织准备。因此，研究绍兴新式学堂兴起成因，对认识了解绍兴近代教育的

发展演变及多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历史富有积极意义。

而在探究成因时，我们一方面要综合考虑清末民初的时代大背景，另一方面要具体分析绍兴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须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做到宏观与微观兼顾。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准确立体地反映绍兴新式学堂的形成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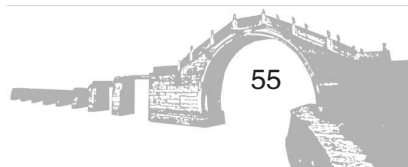
一、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为新式学堂的建立奠定经济基础

早在明朝中后叶，中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以通商口岸为平台，通过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方式，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在截断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分解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19世纪60、70年代，在洋务运动诱导之下，中国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开始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在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兴办近代工业，建立了诸如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至19世纪末，清政府放宽办厂限制，中国出现了兴办企业的浪潮。这些新式企业建立后，亟需大量技术型人员操作机器设备。然而，通过科举取士选拔出来的士子举人，除了吟诗作对、钻研八股外，对实用技术一窍不通。于是，开办新式学堂，满足各行各业对专业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成为民族资

本主义深入发展的迫切愿望。有人甚至指出：“我商民阅历有余，而学问不足……必也先授以普通学，次进之以商式、地理、历史、论理、算术、代数、银行、簿记、经济、船舶、递送、保险、机械、商法、商品等学，使其平日究研实验，明白考求，而后应变随机，折衷取当，取益防损，厥用靡穷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运动中，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沪杭宁商贸重地的绍兴自然不甘落后。据《绍兴市志》记载，清末，绍兴府继续保持浙江四大丝绸生产基地之一的地位。1879年，山阴、会稽、上虞、嵊县、新昌、诸暨6县，年产蚕丝2051担；丝绸纺织业主要集中在山阴华舍、齐贤一带，宣统三年，两地有织户1639户，织机3400台。1895年，首家机器缫丝厂开源永丝厂，在会稽县曹娥白米堰（今属上虞县）建成投产。设缫丝车208台，日产厂丝100斤，为浙江省首批（共10余家）机器缫丝厂之一。此后，绍兴境内丝厂、铁工厂、机器修理厂、纱厂、织造厂、染厂、发电厂等纷纷兴起。正是得益于夯实的基础，绍兴地区的新式学堂才具备了成批建立的条件。

二、科举制度废除为新式学堂的建立扫清前进障碍

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清政府的无能统治日益为民众诟病。甲午中日战争，更是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全国上下要求革新体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政府迫于压力，于



1898年6月11日，宣布实行新政，其中在教育上，决定创设京师大学堂，将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尽管维新变法只持续了短短百日，但是其在教育方面的改良举措无疑为新式学堂在全国的建立打开了大门。在此影响下，绍兴府各县陆续改原有书院为官立小学，有识绅商亦纷纷捐建学堂。是年九月，诸暨毓秀书院考棚改设官立学堂，是为绍兴地区最早出现的新式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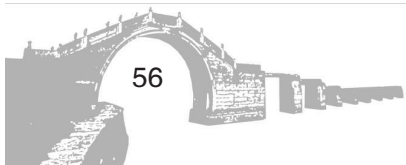
1902年，清朝政府颁布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系统的文件——《钦定学堂章程》，详细规定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紧接着又在1904年，颁布《重订学堂章程》，除详细修订各级学堂章程外，对学堂体制、科目、管理通则，考试办法都作了规定，初步建立起与学堂有关的规章及管理体制。据此，绍兴地区学堂依程度分为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初高等并置）。如嵊县二戴书院改办县立高等小学堂，上虞县经正书院改办官立高等小学堂，会稽县娥江书院改办曹娥区立两等小学堂。

1905年，爆发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促使清廷部分统治阶层亦深深意识到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是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

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封疆重臣联名上奏朝廷，明确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请求立停科举，推广学堂。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和压力，清廷不得不于9月2日发布谕旨，宣布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寿终正寝。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大量采用新学制、传授新知识的学堂纷纷建立。以浙江为例，全省11府遍设府立中学堂。1909年，绍兴地区（含山阴、会稽、诸暨、上虞、嵊州、新昌）有小学堂273所，成立高等教育学堂——绍兴私立法政学堂。1911年，绍兴合府小学堂发展至438所，其中山阴、会稽两县133所（含府城23所）、上虞县48所、嵊县66所、新昌县31所、诸暨县160所。

三、留学生涌现为新式学堂的建立提供智力支持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动荡、矛盾尖锐、问题凸显。当时，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试图采用各种方法拯救祖国于危难，这其中就有一部分人出国留学，希望能够在海外汲取先进经验，找到治国良方。根据游学目的地的不同，留洋学生主要分成留日和留美两大类。鉴于地缘、人员因素影响，绍兴知识分子多是赴日留学。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1902年，清国留日学生608人，而浙江占84名，位于全国第三，这84名中，山



阴、会秘两县就有14名，占全省六分之一还多。陶成章、鲁迅、许寿裳、秋瑾、徐锡麟、陈伯平、孙德卿、王金发、范爱农等一大批绍籍青年都曾东渡日本留学。这些留学生在国外接受先进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同时，却也目睹着异国实力蒸蒸日上、繁荣昌盛，遥想自己祖国依然贫困落后，百姓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内心的痛苦和煎熬岂能用只言片语来形容。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教育救国”的理念，将新式教育作为救国图强、富国强民的根本途径。曾先后任职于山阴县学堂、绍兴府学堂的徐锡麟就认为，中国贫弱且遭受列强欺凌之根源在于“中国之科学不足恃”，要改变被动局面，就必须奋发图强，大力提倡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在“教育救国”理念的感召下，包括鲁迅、许寿裳、秋瑾、徐锡麟、孙德卿、姚麟在内的大批留日学生，或亲力亲为创办学堂、或捐献家财资助办学、或充当教员言传身教，从各个方面积极地从事新式教育的宣传和推进工作，为绍兴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越郡公学、大端工艺女子学堂、孙端竞成商业学堂、震旦蚕叶女校等新式学堂纷纷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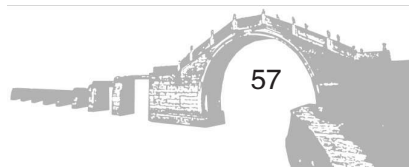
四、革命力量助推为新式学堂的建立增添发展动力

新式学堂大规模兴起之时，也正是辛亥革命紧锣密鼓的准备时期。伴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加之长期遭受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

双重压迫，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除了需要大量科技实用人才外，还迫切渴望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上谋求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落后的封建官僚制度显然无法满足其要求，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最大毒瘤。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从最初的温和改良逐步走向武力革命的道路。

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等志士创立以推翻封建帝制、驱除列强为宗旨的光复会，缔造了一段反清革命的光辉历史。绍兴作为光复会的母地，诞生了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众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他们不仅留下了彪炳史册的革命伟绩，而且大多从事过教育工作。究其缘由，光复会的骨干们总结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教育在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培养革新之人才，“通过办学校、报刊，把革命教育作为启发青年觉悟的手段，开发民智的工具，推动革命的武器”。

1905年，徐锡麟、陶成章等开办大通学堂，以响应清政府发展教育、倡办团练为名，积极培养和发展光复会骨干。学堂除开设音乐、图画、英文、日文、代数、测绘、国文、地理、历史、理化、生理、教育、伦理等常见西式课程外，还十分注重军事体能训练，设有器械体操、兵式体操、夜行军、爬山、泅水等科目，吸引了诸暨、东阳、永康、缙云等周围地区的反清志士纷纷前来报名。此外，东浦的热诚学堂，东湖的通艺学



堂，城内府横街的明道女学堂，越王台西侧的绍兴府学堂等新式学堂，均是光复会在绍兴的活动据点。民主革命的风起云涌，使得绍兴地区的新式学堂如借东风，加速了发展步伐。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前夕绍兴新式学堂的兴起绝非偶然现象，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新式学堂不仅呈现出有别于旧式封建私塾书院的独特属性，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当时乃至后世的绍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鉴于个人精力有限，仅拙笔梳理小部分内容，企盼各位行家里手多提宝贵意见，积极探讨交流。

参考文献：

1. 胡国枢《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
2. 任桂全主编《绍兴市志》，浙江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 乔志强《辛亥革命前夕学堂的兴起》，中华书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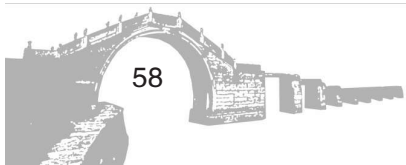
4.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

5. 朱顺佐《试论光复会群体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基础》，《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6. 朱顺佐《简论光复会群体的教育思想》，《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7. 沈建乐《论辛亥革命前后的绍兴知识分子》，《中国人才》1988年第3期。

8. 王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历程述论》，《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所载山阴安昌娄氏宗谱资料正误

《中国家谱总目》

□ 娄仲安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第五册 2859 页载：“336—0001 [浙江绍兴] 山阴安昌娄氏宗谱不分卷（清）娄学忠纂修。清雍正十三年（1735）稿本，一册。始祖诚信，明代人。始迁祖凡，明清之际迁山阴（今属绍兴）安昌。台北‘中央图’美国犹他。”

美国犹他州图书馆所藏不论。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该谱，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台著名民俗学家娄子匡先生曾亲手抄录，并将转录复印稿一部寄赠绍兴亲友。今据以订正《中国家谱总目》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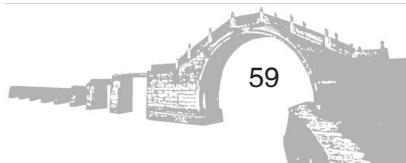
一、宗谱纂修时间。

《中国家谱总目》谓该谱系“清雍正十三年（1735）稿本”，误。

该谱《原序二》后确有“雍正三年己巳三月七世孙起敬序（换行）九世孙学忠谨书”字样，但实非雍正时稿本。细阅全谱，知系娄学忠纂修于乾隆年间。兹列谱内之依据六项：

1.《茂义堂匾额记》云：“乾隆年间奉移一二三世祖神主归于安昌，开典铺亦用茂义堂为号，明所自以志不忘也。”后署“学忠又书”。

2.未冠以“凡例”名之“凡例”首条即云：“此书于乾隆五年草创于履安公之手，乾隆四十年忠重辑。”



3.《记》云：“遂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迁……棺共十一具，合葬于茂义堂之废基。”

4.《祠堂记》云：“吾族于乾隆二十八年议建祠堂。”后叙厉鬼事且在乾隆三十一年。

5.《守节》目下之周氏、胡氏载明卒年，一在“乾隆丁丑（二十二年）”，一在“乾隆辛巳（二十六年）”。

6.此谱所载世系止于七世，第七世卒年已多在乾隆年间，第六世卒年亦有在乾隆年间者。所记事晚至乾隆三十八年七世届远公与妻孙氏、王氏分别诰赠修职郎与八品孺人，此时三人均早故世。从谱文看，“届远公，行三，名美钊，号坦斋。考授州同。乾隆三十八年诰赠修职郎。生康熙八年己酉十一月廿六日，卒雍正八年庚戌四月初一日。六十二。”先载诰赠，再记生卒，应当是修谱时所撰写；孙氏、胡氏同。至于记卒年时间，最晚是七世重威公之妻漏氏，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则或许有后来续填的可能。

以上各项，足证此谱系娄学忠纂修于乾隆年间（“乾隆四十年忠重辑”）。“雍正三年”（不是十三年）是七世孙起敬撰原序的时间，九世孙学忠重辑时予以录存而已。

二、安昌始迁祖。

1.姓名。《中国家谱总目》谓“始迁祖凡”，误。

《茂义堂匾额记》云：“三世祖仰南公生四子，长曰微公、次曰凡公迁居安昌。”此处之“曰”字，是名字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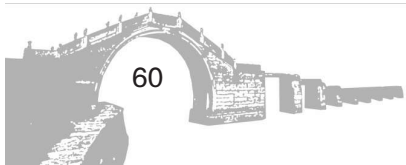
部分。谱中世系部分：

四世：曰微公、曰凡公、象谦公、曰俞公。

五世：“曰微公长子建之公”，“曰凡公长子翼先公”，例多不举。

2.始迁时间。《中国家谱总目》谓“明清之际迁山阴（今属绍兴）安昌”，不确。

族中故老相传，娄氏始迁安昌的时间在明万历年间。考谱所载，四世祖曰微公、曰凡公分别生于万历十一年、十四年，至万历末正当壮年。与一世祖诚信公正德末受宸濠逆案牵连从江西上饶避难山阴张川（今华舍街道张湊村）不同，四世祖从张川迁居安昌是为了开拓家业，正须趁年富力强，若晚至明清之际，不但年岁已老，且是乱世，而且又与宗谱所载义仆子勤在安昌创业服役多年之情不合。谱中《勤毅子相记（相一作勤）》云：“子勤者……吾四世祖曰微公所买之仆也。曰微公偕弟曰凡公来安昌廛舍贸易时，子勤奔走服役，朴实老成，吾祖许事悉以委之。”“服役多年，勤劳无间”，娄氏创业多赖其力，故卒后私谥“勤毅”，甚至入祠受祭以酬其义。子勤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卒于崇祯十五年，一般买仆时总挑未成年的半大孩子，故推测子勤到娄家的时间亦不会迟至万历末年以后。明清之际则子勤已故，岂能始来安昌且再服役多年？故从几个时间因素推测，娄氏始迁安昌至迟当在明万历末年。族中故老所传，亦可作为佐证。



对宋人凌景夏的几点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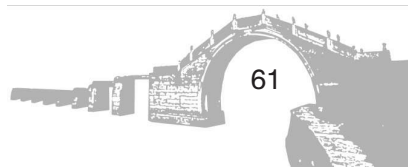
□ 凌基强

凌景夏在绍兴的行踪,在正史中只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提及,《嘉泰会稽志》和《宝庆续会稽志》及后来其他历代绍兴的地方志中 đều 无记载。直到王子余先生编撰的“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根据“鹿池山凌氏家谱”第一次将其列入绍兴名人,所以在“绍兴县志”中也有其名。但在“绍兴市志”中依旧没有入编。这次我到北京复制的是“会稽凌氏家谱”,说明在民国初年,当时尚有两种版本的凌氏家谱,但现在“鹿池山凌氏家谱”已被毁消不见了。开始我以为“会稽凌氏家谱”是由“鹿池山凌氏家谱”改名而来,因为“鹿池山”名气不大,而“会稽”则在文人圈子里都会知道,在这次直接查看了“会稽凌氏家谱”的中缝,发现也是“会稽凌氏家谱”六个字,而不是“鹿池山凌氏家谱”七个字,因此断定当时有两种版本。而我从陆游的“初夏游凌氏小园”一诗,按陆游的经历和与凌景夏的交往,分析出小园即是凌

景夏后代的住所,佐证了“会稽凌氏家谱”中凌景夏因恋会稽山水而定居鹿池山的真实性。绍兴文理学院邹志方教授在其2008年出版的《陆游研究》一书中,已采用了我对陆游的“初夏游凌氏小园”一诗中的凌氏,系凌景夏后代住所的考证结论(P271)。

“会稽凌氏家谱”书中页面十分干净,没有圈点过的痕迹,看不出原先是城内哪一房的物品?也没有是哪一年收藏进国家图书馆的记载?

对凌景夏的考证也是抢救性的搜集,因为现在凌家山近千人中不知原凌家山村的历史,更不知先祖是谁,而我们离开了凌家山的凌姓人员中,家谱在文革中都毁掉了,知道情况的老人大部分已过世,现活着的当时只十岁左右,只知道传说,而没有看过家谱。当时我们这一支有150人左右,但这60年来都走散了,1997年我来绍兴查找,希望能有资料保存下来。可找到的仅5人(户)。



李慈铭年谱 (续七)

□ 傅振照



四十四岁

同治(壬申)十一年(1872)

是年，先生终年蛰居京师郊区铁门，倚户部养廉银与挚友接济，无奈以校读、题书为贖，开始编纂辑录成书。

正月初二月，都中俗以今日祀财神，爆杖甚盛。“前馆商城相国邸中，见其躬率子孙鞠臀必敬，乃知横财铲铸，其来有自也。今日迫于家人之情，亦设豚酒祝之。书生效颦，落水书之，以发一笑。”

初三日阅《负暄野录》、《澠水燕谈录》、广斋《老学丛谈》。“归潜志

载：正大初，^①朝廷以夏国（西夏）为北兵所废，将立新主，命赵公秉文入使册立，既行，馆阁诸以为必厚获。至界上，朝议罢其事，飞驿追回。杨之美为礼部尚书，寄以诗云：‘中朝人物翰林才（《老学丛谈》作‘谤仙才’），金节煌煌使夏台。马上（《老学丛谈》作‘得句’）逢人吐珠玉，笔头到处洒琼瑰（《老学丛谈》作‘挥毫落纸散琼瑰’）。三封书贷扬州命（《老学丛谈》作‘一封书贷扬州牧’），半夜卑轰荐福雷。自古书生多薄命（《老学丛谈》作‘穷达书生略相似’），满头风雪却回来’。”对此，先生以为：金宣宗元光二年十二月崩，哀宗即位。是月夏神宗（赵）遵頊传位于子德旺，非由蒙古所废。次年，金改元正大，至四年蒙古灭夏。是时金已自顾不暇，安能尚为夏计，故此说为假。盛广斋《老学丛谈》亦载此事，恐有传闻之误。盛氏又言汉、唐盛氏，文章之秀萃于中原，其次淮；汉、唐诗人，江南为多，此说可谓深知古今之变。自宋以后，东南人才益盛，可惜其搜集不全，以吾越言之，如虞世南、徐浩、齐唐，朱庆余等皆人所共知，惜《老学丛谈》都未及列入。

初四日，开始阅读《日下旧闻》^②。夜阅南海吴荷屋中丞《吾学录》。“其书详于器服刑律，俾流俗易晓颇为有意，惜其余经法大敕多所漏落，既病太

简，又有不必载者。近于官书抄胥之类，国朝（清）纪述掌故自《会典三通》^③数大书外，私籍甚少，故遂风行一时。”

初七日再阅《日下旧闻》。“其书搜采至一千六百六十九种，然所切据者，张燾之《五城坊巷胡衕集》、孙国枚之《燕都游览志》、蒋一葵之《长安客话》、宋启明之《长安可游记》、刘侗之《帝京景物略》、孙承泽之《春明梦余录》、周筮之《析津日记》及元混一《方輿胜览》、明《一统志》、曹学佺之《名胜志》、顾祖禹之《方輿纪要》、顾炎武之《北平古今记》等十余书而已。”

“朱氏采取稍嫌泛滥，其每门之下，随时标举，不用分注附之法，亦病错杂，又坊市、寺院不按里条系，颇难征考，疑是竹垞未经刊定之书。其于西峻每卷都补数十则，亦多芜漫。然轶搜遗文，借以香拾京华故实，钜细咸资，自非《梦华》、《梦粱》所堪仿佛，故乾隆间御定之本出，去取既精摭实而谈，固际原书远胜，而此编终不能废也。”

初八日香涛属撰杨中允之母荐文。得晓湖去冬十月十一日浦江书属撰其母夫人七十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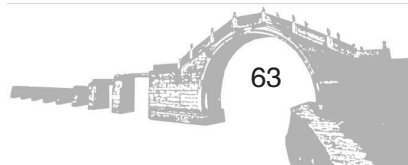
十五日夜，诣肯夫家作消寒第六集，至者苻农、砚樵、信甫、香涛、逸山、麀伯、廉生。

十八日阅《元和郡县志》，十九日再阅，以为“孙氏此刻误文甚多，似不

①正大，为金哀宗完颜守绪年号（1224~1231）。

②《日下旧闻》，地理著作。清康熙间朱彝尊撰，四十二卷。日下，指京都，记载北京掌故史迹。其子朱昆田撰《补遗》。乾隆又命大臣增继，别成《日下旧闻考》，窦光鼐、朱筠等撰，一百六十卷。

③会典，指记载一代政典事例之书，例《明会典》、《清会典》、三通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书的总称。



及武英殿聚珍本”。夜为其校正数条。

二十六日，录彭耜《道德真经集注释文》于毕氏^①《道德经考异》本。“彭氏虽未通小学，而罗列宋时诸本异同，致为详备，于音义亦其甚别白，较之毕氏考异，虽折衷说文、辨明正俗有所未逮，而较勘字句细密不遗，则非毕字所及。其中载陆氏释文最备，间亦可以订今本之伪。耜乃白玉蟾弟子也。”

二十九日录毕。“彭氏有《道德经集注》十八卷，此其集注之释文也。所引音义自陆氏外，为李、林二家。李者，李畋音解；林者，林东音释。所列诸本异同，自河上公王弼外，凡十二家，又引朱文公说一条，采取颇博，考核详慎，有经生家法。乾隆间，毕氏沅撰考异，仅载彭说四条及所采司马温公、叶石林、程文简、陈象古四家异同数条，漏略殊甚。至彭所据政和御本，毕考亦多取之，称为宋徽宗本。”

二月初三日午后，应陈逸山、王廉生、香涛之邀，招集苻丈（农）、砚樵、冑（肯）夫、信甫、麀伯、味秋、六舟，作消寒第八集，饯朝鲜使臣闵、朴二君，主客共十三人，两席，并设宾皆东面，颇有古意。初五日，由麀伯、冑夫、信甫、味秋及予合饯朝鲜使者于松筠庵，予赠诗二章（七律）。题为：

赠朝鲜使臣闵经园（致庠）判枢、朴绮园（凤彬）直阁，即送其归国（二首）：

东来画荡静风烟，玉塞车书奉九天。

王会自修唐职贡，雄封不改汉山川。
声灵薄海三千里，礼乐称藩五百年。
仙李柯条应可数^[注]，羽仪今见使臣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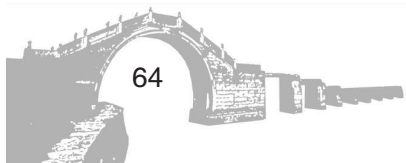
联翩尊俎接华裾，已是东门祖帐初。
残雪官梅迎远驿，早风关柳引归瀕。
清班雅负三韩望，温旨亲承九陛书。
珍重文章经国事，中朝执戟媿相如。

[注]太白诗：“我李百万叶，柯条布中州”，朝鲜李氏自明洪武二十五年得国，至今四百八十一年。

闵、朴二君所赠墨有字曰：“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字样，盖其国皆甘心洋丑，人怀敌愆。前年其王树碑平壤，额曰：“卫正逆邪之碑”，此墨即所产之地，有司依碑文制之，遍行国中，务绝其教，用意可谓深矣。又观其赠廉生光大三年新罗真兴王北狩界碑拓本。碑已残缺，字多漫漶，闵君云：此碑在其国咸镜道，咸兴府黄茅岭上。初七日，得闵致庠判枢书，并赠高丽色笺、落纸、烟丝、摺扇。即复书，报以汉三老碑拓本一通，乌本摺扇一柄。

十二日阅《思适斋集》。“顾氏校讎之学，实为古今第一。其时年辈，在前者如卢袁经、孙州如，皆此事专门，深相引重。至高邮王氏父子，尤善读古书，而于洞蕤极力推服，盖其交好。有张太余、胡果泉、秦敦夫、顾抱冲、黄尧圃、张月霄、彭甘亭、陈仲鱼、袁绶阶、吴山尊、汪闾原、叶纫之，皆经苑

^①毕沅（1730~1797），字纘蘅，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太仓）人，清学者，文学家，乾隆进士，官至湖广总督。由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治学范围较广。



老宿，收储极富，赏奇析疑，不遗余力，而又多见。钱尊王、毛斧季、季沧苇三家藏书，独步一时，无惭绝学。乃近世如张石舟、苗仙鹿、王葦友辈俱力诋之。诸君之学，虽各有所得，而闻见既远，不逮校录，又非专家，执一相攻，亦多见其不知量矣。”实为后代作出了校讎之学的历史考证。

十四日阅《太平寰宇记》^①“乾隆癸丑，其崇仁后人所刻，后有三十世孙斯盛跋，言其族叔之篋及斯盛子甦宾所校刊。每卷之末，间附校勘数条，颇能依据群书有所驳正，不知出何人之手，似较万庭兰为胜。而文句伪脱，亦未远过万本。其首页题签有曰：诗集嗣出，则世所稀见者也。”可见康、乾之世兴学读文之盛。

十六日阐彭文勤《石经考文提要》。“此高宗（乾隆）御定奉敕颁行，宜万节遵守之书，而场屋命题、学校教士，乃悉沿监本、坊本之误，不知更正，习俗难移，可慨叹也。”

十七日阅《金石萃编》，夜为砚斋作《华山冲雪图歌》，初欲作七古，以前有香涛诗，极雄骏，因改为五古一章。题为《太华冲雪图为董岷（砚）樵观察题》，全诗见《日记》第5292~5293页。

十八日为理庵题《岭峤望云图》七古一首，题为《岭峤望云图为杨理庵检讨（太亨）题》，诗存《日记》第5293~5294页。“是日傍晚，方坐室中作书，忽有巨砖破窗突入，其半裂堕窗外，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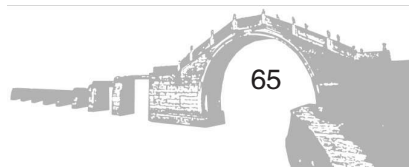
是邻人所掷。察之无有此，甚可骇，使稍移寸许，头颅为齏粉矣，人之处世岂不险哉。”

二十二日得伯寅书，属校《莲士集》样本，并赠《竹汀日记》、叶润臣《桥西日记》各一册。“《桥西日记》一卷，内阁侍读、浙江候补道汉阳叶名澧撰。吾乡天水妄生于厂肆敝篋中得之，伯寅为之付梓。曰桥西者，其尻在虎坊桥西，纪文达（晓岚）之故宅也。所记皆闻见杂事，惟内阁官制、职掌及师傅、保銜两条为有裨故掌。”

二十三日夜阅俞理初《癸巳存稿》，即类稿所刻之余也。“本名《米盐录》，道光癸巳，理初下第后，其房师王菽原礼部为之先刻十五卷，故以癸巳为称，其未刻者即名存稿，亦于癸巳写定。其稿后归叶润臣。今叶书尽散。闻是稿亦为天水妄生购得矣。此刻张石舟序，言已亥理初馆于祁文端江苏学政署中所写副本，石舟从文端借以付刻者。叶氏言石舟曾借其所藏本校订，又言先亦录有副本，理初取去，故以原本赠之（具见《桥西杂记》）。然则是刻乃叶本之副本，而天水生所得者，俞之原本也，其分为十五卷，则石舟所定耳。”二十四日续阐，以为“其书杂记，古今不分门类，亦无目录，较之类稿为无伦次，所采浩博，兼综说纬，固多可观。而笔舌冗漫，有学究气。且时值以戏谑不经之辞。”

三十日，校写“九经”、“三传”。“例以殿本，注疏卢本，经典释氏。阮

^①北宋地理总志。乐史编著，二百卷，目录二卷。



氏《十三经校勘记》，彭氏《石经考文提要》，订正数条，终日疲甚，目力几昏。”

是月底，还附有《彭侍郎玉麴画墨梅为谢麴伯编修题时湘乡使相新逝》七律一首，《题岷岫粉东老屋校韵图》调甘州一阙，见《日记》第5294~5296页。

三月初四日，周子千以去年腊月卒，今日开吊，先生輓以一联：

卅载次公车，科第独先。群从话西台，辞卷东阁焚囊。早知名，裙屐风流锦里，清才冠兰玉；

一官咸吏隐，京华同老。閒曹数鹤市，携琴驼行赌酒。暮回首，莺花寂历黄垆，旧事邈山河。

子千，道光庚子举人，为芝昉廉使之子，文勤之兄子也。

初五日，蔡编修来两次，不得已而见之。“其人衰老而贫。喜刻人诗文为小册，以赠达官富人以博微利，故屡过予者，欲得予诗刻之也。虽为同乡，素无交往，既非所愿，且近无谓。然其穷途无聊，亦可叹也。”此亦是文人末路所为的一种。

是日，为砚樵（一作岷岫）题粉东老屋校书（韵）图，见上月底附文。夜阅海盐俞湛持（浩）《西域考古录》，共十八卷。“首以甘肃兰州、西宁、凉州、甘州四府，肃州、安西、镇三州，次及新疆、西藏、蒙古源流，终以俄罗斯考略。其书成于道光之末，言所采自《西域图志》外，如彭氏之《西域地形训》、顾氏之《方輿纪要》、常氏之《行国风土记》谢氏之《戎幕随笔》和《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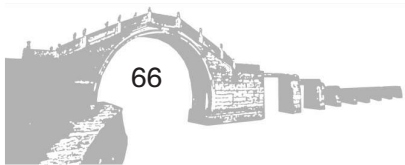
北域记》、七氏之《西域闻见录》、戴氏之《水地记》、万氏之《河源汇考》、孔氏之《胡注拾遗》、和氏之《乌斯藏赋》、图氏之《使俄罗斯记》、董氏之《外藩图说》、杜氏之《藏行日记》、松氏之《西口图记》和《三州辑览》、扎氏之《喀尔喀使记》、纪氏之《乌鲁木齐赋》、徐氏之《西域水道记》、钱氏之《秦边纪略》、洪氏之乾隆《府厅州县志》、祁氏之《西陲纪略》和《西域绎地》、魏氏之《海国图志》和《圣武记》，凡若干种，颇能参证古今，多所驳正。而提行别类，体例错杂，忽按忽叙，全无条贯，方隅道里，尤多溷淆，且校刻粗疏，字句脱误，往往有钞撮他人书而无首尾者。以其摭拾说部颇多，亦为考边防者不可少之书。”

初十日题砚樵图成，得五古四十三韵，具述古今韵学源流。此诗不载。且于月末补载《壬申上巳日王信甫员外邀同董岷樵游城南龙树寺，岷樵赋诗见寄，即次其韵》二首：

小试郊南骑，芳尘软不惊。
草长知蝶态，水满得蛙声。
暖日常依阙，轻烟欲抱城。
相期投古寺，幢影隔林明。

寥落芳华节，欢游止百哀。
柳丝依水槛，花气出香台。
远树坛阴直，浮云塞上来。
烽烟应未尽，相劝手中杯。

十一日阅海州许桂林《谷梁传》。“时月日释例，亦一家之学。而首为‘总论’，极诋左氏，其言甚悖。且云所著尚有‘疑左’二卷，盖妄书也。是书



成于道光丁未，前有阮仪征、唐陶山两序，唐序尤佳。”

十四日与伯寅、香涛及逸山、秦宜亭、吴清卿编修（大澂）、许鹤巢（赓飏）、顾缉廷（肇熙）两舍人、岷樵和予，游极乐寺及可园。寺初建于元，明成化间又建，寺名相同，在京都东北隅，近国子监。可园相传为诚隐亲王赐邸，人称三贝子花园，道光间归宝文庄相国，今为卖花人居。游后流连忘返。作七律长诗一首，题为“暮春十四日伯寅孝达招同秦宜亭、董岷樵、陈逸山、吴清卿诸君极乐寺赏海棠，酒毕复同游三贝子花园”。诗见《日记》第5325~5326页。

十五日以敝裘（衣）质钱五十千。为岷樵题《玉泉道院听泉图》七绝二首、题《汉光禄勋刘曜残碑拓本》观款。伯寅书属题《文宗御画马》及朝鲜人《金秋史画》，即作《定陵画马》七古一首、《金秋史画》二绝句以复。此日事正应了绍兴人：“外面敲铜鼓。屋里喝盐菜滷”的俗谚。

十七日午，入署晤谭敬甫、李李邨、吴时斋、蒋兰泉诸同官。见董尚书递“学习报满呈”。

二十九日，本司书吏来告，明日奏留引见，且呈堂官考语曰：“人精明，办事练达”，向来部奏留，例出七字；考也，“京察一等”，以及“题缺升补”，则皆八字。“予以癸丑五月到部，及今十年，仅满六载，计自二月二

十二日始可论资序补矣。拙于吏事，大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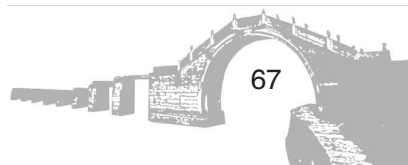
是月末，附诗三首：后三日偕冑夫慈仁寺看花，复出右安门访花之寺海棠，遇方勉甫舍人（恭钊）兄弟留饮，至日暮而归；后四日偕许竹笈编修（景澂）、方勉夫舍人、濮紫泉刑部（子潼）、朱鼎甫孝廉（一新）两同年再致极乐寺看海棠，复游可园而归；次日复偕苻翁、孝达、肯夫、逸山、麀伯、味秋、六舟诸君过花之寺，钱岷樵同孝达，作孝达花事已故为恨，即取其意而调之。

四月初二日得姚怪甫片，催撰其尊人寿序。“予本不以此事应人，况致堂年仅五十，与予相若，亦不宜在称寿之列。至唐人以同中第者为同岁生，亦曰同年。自是迄明相沿成俗，然亦祇及进士，不及举人。国朝（清）以来，举人渐亦称同年，然祇及同榜，不及他省。近日士不务学，专竞声气，借此为征逐梯媒之缘，又惟以势利为高下，以酒食为冷热，反面易观，不如陌路，此衣冠之恶习，最可痛恨者也。予年长矣，岂尚区区乙科，自屈辈行，致卑鄙流俗之称于年少白脸之子。而人不自量难以户晓，可叹也。”

初六日作书致岷樵，“极言作诗甘苦，以岷樵题予诗，谓初学温^①、李，继规沈、宋，”因而引起先生对作诗的议论：

“予平生实未尝读此四家诗。义山

^①温庭筠（？~866），唐诗人、词人。原名岐，字飞卿，号温八叉。官国子助教。原集散佚，后人辑有《温庭筠诗集》、《全宋词》。



七律有逼似少陵者，七绝尤为晚唐以后第一人，五律亦工，古体则全无骨力。飞卿亦有佳处，七绝尤警秀，惟大旨在揉弄金粉，取悦闺襜，荡子艳词，互为相拟。至于沈、宋，唐之罪人耳。倾邪侧媚，附体金土，心术既殊，语言何抒。故其为诗，大率沿靡六朝，依託四杰，浮华襞积，略无真诣，间有一二雕琢，巧语而已。云卿尚有卢家少妇一律，粗成章法；近乡心更怯十字，微见性情。延清奸险尤甚，诗直一无可取，盖不肖之徒，虽或有才华，皆是小慧，必不能抒扬理奥，托兴风雅。其辞枝而不理，其气促而不举，纵有巧丽之句，必无完善之篇。砚樵溯志三唐^①，专务工语，故以此相品藻。予二十年前已薄视淫靡丽制。惟谓此事，当以魄力气体，补其性情，幽远清微，传其哀乐，又必本之以经籍，密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专一代，疵其浮縻，二陆三潘，亦所弃也。赏其情悟，梅村樊榭，亦所取也。至于感情切挚之作，登归闲适之篇，集中所存，自谓虽苏、李复生，陶、谢可作，不能过也。砚樵之评，实深思之而不可解。以诗而论，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而谓学温岐，规沈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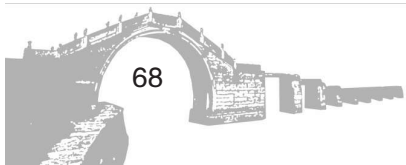
前日，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先生以为“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盖予近与诸君倡和之作，皆仅取达意，不求高深，而香涛又未尝见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诗，予见其数

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者。其人予两晤之，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而以与予并论，则予之诗亦可知矣。香涛又尝言，壬秋之学六朝不及徐青藤。夫六朝既非幽奥，青藤亦不学六朝，则其视予诗亦并不知青藤矣。以二君之相爱，京师之才亦无如二者。香涛尤一时杰出而尚为此言，真赏不逢，斯文将坠，予之碌碌不可以休乎！逸山尝言，王壬秋似李恁伯，予终不般，都中知己，惟此君矣。此段议论，当持与晓湖语之。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摹似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循墙摸壁，不可寸尺离也。五古自枚叔、苏李、子建、仲宣、嗣宗、太冲、景纯、渊明、康乐、延年、明远、元晖、仲言、休文、文通、子寿、襄阳、摩诘、嘉州、常尉、太祝、太白、子美、苏州、退之、子厚，以及宋之子瞻、元之雁门、道远，明之青田、君采、空洞、大复，国朝（清）之樊榭，皆独具精诣，卓绝千秋。作诗者当汰其繁芜，取其深蕴，随物赋形，悉为我有。

“七古子美一人，足为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务观，遗山青邱，空洞大复，可称八俊；梅村别调，具足风流，此外无可学也。五律，自唐迄国朝，佳手林产，更僕难数，清奇浓淡，不名一家，而要必宗实沈势为主。”

“七律取骨于杜，所以导扬忠爱，结正风骚，而趣悟所昭，体会所及，上自东川摩诘，下至公安松圆，皆微妙可

^①三唐，指盛唐、中唐、后唐。有的加初唐，称四唐，这是后人给唐朝的分期。



参，取材不废。其唐之文房、义山，元之遗山，明之大復、沧溟、弇洲、独漉，国朝之渔洋、樊榭，诣各不同，尤为绝出。”

“七绝则江宁、右丞、太白、君虞、义山、飞卿、致尧、东坡、放翁、雁门、沧溟、子相、松圆、渔洋、樊榭十五家皆绝调也。而晚唐、北宋，多堪取法，不能悉指，我朝之王厉，尤风雅替人，瓣香可奉。”

“五绝则王裴其最著已。平生师资学力，约略在兹，自以为驰骤百家，变动万态，而可域之以一二人，赏之以一二字哉。盖今之言诗者，必穷纸累幅，千篇一律，缀比重坠之字，则曰此汉、魏也；依仿空旷之语，则曰此陶、韦也。风云月露，堆砌虚实，则以为六朝；天地乾坤，佯狂痛哭，则以为老杜；直填险字，生凑硬语，则以为韩、孟。作者惟知剿袭剽窃，以为家数，观者景乡向比附，以为评目。振奇之士，大言之徒，又务尊六朝而薄三唐，托汉、魏以诋李杜，狂谵寐语陷于一无所知，故自道光以来，五十余年，惟潘四农之五古，差有真意。”

“而七古佇弱，诸体皆不称。鲁通甫笔力气皆可取，而工夫太浅，格体不完，其余不乏雅音，概无实际，欲救乾嘉诸家之俳谐卑弱，而才力转复不逮，此风会所以日下，而国朝之诗，遂远不如前代也。”

“道光以后名士，动拟杜韩，槎牙率硬而诗日坏；咸丰以后名士，动拟汉

魏，肤浮填砌而诗益坏。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鹜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

后得砚樵复书，言其所评非本意也，再索诗集去，又复一书，备言以人品定诗品之旨。

十一日，晚饭于庭中槐阴下，月影隔树，流光满案，因以一诗：

摄痾不出门，风正启萝幔。
移床就树阴，惜此小庭晏。
昔语簷间亲，蛛丝花际乱。
韭簌出我厨，言趁夕时饭。
初月生槐间，流光满几案。
恍惚山中居，松辉落琴荐。
幽思无取盈，即景此焉眷。
碧云天未来，茶香与心远。

此等诗淡远中字字有名理，无一虚饰，非唐之储祝常、尉明之、徐昌谷、高叔业四皇甫辈所能到也。渔洋五言古，仅知以清悟胜，而不知其悟入之处，所谓有远体无远神。然予诗，自是七古第一，七律第二，五古第三，此等诣又是五古之第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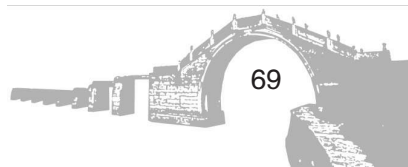
十二日，为伯寅题安期东方朔桃七古各一首。又题《东堂细雨图》七绝二首云：

五云捧诏领群英，閒向东堂品雨声。
官烛摇银香烬落，绿槐风里断茶笙。

春畴水满喜堪知，报赛应宣供奉词^①。
想见满堂鼾睡客，垂帘据几独听时。

“盖伯寅久不得主文，去年知举非其雅意，故昨书谓与予之不第同一鼾睡

①时大内方祷雨（作者原注）



也。诗中微愠可以求而得之。”

十五日傍晚，赴香涛宴宾斋。先生记道：“都中苦无佳茗，而予又绝嗜之。去年所携已早尽，惟用薰叶（花茶）而已。前日肯夫分惠龙井两小瓶，喜甚而惜之，不遽开，昨夕敲之，则已久蒸郁，色味俱坏。今日遣人至东头买薰叶，较西头稍佳，而价甚贵，且亦只有花气耳。念故乡平水、紫洪、上灶诸山雨前绿牙，不啻明星、玉女矣。”

十八日夜，再为岷樵题秦宜亭所画《太华冲雪第二图》，得七古一首云：

都下几人画山水，锡山秦窆称能工。
吮豪索价颇自惜，鞞材曾被嘲凡庸。
一朝为君拂绢素，经营惨淡天外峰。
玉莲朵朵入雪色，松根樵径微能通。
金天倘若失奇气，灵泉百道凝瘖龙。
危桥盘磴何历落，时见木末绿奚僮。
所恨点缀特丘壑，转于侧面摹岷岷。
天门虎豹不可上，明星玉女谁为容。
使君峰距本孤抗，欲排闾阖凌长风。
凉州不用美酒博，防秋奔障徒书功。
璠楼高绝难再至，觚棱晓梦瞻瞳眈。
廷推秦陇易方面，帝曰汝往临西戎。
河湟烽火断右臂，军车亟驰扼贼冲。
书生报国当在此，探奇揽胜奚称雄。
氛祲霏尽岳色见，岷峨万里青濛濛。
长安僵卧一虬虱，赋诗跌荡长终穷。

诗成示香涛，香涛复言“予诗雄秀二字，皆造其极，真少陵嫡派，其火候在竹垞、阮亭之间。”先生以为“竹垞、阮亭七古皆学杜也，此语殊误。阮亭七古平弱已极，无一完篇，岂足语少陵宗旨，竹垞亦仅规东坡耳。若予此诗拟之空同、大復，则殆庶乎？”

是月末，附有“敬题文宗御画马石刻本赐伯寅侍郎”文。见《日记》第5364页。

题“岷樵玉泉院听泉图”二首（院在华山下）。见《日记》第5364~5365页。

题《伯寅藤阴老屋勘书图》。见《日记》第5365~5366页。

“夏初偕宜亭、岷樵、香涛、六舟、甘伯、逸山、麀伯诸君饮伯寅半舫醉走笔作歌》一首。见《日记》第5366~5367页。

“刘镌山师招饮新斋偕孝达登新搆北楼坐话，时四月晦日”五律一章。见《日记》第5367~5368页。

五月初一日，补作前游极乐寺、花之寺七古各一章，夜饭伯寅侍郎邸中七古一章，谢伯寅馈节料七律一章。

初三日阅《竹垞文集》，言“吾浙竹垞、西河、谢山、堇浦四家之集，可谓理博词富，探讨不穷者矣，尤醇雅，不愧儒者之文。”

初四日，姬人三十生日。是日，先生记有怪事一桩：“近日，有直隶人李如松，号虎峰者，以优贡捐一内阁中书，自名理学，对客必危坐，所食唯脱粟、豆腐，常食于门屏间，欲令人皆见之，目不识数字，而著语录盈尺。万尚书青藜首推重之，为言于倭文端，文端亦为所惑，都中为宋学者徐侍郎桐尤所致敬。前年曾文正入都，此人晋謁，雅步般辟而入。文正询其乡里，曰高阳侍郎本家也。高阳侍郎者，今上师傅李公鸿藻，本高阳世族。而此人乃吾邑之山前村人，其父入京为部役，冒籍固安，



与侍郎风马牛不相及也。文正曰：若于侍郎何辈行（排行）？曰远族。文正微哂挥之出（此孝达为予说）。此人之父亦庸鄙，以吏胥为小官，归京师，又有一兄亦侂劣。此人深耻其父兄为道学累，常欲去之。三月间胁其父逐兄出走。既去，父常念之。（此人）其妻怒诟翁，相愤詈。此人闻妻达，怒向父曰：妇贤能助我，父欲党兄为恶耶？其父夜自缢死。坊官申之巡城御史，御史移刑部将重案其事，而侍郎等十人为宋学者，谓是道学孝子也，连名呈部力保之，得免。呜呼，天下乃有此人，都下乃有此论，可不哀哉！前日，直隶人言，李如松父死逃去，王维珍严议免（其）官。江南龙神死通州庙中，可谓北地去三害；予亦谓：吾越人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可称“双绝”。近以此人与李虎峰并称南北清流，众口同声，不知所自，犹足见人心之公也。

“江南龙神者，自元至今，相传有金龙四大王，或去神为谢绪，或云其神兄弟四人著灵海堤，参加封号，祠庙遍江、淮，常见蛇身以行水，其类不一，或称公侯，或称将军。向来官南河者，遇河堤溃决，见有此等，出辄迎置之槃中，供奉于庙，盛张宴乐，自河督以，皆叩祝维谨。去年直隶大水，忽有此类，长短七八，至天津，李合肥如河南故事礼之，于是畿辅□□，言金龙四大王来矣。四月初，有一蛇^①至通州，通水道亦置之槃，供一古庙中，锁其扉，

禁人出入，数日而蛇死。夫龙神物也，非人所能化冥，勤其官而水，死后世祀之，不闻见其形。鲛坏息壤受磔，乃能化黄能（龙）入羽渊之语。是则绩用弗成者，始降而为厉于水，要其事亦出周之季世，所谓国将衰听于神也。近世治河最著者，如贾鲁、宋澧、陈瑄、潘季驯、靳辅、朱之锡等，皆未见神于水之事，且神而为蛇，其神亦细已甚。朝廷盛时，岁糜金钱于河数百万，不人力之恃，而乞灵于蛇，祷张为幻，亦可见矣。龙斗而子产不覿，蛇出而道辅笏击，皆解惑之通方，胜邪之上策也。

“前日，孝达谓赵之谦之荒谬狂鄙，本不值一骂，然其不学无术之诡状，三尺童子可立发其覆，而士夫乃为所给，良由实学不明，世无正论使生。乾、嘉之代，太阳遍照，妖魅自消，何烦我辈齿颊哉。予甚讳其言，因思如李如松辈姓名，何屑污吾简牍，而事取相类，故牵连蛇蟹拉杂书之（观李如松名字，便可知其人明代宁远伯子何重，不幸哉）。

初五日，阅桂未谷《说文附记》，考证汉外黄令《高彪》太尉、公、尚书等职官次序的正、谬（见《日记》第5377~5378页）。

初八、九日，终日校正钱晦之所补《后汉公卿表》，“其谬误盖不胜指，”并指出致误之故，“盖由拘于班（固）例，不欲出入”。详见《日记》第5380~5381页。

十一日，校《孙子十家注》。“十

①原文作“它”。古文“它”，长在草丛中，曲身长尾，故曰“它”从虫，后称蛇。



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证引古事，亦多切要。乃知樊川真用世之才，其罪言原十六卫等篇不虚作也。惜孙刻据道藏本，尚多误字。”

是日，施刑部启宗来。“施字敏先，会稽之鲍家埭（今越城区马山镇豆姜）人。其家世以贵得官。此君年二十余，已以刑部郎中截取烦缺知府矣。”

十三日，阅《汉书·百官公卿表》。班（固）氏此表例，亦未能画一，其自三公、将军外、有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水衡都尉，又加以三辅，则班氏固不限于九卿也。水衡部都尉及三辅皆二千石，将作等四官皆号列卿，何以不列？是熊氏后表兼及诸官，未为违失可庐一概去之，非也。

十四日得陶子珍（一作紫吟）三月廿八日书并所撰《淮南许注叙》。“考订甚密，文亦尔雅，书翰古奥尤绝。子珍力进汉魏孟曹，迨群海内少年，未见其比，吾邑古学其在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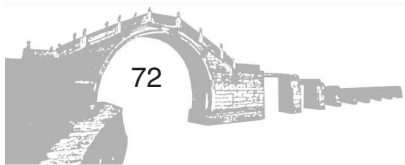
十五日，隆福寺书贾取《顾亭林年谱》来。“亭林学识绝代，石州之谱专搜琐屑，于其用世本意及沧桑时事，俱属茫如。昔人谓：作谱之才，类如其人相称，诚知言也。”

十六日伯寅再赠《杨汀鹭集》两册，且言“金石之学为实学，以世人不能识古文奇字为恨”，又言“近人如菽堂、吴子苾、许印林精于此事，不让嘯堂、尚功。”先生复书言：“金石固不可不讲，而近之后生，往往全不读书，惟持一破瓦之背，以为是汉也、魏也；一坏象之髻，以为是北魏也、北齐也；

模粘文字，不识点画，而曰可正《说文》；杜撰年号，不辨时代，而曰可补正史；文理不通，字体不正，而游扬声气；干谒公卿，瞽行妄言，习为狂傲。是风气之大害，所当防其流弊者也。”

又阅戴望《论语注》。先生以为既拾前人牙慧，又妄以公羊家最谬之说，强巫圣人，此如东汉徐防所谓“妄生穿凿，轻蔑道术者也”。戴望“为湖州之附学生，游丐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增广生，改其姓名，求保训导，又窃文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申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乞乃免，今之匿名殆为是耳。浙西湖州有戴望，杭州有曹籀。籀亦附学生，年六十余岁，科试未尝得到二等，自言为龚定庵畏友，文亦不通一字，凶傲好骂，新刻其石屋藏书二小册，一曰《春秋钻燧》，题曰褐宽博撰；一曰《籀书》，皆杂文也。吾邑妄子赵之谦为题记曰：‘某年某月石屋藏书启籀钹版，尝见其说中云，此为男子阳物象形，则它可知矣’。两人者皆与赵妄子为至交。妄子推之曰：‘淮以南学问，戴第一；江以南学问，曹第一。’盖自居于天下第一也。吾浙不忝厉祫所钟，生此三人，虽黎邱鬼幻，转瞬烟灭，而后生好怪，颇有被其陷溺者，是亦风气之害矣。”

十七日阅《杨汀鹭集》，文三卷、诗二卷、词一卷。“汀鹭为包慎之婿，学有师法。是集其友人张知府丙炎掇拾奇零，非其全矣。文未能佳，诗亦率硬，词稍清婉，当以人傅耳。其内阁学士、河南学政俞子相（长赞）行状一篇



可采入吾郡、县志。”俞君大兴人，诸生，后入翰林，十二年而官至二品，然三十七岁即卒。

二十二日起校《三国志》及《后汉书》，以《华阳国志》、《东观汉记》等书证之，多有考证，详见《日记》第5391~5393页。

二十七日作书致殷萼庭，属转售姚春《国朝文录》，以近日窘甚，今几绝炊。后得复，并接书值四金，又可暂支旦夕。

是日阅《明诗综》数卷。以为“竹垞此选最称完美，然于后七子贬斥太甚”，搜之失平，不乏因成见誉诋，失却是非之公。详见《日记》第5396~5398页。

二十八日伯寅索和《消夏六咏》，为搨铭、读碑、品泉（钱）、论印、还砚、检书。走笔成长句答之（诗见《日记》第5398~5399页）。

为星翁月季、兰花画扇题“菩萨蛮”词一阕：^①

蕊黄浥露秋心吐。燕子点缀稍头雨。压鬓一枝鲜。花红月又圆。

携来香满袖。画静微吟候。白发自风流。好花长聚头。

香涛为予题《湖塘村居图》长歌一首：
江南山水数会稽，会稽无如镜湖西。
水甘能酿千日酒，山深可著高人栖。
良田万畝秣稻熟，中岁一亩收十斛。
鲈菜如土不论钱，荷芰如云高过屋。
季真弃官甘投老，放翁曾为杨梅饱。
越缦先生逋峭人，卜居踏遍山阴道。
儿时上冢年年来，欲专一壑谁相猜。
精舍便沿鸥波筑，养堂正对屏山开。

奉母耜耕此愿毕，一椽未就到今日。
塘上人家长子孙，墓田丙舍徒萧瑟。
释人久宦产亦减，长卿为郎思自免。
逢人便索图村居，要令家山常在眼。
可怜画手矜简略，溪树不春山容薄。
新丰门巷无处寻，聊伴越吟解寂寞。
买田阳羨知何时，仲长乐志空文辞。
有山无钱买不得，劝君莫被巢由欺。

先生评语，“其情文宛转，音节舒缓，上可追香山、放翁，下不失梅村、初白，一时之秀出也。”

二十九日阅顺治《缙绅录》，作了较为详实的考证核实，详见《日记》第5401~5416页。

六月初三，集录乙丑（同治四年，即1865年）以后词二十三首，删去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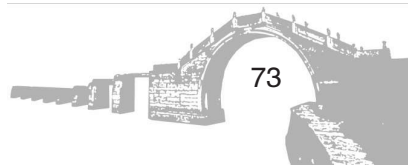
初九日阅郑子尹《说文逸字》。所补凡一百六十五文，其中颇有确者，然其病在过信《玉篇》、《广韵》、《韵会》诸书，及《释文》文选注所引，以为坚据，故有以意勉强定说之嫌。

晡后作书致寿衡侍郎，并赋七律一章：
日日闲庭倚树吟，萧疏散发不胜簪。
浮生久竭忧时泪，多病常怀去国心。
犹喜门墙邻绛帐，自惭桃李侑清阴。
幽忧未得陪佳赏，怅绝成连一曲琴。

初十日阅《刘申甫集》，“其才力足雄一时，而学术不足法”。复次前韵致寿师，诗不足存。中有二句云：“时危遑恤饥寒事，身贱难论出处心”，乃先生谓今日之实录也。

十二日为姚怪甫撰其尊人致堂太守五十寿序（散文不起草）。“致堂历任

^①《菩萨蛮》，本唐教坊曲名。又名《巫山一片云》、《子夜歌》、《晚云烘日》、《花间意》、《重叠金》、《梅花句》、《花溪碧》等。



河南尉县，有吏材，兹摘其署祥符令时，佐卞布致阻止米利坚（美国）夷建天主堂事发挥言之，颇有精采，以寿文既可厌，而此事自以卞君之力，致堂或效指蹤要，不得掠美。我辈立言当为后世传信计，故不录副。”

是日夜，撰允臣挽诗五律二章：

东阁传经早，含香侍玉京。
外郎三署转^①，任子一官轻。
自足闺房玩，羞争闾闾名。
彼哉誇食饰，临汝与安成。

及我联车笠，相亲独过群。
一言知什袭^②，十载愈殷勤。
志业期孤子，音容断暮云。
赐旣碑未立，凄绝又铭君^③。

十三日，作书致贾琴岩，以姚氏寿文属其转寄，并略言古文之法：

“古文之法，非坏于八家，坏于茅鹿门以后之评八家者。虽方望溪之文有义味，姚姬传之学有本原，而尚陋习相沿，惑于挑剔吞吐，开合照应，以摇曳为神致，以断续为离奇，数字之文，必有针线脉络；一行之简，亦须起伏映带，此学究之蛊毒，中人最深者也。”

二十三日，“三日来理癸亥、甲子两年诗，或删或补或改成定篇，共得七十一首，合壬戌诗十三首毕。”

二十四日，为伯寅所藏顺治《缙绅录》题七古一章，见《日记》第5432~5434页。

其余日子，因天气转热，多作应酬、喝和之举。间阅《丧礼经传》、《炳烛编》等。

七月初二，作《致傅节子闽中书》、《致孙子九汀州书》，均畅叙旧日友情，通报今日状况而已。在致子九书中言道：“平生著述，理董为难。壬戌以来，作诗绝少。昨今两岁，篇计较多，比稍编次，约得诗八百六十七首，分为十卷。词百三十阙，合计千篇，分为两册，皆弃余之敝帚，劫后之星灰，删之又删，信而未信，藏之石室，以待后人而已。”

“攀下称诗，香涛最胜，由其学有经法，志怀慷慨，本末洞达，真未易才。其余董君岷樵，刻意中唐。谢君麀伯，专心老杜。虽或窘于边幅，或仅猎其皮毛，而其人皆君子之徒，所业自光明可喜。益叹无本之学，客气之言，必至日见冰消，水落石出矣。工者视为绣鞶，拙者比干凋朽，下则为优伶之末技，上则为风雅之罪人，此颡已迟，扪心徒悔，良足叹也。”

“故乡近日，颇有人才。眉叔诗渐成家，秋子文而好事，皆清淑所萃，风流可称。而学之锐进，才之卓出者，尤推陶子珍孝廉，经术词章，务为其上，英绝领袖，殆在斯人。次则孙生子宜，亦异才也。潘侍郎所刻《越三子集》，及河南重刻《王孟调集》，各奉二部，其一以致季贶。是三君者，年刀相齐，

①君以回避，历补工部主事，刑部、户部员外郎。

②君得予片纸，只字皆藏去。

③君乞予撰文，勤公碑文尚未上石云。



悲其篇翰犹新，音徽已远，得传一二，为幸已多，展念平生所期遂止。”这是先生的平心之论。

十七日，录戊辰（同治七年，1868年）以前诗，为第八卷。

二十七日夜，撰壬申（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初五日郑司农生日集会记。文见《日记》第5462~5465页。

八月初四日开始《研六室文钞》。

初五日记《九经三传沿革例》竟（完成）。

十六、十七日，阅《五经异义疏证》，言“芟甫此书，真经义之渊藪。其中采证极博，而不轻易加断刺，尤为谨严。如明堂一事，盖古制既确据，而诸家聚讼，纷如乱丝，论其违则各有据，论其合则皆参臆见。故罗列异同，以俟人之自择，此最可法者。”

九月起先生以读史、阅经，忙于辑注《后汉书》，杂辑《后汉书注》，乘暇校《国语》。直至十二月十六日，遂作“岁晚读书寄伯寅侍郎”五古一首，作为是年与往年生活的总结。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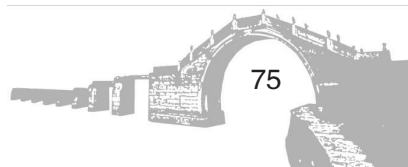
“穷居谋米盐，度日每如岁。
叩学事铅槩，又苦日易逝。
灯尽系宵明，窗旭趁朝霁。
大化无百年，圣狂束一例。
穷经有微得，奇甘益疏粝。
迂怪丛世尤，蹊蹶受天钦。
故人云霞姿，独为岁寒计。
樵苏时续乏，挹注屡忘惠。
霄埃本殊形，文字泯其际。
念兹品汇繁，至理实司契。

鸡狸分效材，裘蓑代为帝。
巧劳容拙安，后至疾前蔽。
博髻髻益高，斫趾履适戾。
世故日纠纷，澄观持其蔽。
是以古道交，蝓没互鏃砺。
达期登治平，穷不忘利济。
方今履端近，冲圣亲断制。
万物瞻出震，卿云灿以丽。
内相造辟言，改行得次第。
轻重贵审几，及时必割灵。
积患在纵弛，一事百牵曳。
冗员塞牛毛，所至成沴厉。
才者矜奔驰，愚者安玩愒。
首当核名实，谬说破调剂。
承旨冠禁林，四海仰献竞。
行见经术昌，群聋醒梦寢。
通塞虽睽涂，行藏各造诣。
春至虫卉苏，端笑我其筮。

从是日起，《桃花圣解庵日记》由己集转入庚集。

十二月二十二日，先生两得路覃叔（访岩）书。此君年少有志，喜看杂书，而苦于无友，自满过人，于诗未知门径，而狂不可一世。以为“说部数种，此外无学，解喙（吟）七字，并时无入”（此十六字，近日江湖才子通病）。先生看其年少，前日两与之书，称美其所作，而稍示以不足之意。今日得其第一次复书，兀傲之甚，“且诋予为兔园册子之学”。先生“自悔轻见后生，取嘲狗曲，失言之责，咎有所归”因书数行复之云：“仆少失学，今年已将艾^①矣。业既不进，敢言著述，平生

①艾，人至五十岁称艾年，这里说是将老矣。



诗文，亦不自收拾，稍辑一二，又往往为戚友耆痴者所传抄而不还，未知何日得就质于英绝耳。至学问之事，诗为小道，然非穷力深造，虽有遗秉，亦不遽工，而年少气盛，每易自满。仆穷大失居，老而渐悔，比年稍稍温经校书，反求诸心，惟愿为村塾学究裹兔园册以终老，不愿复与后生才隼，驰华飞藻，流宕篇章。足下所投之诗，亦未能尽读，惟望而知为英伟之士，故如瞽人谈天，略知方圆，以塞下问之盛意。若欲仆细加批点，非惟不敢，亦不暇也。率复不宣。”先生本意“以此等妄人绝之而已”，乃彼复以书谢罪而云：“阁下乃见道之言，令弟等誇多斗靡者通身汗下。”又云：“求友如阁下者不数数覩，幸弗屏之门墙之外，又未知其所誇者何多，所斗者何靡也。书此以为少学子弟轻言取笑之戒。”二十四日又作书作复，其答仍作梦寝之语，实不必与之言。但先生还是在赠庭芷《王孟调遗集》同时托转赠路访岩一册。

二十五日，先生撰《三山世隐图记》，文曰：

“昔谢客在官，赋始宁之旧墅。放翁远役，怀鲁墟之故居。诚以越东一隅，山水所萃，胜流栖足，云客宅心，鱼鸟亲于故人，竹石多于家具。一缠苟有，百城不移，而况稽阴著土，堂构累承，下杜之乡，屢卜而未遂，灈西之屋，数世而亦倾。烟水役其梦魂，桑麻

存于形想，此三山世隐图所为作也。”

“三山在郡城西十里。出常禧门，经跨湖桥，村墅渐疏，田畴益展，远山四映，层清间白。度杏买桥，湖开若镜，堤长似虹，霞艳翠霏，不可殚究。而三山者，高或十寻^①，广劣千步^②，翘鬟髻髻，错峙水中。名未别于图经，地各私于农户，斜带鱼罾^③，旁分鸥矶。烟波忽兴，荡漾无际，田园篱落，相环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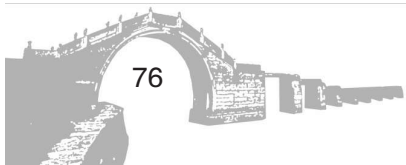
“予家西郭门外，则由霞川桥，度青甸湖而南，出石堰，取三山。视道常禧门为近，又南则为画桥，界长湖以控雾，驾白石而逃鳞，柱簇栏迴，月重星贯，曲港绵络，渔舟四通。桥之折处，则为龟山，世所传方干岛也。卷石兀趾，古松卓颠，推排浪中，激齧益瘦。循桥而西，为湖桑埭，则刘姑庙在焉。康熙之初，先六世祖中书府君，尝与同郡名士一十九人，踵铁崖之故事，结诗巢于埭西。衣冠伟然，仿佛月泉之社；文采蔚若，颀颀云门之游。落花泛觥，垂杨蔽席。白蘋周于文砌，红蓼亚于朱

阑，艳绝湖山，人传图画，是以篁村续赋，羨若神仙（陶篁村续会稽三赋，纪之甚详，白蘋红蓼亦赋中语也）。霞西著书，证其香火（沈征君灿著《诗巢香火证因》）。既而星散远宦，风流渐微。府君僦直薇垣，修书朵殿，眷言桑梓，结念渔樵，已营灈陵之田，将遂兔裘之筑，辟畦起舍，近季真之赐

①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

②步，旧时长度单位，五尺为一步。

③罾，读林，古人以垒木以罾鱼。



庄，踞岛投竿，跋宏之之高达，因属蒋南沙相国为之图，汪退谷宫允系以什，而府君自为为之记之，今所传《鉴湖垂钓图记》及诗是也。嗣是曾王父孝廉君，以禽向之年，绝驰驱之意，散怀泉石，弥邵风期，尝以春秋佳晨，童冠咸集，试笛于柳姑祠畔，胡床三弄，胜青溪之雅谈；紫裘一声，追黄楼之遗韵。绯桃千树，因风而竞开；红裙双鬟，采菱而答唱。独孤因以裂管，倚楼由此得名。则有若茹古香尚书，王谷人进士，各填词记之，而孝廉君自为之诗也。

“及本生王父州佐君，天怀高简，人伦典型，乡里祝于少宾，僇艾奉为有道。杖履近出，时在画桥。篮举后随，半为田父。每至秋高霜晓，山清气佳，丹枫拥岩，乌桕幣泾，万叶飞舞，时乱落霞，千林通红，不辨朝日，连村锦张，夹溪花合，炊烟互为黼绣，岚翠供其画屏。时乃携青雀之舟，系丝葭之岸，拾枝煮茗，看叶题词。循行打稻之家，间访鸣钟之寺。儿童竞逐，凫雁狎游。入网师之居，或从偕笠；闯里儒之塾，亦与言诗。剪韭东畦，牵蓊北渚。野篱竹笋，时拂青簾。村舍酒旗，偏碍乌帽。客来不速，月出而归。尝赋红树绝句十首纪之者也。

“呜呼，溯自康熙，以迄道光，朝野承平，代传高隐，借武陵桔租之业，无太原地癖之风。盖自跨湖桥以西，青甸湖以南，至清水闸而止，连阡越陌，

皆先畴也。然而逍遥有谷，徒标大小之称，平泉作庄，虚传子孙之诫。墙接未成，花竹焉树，洎经离乱，潆为邱墟，膏腴之封，悉入于豪右；磽确之地，半葬以国殇。林壑靡存，风烟屡改。慈铭祖研勉承，寝邱竟失，羁禽绕树，时念南枝，枯鱼暴沙，不忘深泽，爰传尺素，重绘兹图。于襄阳之悦逢，郝参军之竞值，赎涸阳之旧产，补檀桥之精庐，别壤疏泉，诛茅缚架，临流选宇，即号祠堂。依林表阡，便营马鬣（州佐府君时尚未葬），山条水叶，随鱼菽以为供。秋月春杨，冀魂魄之常悦。八口所瞻，十双绕门，等身之书，千卷环堵，则斯图也。祖德之述，速慕于韦公，郊居之篇，庶几于沈令尔。”

是晚，自题《霞川老屋图》，得七古一首：

我家世在城西居，翰林吴君为绘图。
长安尘沙正眯眼，突兀忽见先人庐。
二百年来有此屋，东南斜抱两河曲^①。
城边绿树万家烟，桥畔朱楼百竿竹。
横河北绝官渎流，烟波浩淼无春秋。
鸥凫四散不知处，鸣榔往往闻渔舟。
直河西接钱清水，迤迳长流百余里。
估帆日夜排檣来，艳说霞川一湾奇。
蓬莱驿路清风多，连云绰楔垂女萝。
会龙尚记前朝事^②，卧虹不绝行人歌^③。
先人辛苦一缠寄，旧德清明子孙庇。
規制朴陋无敢增，宗族环居莫轻弃。
幼骑竹马携短童，东眷西眷随所从。

①先宅本临横河后益南辟，遂俯直河。

②宋理宗潜龙事，详予所作会龙桥歌。

③放翁诗：“行歌西郭虹桥市”。



鹅鸭时闹比邻塾，纸鸢閒趁陂塘风。
 最忆读书一弓地，杨柳临池滴窗翠。
 拥卷随师依树吟，洗砚呼俦捉鱼戏。
 我生三十适入燕，沧海横溢无愚贤。
 马蕃亦逐贾区尽，桑柘一例随飞烟。
 归来城郭都非旧，到岸牵船暂相就。
 新丰门巷何处寻，安仁故第从谁售。
 海燕年年绕屋飞，梦中图画是耶非。
 多情唯有霞川水，日望行人万里归。

是年二月曾国藩死。五月左宗棠攻败零星回军。以俄官不肯交还伊犁，清廷命总理衙门与俄使交涉。七月，左宗棠攻下回军占领的兴义，定下安插陕西回军投降者于甘肃平凉等地，并围攻肃州。八月，修成《剿平粤匪方略》及《剿平捻匪方略》。九月，琼州何亚万联合黎人起事。十月，肃州回军攻科布多。十一月，申禁各省种罌粟。令疏浚运河。十二月，岑毓英入大理城，大杀戮。以俄国不交还伊犁，并图派兵阻遏进军道路，命荣全督队稳慎进兵。是岁，俄与阿古柏伯克订约在喀什喀尔通商。唐景星购美船一只，悬中国旗行驶沿海。中国第一次派三十学童赴美留学。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设天文台。日本宣布吞并琉球。

是年，在浙江宁波天主教堂于二月将所有堂址、营业范围内水面及水岸线，出租于人，建筑码头，停靠轮船，即所谓“白水权”。此后各地多所仿效。七月，镇海大旱，河枯，舟楫不能通航。九月，

嘉兴、慈溪、镇海大地震，绍兴有震感。

是年，浙江省人口数六百九十八万二千人。全省有三十八个州、县遭灾。越中禾稼本极丰，九月间连雨二旬，三江口塞，水淹害稻。

四十五岁

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

是年，仍在京师经举人身份在户部候补。正月初一收卧室帖子云：“手抄八千余纸^①，臣生四十五年”。^②故此年多有诗词歌赋之作，亦不辍文集考订。

初二日，阅夏谦父《述韵》。初三日阅江氏《古韵标准》。^③

初四日下午，诣紫泉游厂市至火神庙、賒得《隶释》、《隶续》、《两汉金石记》，银九两；《音学五书》、《潜邱劄记》、积古斋《钟鼎款识》、求古精舍《金石图》，银七两。次第阅后，以为《两汉金石记》“覃溪尽心汉隶，所论多造精微，其补隶续及注，洪氏所作，滂喜尤足，为鄱阳功臣。求古精舍《金石图》，“凡两册，乌程陈经衰之所辑，钩绘绝工。”

初七是人日，赋诗《怀故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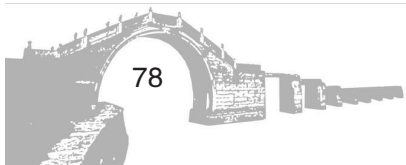
梦里不觉春风生，开门雪止鹊噪晴。
 门前华毂如过水，拥炉独听茶铛声。
 欲寄梅花无可折，呵管题诗写愁绝。
 春到江南一晌迟，梦落山阴万家雪^④。

①《北史·崔暹传》有“录三十六曹”之句，引发为此言。卷二十四，第867页。

②《南史·袁昂传》有“臣生四十七年于兹矣”句，此言原出于此。卷二十六第713页。

③原韵字作均。均、韵原通假，故改作韵。

④时间南中久旱，晒雪甚切。



山阴此日春光多，满城爆竹连笙歌。
村村庙社聚鸡酒，处处春灯围绮罗。
广文五君有同好，各占山城理清啸。
莫嫌俸薄艰盘飧，犹胜低头事年少。
胡家金玉真友昆，养亲读书情弥敦。
车裘颇尚临汝饰^①，科第行署高阳门。
东皋娱园盛宾客，修竹风流继遗迹。
烛花璀璨吟筵高，明日当空酒缸碧。
王郎悲歌穷益豪，说经尤爱河南陶^②。
孙生羸瘦亦嗜学，出语往往惊其曹。
我独三年滞京国，摘菜敲冰作春日。
急须报我草堂诗，读向春风展颜色。

诗后并说：“他日当写致晓湖、梅卿、眉叔三君，使知我入春诗兴也。”

是日作书致香涛，赠以“长亭怨慢”词一阙^③，慰其岁尽悼亡。

正春到、椒盘吟絮。官烛摇红，玉堂雕户。忽自钗分，断云天际渺何处。旧时鸾镜，谁并倚花双树。只留得鸾雏，忍更话青红欢聚。

日暮。认空房履迹，点点，香尘堪数。写成虚位，对遗挂商量眉语。最苦是爆竹闾填，怕胆怯犀簾无主。应倍记年前，拥髻春幡风度。

十八日阅《南部新书》十卷，宋钱易著。“其书言唐事者十之九，多资掌故，足裨两书之阙。希白世居吴越，唐之故老多居其国，故承平文献，述之尤详。”并“考希白为废王侗之子，世居于越，今所阅粤雅堂本伍崇曜跋，误以为忠懿王俶之子。其书伪字甚多，较之《学津讨原》诸本无以胜焉。”

是夜阅周密志《雅堂杂钞》，亦粤雅堂本。“其书多言图画、古器及类记琐闻。”

二十一日阅《南雷文定》卷二“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云，周益公《思陵录》：“钱清江者，东自三江口来，西过诸暨约三百余里，阔古余丈，运河半贯其中，高于江水丈余，故南北皆筑堰，上水别设浮桥渡行。旅大舟例驳载小舟，则拖舟而过。”但十分险惊。“今自麻溪作堰，钱清上流之水引入钱塘，三江口作闸，潮水亦不入钱清。而钱清与运河相浑（混），有江之名，无江之实矣。案钱清江，东晋以前为浦阳江。韦昭等所称三江之一，实渐江（浙江）之别流。今清流演迤，闾闾夹列，并不知有江名。而舟子由此地者，多折而南入西小江以取萧山。盖计水驿较近十里。其地山水迴复，村港纷岐，易于藏匿，乃屡有盗贼之警。观梨州（黄宗羲）之言，彭（谊）、戴（琥）二太守之功，其可忘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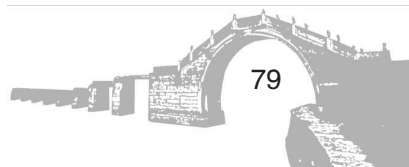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夜阅《三国志辨误》，守山阁本，分上、中、下为魏、蜀、吴三卷，共祇十七叶，言蜀者只二叶耳。不著撰人名氏。阅《宋季三朝政要》，亦守山阁本，凡六卷，一至三为理宗，四为度宗，五为少帝，六为广王、益王。不著撰人名氏，编年记载。阅《唐韵考》。亦守山阁本，凡五卷。纪容舒撰。容舒字迟雯，号竹崖，献县（直隶河间府属县）人，康熙癸巳举人，官至姚安府知府。

二十四日夜阅宋王谠《唐语林》，亦守山阁本，凡八卷。所载多嘉言韵事，为

①梅卿好饰舆服。

②子珍近肆力汉学。

③“长亭怨慢”，姜夔（1155~1221）自制曲，即自制词调。姜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



考唐事者所不可少之书。二十五日潘诗郎撰《庞尚书文庙祀典考》序。序文见《日记》第5642~5649页。

二月初一日,阅《越史略》,守山阁本,不著撰人名氏。《四库提要》据黎前《安南志略》载,陈太王时,陈普作《越志》,黎休修《越志》,疑此书即出普、休二人手,凡三卷。上卷记沿革,自汉赵佗至宋时黎氏;中、下两卷,皆记李氏而称曰阮纪者,以陈氏得国后,凡李氏宗族及齐字姓李者,皆令更为阮姓,以绝民望等之。详见《日记》第5657~5662页。夜间赴安徽馆听灯戏。“都中向有椰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豎听之。一二年来,诸邸有好之者,士大夫遂相率盛行,其价顿贵数倍,衣冠宴会非此不欢,优生益变其音为急促繁乱,以娱众耳。其声焦杀以悲,非祥征也。闻道光以前,朝士燕集,无不演昆腔者,后渐尚摊黄(滩潢)腔,谓之二黄,其音颌俗,串演亦恶,元、明演本,已成雅乐。今则二黄为立部伎矣。风气愈下,即此一事而迁变如此。”与肯夫言之,相对慨然。

初四日阅唐释慧苑《华严经音义》,守山阁本。为钱氏所刻,是可贵也。得宝卿片,言下方桥(今齐贤镇)陈氏默斋所藏书三大楼,乱后无一遗存。默斋,乾隆间举人,官福建盐大使,殉难台湾。名圣时之子世袭云骑尉。

初六日阅《春秋别典》,守山阁本,凡十五卷。明海洋(县名,属登州府)诸生薛虞畿,字舜祥撰,其弟虞宾补辑成之。“薛氏此书虽所采无奇秘之籍,然有益于

学者不浅。钱氏注之更为完密。窃谓此与孙渊如氏《孔子集语》两书当梓之家塾,为读经所必需也。”

初十日杂阅宋人朱无惑(或)《萍洲可谈》、曾慥《高斋漫录》、张知甫《张氏可书》、陈齐之(长方)《步里客谈》、亡名氏《东南纪闻》,明人陆文县(容)《菽园杂记》诸书,皆守山阁本。以为“此等稗编、脞说,篇表廖廖,所谓底下之书,无当大雅。然随所摺拾,皆足以广见闻,触类而长,亦资史学。”详见《日记》第5671~5681页。

十三日夜阅吴才老《韵补》。“此书泛滥极矣,然于复古不为无功。顾亭林正之,仅标举某韵合者几字,不合者几字,而不明言其所以然,且其去取亦有未的者,拟再为详考之,而心绪烦乱,精力不继,古人所谓‘读书须有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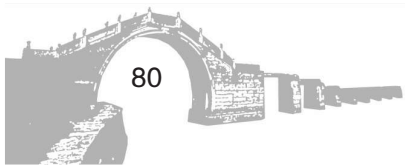
十七日夜月清绮如昼,以水仙花盆承玻璃窗下观之赏咏良久,填“探春慢”词一阙:^①

叶蠹春纤,苞团玉洁,醞得冰心如许。吹气难胜,扶头有帐,小试凌波微步。不识东风态,祇忍俊、天寒无语。也应独立消魂,人间何事尘污。

可是前生瑶侣。凭量水添香,抚他眉妩。暂启重帘,绮钱低映,留得银蟾来驻。还惜亭亭影,怕清绝无人为主。历历星霜持裙,莫便归去。

三月初五日,牧庄以阮文达《雷塘庵主弟子记》、《朱文正公年谱》见借。阅《朱文正公年谱》二卷,其子四品正堂锡经所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八卷,前二卷

① “探春慢”,即《探春》,词调名,有双调。



乌程张鉴所编，至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止；三卷、四卷文达长子直隶清河道常生（本文达族子，先立为嗣）所编，至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止；五卷、六卷文达次子甘肃平凉府知府福（实庶长子）所编，至道光九年己丑（1829）止；七卷文达季子一品荫生孔厚（孔夫人出，实嫡子也）所编，至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九月文达予告回籍至；八卷镇江柳兴恩所编，至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己酉，1849年）文达卒止。“雷塘庵主者，文达以先墓皆在雷塘，故以自号也。朱、阮两公，皆经学重臣，立朝最久，其年谱可与国史相出入。而两家记载皆多誇恩遇，仅识迁移，于文正立朝之大节，文达兴学之虚心，皆无所发明，时事安危亦慎从略。柳氏所谱尤陋。足见谱学同于史学，非才识兼长者不能为也。”

十四日，春气极暄，杏花将谢，蜂蝶满庭，夕阳时坐庭下读《楚辞》，吟赏甚适。夜月甚清绮，二更后坐杏花下，风露渐深，得词一阙：

东风第一枝^①

日暖云边，春来天上，杏花开到庭院。甚时宫样添栽，便把流光轻换。琼轩并立，恰占得、东风刚半。镇记取、老干孤擎，不许闹红零乱。

最爱是、月明宵煖。认积雪、满枝香散。衬他一抹银墙，依约烟横雾淡。红窗吹笛。都不似、梅花哀怨。待画出、绮影帘前，长傍玳梁双燕。

[注]去春，寓庭新栽红杏二株，经年

未抽一条，以为枯矣。三月中旬忽著花满树，老干密荫，有团云流雪之观。月夜赏咏其下，香色双绝，裹回风露，倚以曼声，铁骨冰心，不令老梅独擅耳。

十五日，与磨伯诸君游慈仁寺，金雀榆叶、梅蓝子诸花盛开，得词一阙：

台城路^②

凤城西畔前朝寺，袂春又联吟侣。松合香台，草侵荒殿，撩乱风幡铃语。杏花过雨，正蓝子摇红，丁香含素。庭院深深，磬声不隔燕莺路。

藏云洞今在否？登临孤阁迥，难寄愁处。柳绿卢沟，云开蓟镇，依旧青山无数。悲歌倦旅，看禅榻茶烟，鬓丝如许。好片斜阳，暮钟催客去。

[注]癸酉上巳谢磨伯编修招同庭芷游兹恩寺，登昆庐阁，忆自庚申闰三月偕庭芷宴集于此，冉冉十四年矣。

二十二日观新栽垂杨猗那可爱，赋词“琐窗寒”一阙，赏之又赋“高阳台”词一阙，底为肯夫题其妇翁钱晓庭大令画册词“长亭怨”一阙。

琐窗寒^③

约略腰支，刚应梦醒，汉宫春晓。柔条几日，蹴地便侵荒草。问章台、为谁长成，趁时碧玉年华好。想朦胧娇眼，未曾省识，西风斜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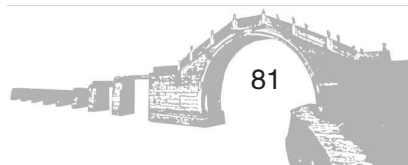
生小。双娥孺。怎怯怯移来，恨丝萦绕。学舞才能，见说尊前人老。记年时、莺燕故国，青青未折春已香。但从今、寄作东风，证取成荫早。

[注]听事前植垂柳一株，袅那可爱，

①词调名。又名《琼林第一枝》，亦有题作“灯夕”，“灯夕清尘”和“元宵”等。

②“台城路”，词调名。

③琐窗寒，词调名，一作“锁窗寒”。多写羁旅、思乡感怀。



春暄满窗，玩之终日，迴风披拂，亦足当小蛮一舞也。

高阳台^①

璩岛春生，液池波暖，晴阳正丽花砖。宫漏声中，几回暗度华年。碧桃丹杏参差过，渐风翻、红叶阶前。趁微吟，退直鸣珂，满袖铲烟。

才看扈跸红云辇，又三天待宴，寿寓开筵^②。仙乐琳琅，也曾梦到鸥边。果骝酒榼城西路，掩丛林、十亩花妍。莫辜他，锦幄猩屏，曾约银笺。

[注]东郑庵侍郎寻城西海棠之约。

长亭怨^③

凭重检玉区佳事，粉指痕留，露华犹湿，老辈风流。传家画本滕丹碧^④，漫惊烽火，携娇女山居萧瑟。竹屐练裙曾侍砚，芸牋亲擘。

愁说。婿乡回首处，莺脰泪波堪挹。种松人去，便雪裹秬桃都折。付萧郎。采笔相思，重证取、花红圆月。况看兰筍森森，仍是绿阴时节。

[注]首题，朱肯夫侍读属题其妇翁钱晓庭大令聚朝所画花卉小册，是庚申三月挈其女朱宜人卿藻避乱山中，因以寓庐景物图付左芬。肯夫追感坠絃，益怀传研为谱此曲，略遗悲怀。

末题所画有松、竹、兰、笋、木笔、芍药及雪里桃花，又有题句云：“屋西旧种数竿竹，喜见春来新筍生，为语儿童休掘

取，日长留得午荫清”。

二十五日，肯夫来，同至慈仁寺看花，丁香正盛，桃花半落，坐西厢下啜茗，适适吴清卿、陆芸生两编修、顾缉庭工部来，席地同坐至晚，肯夫邀饮广和居，更余归，得词一阕：

满庭芳^⑤

风漾游丝，雨晴芳草，联骑重款禅关。碧桃才过，红绽海棠鲜。犹有丁香似雪，斜阳外、占尽春妍。经行遍、廊空人寂，雏鹊斗门前。

萧然僧几个，垂帘扫地，静炷炉烟。且访钟林下，选石云边。难得江南吟客，松风里、来听茶煎。还相约、绿荫如幄，清簟枕书眠。

[注]前题“暮春再偕肯夫游慈仁寺，坐丁香花下，适吴清卿编修、顾缉庭工部亦各携茶具来，遂同席地，至晚而散。赋柬肯夫。”

二十七日，作极乐寺、三贝子花园之游，得词三阕：

清平乐(一)^⑥

年年春事。西直门西寺。一路衣香随蝶至。不辨人丛花气。

枝枝红艳消魂。相携翠管金尊。一霎绿杨风气，依阑独数春痕。

清平乐(二)

河桥南畔。朱邸无人管。舞榭歌楼全不辨。好个秋千庭院。

①高阳台，词调名，又叫《庆春宫》、《庆春泽慢》。多抒感念、慨叹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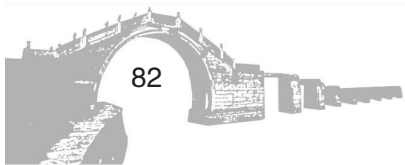
②明日，上万寿节。

③姜夔自制曲调名。

④太令为籍石后人。

⑤满庭芳，词调名。为吴潜所创。

⑥清平乐，词调名。又名《清平乐令》、《醉东风》、《忆梦月》。多诉相思之情。



碧廊一带阑迥。沿流树转山开。听罢江南蛙鼓。薰风满袖归来。

[注]前题“春晚日，仁和陈芑声户部、蔡辅臣刑部两同年，招集极乐寺赏海棠。酒毕，同游可园两首。”

卖花声^①

槛外绿漫漫，烟雨回环，夕阳依旧满西山。万户千门无觅处，寂寞春还。

无语独凭阑，旧事堪叹。龙舟犹系绿杨湾。风吹宸游天上去，流水人间。

[注]前题“登可园（三贝子花园）山阁看西山作。”

四月初二日凉露萧然，补事填词，得四首，录两首：

摸鱼儿（一）^②

又垂鞭、高梁桥畔，玉泉如带春绕。露华当日巡行处，夹辇复生春草。龙尾道。应倍忆、银绯散直寻春早。宫花压帽。看玉勒嘶嘶，朱衣吏引，日伴翠尊倒。

当年事，佛日红霞环抱。露华千树凝晓。海腥一自翻西极，楼阁五云俱渺。花亦老。便种得，天桃桃李都年少。题诗再到。愿满挹天羹，长携莲炬，来向艳妆照。

[注]前题“后二日，郑庵再招集极乐寺。郑庵言，庚申之岁寓直澄怀，屡来游宴，花事之盛，亦非今比，因取其意谱之。”

摸鱼儿（二）

甚匆匆、一年春老，海棠开遍琳宇。

广庭十亩红霞队，交倚翠帘朱户。能几度。消受得、金尊银烛伤春句。画阑断处。有一树垂杨，恰当花缺，为我尽情舞。

循流水，还忆旧径行路。香车宝马同驻。屐痕细影分明在，遍是落莫无数。莺燕去。祇赢得，枝头犹带前年雨。闻愁漫诉。且再问荒园，绮窗尘网，牘有断钗否？

[注]前题借孝达、麀伯诸子自极乐寺游可园时，孝达悼亡，予亦见去年知识中有夫妇相值于此者，其人旋亦有分钗之感，因赋其意柬孝达。

初六日，为伯寅侍郎题《邵钟拓本》，文见《日记》第5728~5731页，甚难看懂。

十二日，补作前日盛伯希家赏牡丹词一曲。

翠楼吟^③

曲槛留春，华轩敞夏。当年朱邸分赐，香尘随步径，还随处雕阑堪倚。小山纤峙。又飞阁流丹，迴廊萦翠。垂帘底，绿杨垂上，乱花横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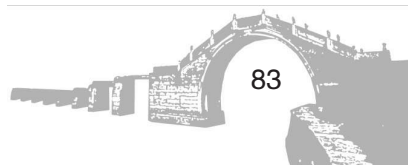
最爱千朵娇红，似绛幡朱节，舞鸾飞坠，天风环珮响，更深院沉沉歌吹，艳情谁寄。正钿匣裁诗，金兔漆麝，人微醉，锦屏双影，折枝横髻。

[注]前题“同年宗室伯希孝廉（成昱），肃恭亲王曾孙，协揆文愨公孙也。家有园亭极胜。其闺人及令妹皆能诗。初夏招赏牡丹，裴回阑槛，艳情欲语，赋此赠之。”

①卖花声，词调名。

②摸鱼儿，词调名。又名《山鬼谣》、《安庆摸》、《陂塘柳》、《买陂塘》、《摸鱼子》、《迈陂塘》、《双蕖怨》。多感怀时事，寄托幽愤之情。

③翠楼吟，词调名。



十五日点阅《江湖载酒集》，补前日记游词三首，不记词辞。因念三妹遭扼，仲弟贫甚，内子无依，拟偕同至京，并日以食。故作词自遣而已。

二十七日阅《曾文正集》，其江宁《宦绅昭忠祠记》、《湘军陆师昭忠祠记》，近代之杰作也。《官绅昭忠祠记》为向和张三帅军营殉难者作，斜次癸丑至庚申胜负成败之事，如指诸掌，此非有笔力不能，其议论亦极平允。

五月，因心情不好，生活窘迫，阅些许先人、近人诗作外，对纪竹厓（晓岚）《唐韵正》、程春海《文集》、翁文纲《朱氏经考补正》等书略作订正评介，还为伯寅题《建文铁鎚拓本》作七古一首。诗见《日记》第5761页。

六月初五日，阅洪氏《北江诗话》，凡六卷。以为“稚存于诗本非专门，故所论多未确”，“学有根柢，才悟绝群。”提出了一些独特见解，可资参考。如说“邯郸淳《曹娥碑》文笔平实，蔡中郎《郭有道碑》绝无异人处”，“向日盛传，皆係耳食为古人所欺。”又如言“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谓考订家，钱大昕、戴震诸人是；“辨其板片，注其错伪”，谓校讎家，卢文弨、翁文纲等是；“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谓收藏家，鄞县天一阁范氏、钱塘瓶花斋吴氏、崑山传是楼徐氏就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谓之赏鉴家，吴门黄主事丕烈、乌镇鲍处廷博等是也；“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贋，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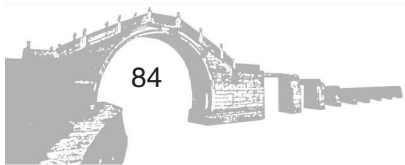
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吴门钱景开和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等书估（贾）就是。先生以为“其言足为藏书家定评。”

初六日阅钱同人等《崇文总目辑释》，凡五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前有钱同人序。卷一经部由同人伯兄既勤（东垣）所辑，卷二史部由同人仲兄以成（绎）所辑，卷三子部（上）同人所辑，卷四子部（下）由同人姐婿桐乡金钜和（锡鬯）所辑，卷五集部由嘉定秦鉴（照若）所辑，补遗及附录皆同人所搜者也。

“此书自宋南渡后止存目录一卷而亡。其叙释，同人等据范氏天一阁抄本，间或标注撰人。因本朱竹垞之说，取《欧阳文忠集》中所存经、史、子三部原叙，更蒐采马氏《通考》及《玉海》诸书所载原释，零文断句，一一补缀，又取各史《艺文志》为之参证，附以案语，正其缺失，其用可谓勤矣。秦氏刻入《汗筠斋丛书》。同人名侗，嘉定诸生，可庐孝廉之子。”

十六日，庭中新植竹数十竿，梧、柳各一本，芭蕉两本，夏夜坐其下，待月上迎凉风，赋此寄晓湖、春斋、故山二首。录一首：

陋室一弓地，新种竹与梧。
笋苗既秀茁，桐华亦荣敷。
芭蕉二三本，渐见清阴舒。
披襟坐其下，微风来徐徐。
崇朝苦暑汗，俄顷都涤除。
时会皆适然，何况物荣枯。
官贫喜得閒，经年常抱书。
寸禄虽未沾，一饭饱有余。
人生喜得丧，昧者徒区区。
东邻居八坐，日直承明庐。
西邻两持节，旌旆争南趋。



辛苦为子孙，光华誇路衢。

从君问所得，何益千金躯。

十八日抄《弟子职集》。“竟取程氏《瑶田》、孙氏《同元》说补正，其未确者数条，又时下己意申释之，后系跋一首，将更写靖本梓行。此予欲为家塾四书之一也。”

（以上均见《桃花圣解庵日记》庚集，是月二十一录入辛集）

二十二日，闻香涛、理庵皆奉典试之命。香涛得四川，为第一美差；理庵连科主湖南试，亦仅事也。

闰六月间，为伯寅侍郎以昌黎《石鼓歌韵》撰《齐搏歌》^①、又撰《孟鼎铭拓本赋》二首、再撰《齐仲子姜搏诗》五古二首于拓本上及《郑按盒赋》一篇。外书应酬之作《送杨理庵检讨重典试湖南》七古一首、和《瑶台聚八仙》、《临江仙》等词。

七月初一，闻绍兴府新昌县烟山民变。旋即解散。

初五日点阅闽人何治运《何氏学》一过，系以跋云：

“吾乡章实斋讥近儒著述，多自称某某学，谓误用《汉书》某经有某氏之学语而不通。案近儒经说之称某某学者，乃用何邵公《公羊解诂》称何休学之例，明谦辞也，非用《汉书·儒林传》语。章氏疏于经学，自蔽而嫉贤，好诋切并时江缙涛、戴东原、汪容甫、洪江北君子，以矜自大而其言又失之不考。若何氏此书，不过考据杂文，且有代人酬应、无聊短篇，而竟题书曰‘何氏学’，则真妄而不通矣。汉曰某氏学者，谓此经师弟传授有

此一家之学也，是固名何经传何人而谓此。‘何氏之学’乎，其书泛滥杂博，一知半解，时可节取而逞忆武断，杂引不根，气嚣志张，高自标置。如校正《逸周书》，名为《周书》后定为不当，有逸字而自誉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补正福建旧志，名为《东越志》，谓不当称闽，而自誉曰大贤君子函雅，故通古今……。然其申经、训辨、雅诂，于声音文字之学，时有补苴，存其书焉可矣。”

是月以钞《唐韵》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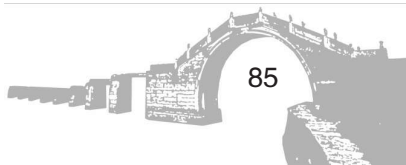
八月初二日，皇帝亲祭月坛，部派先生陪祀。

十四日，先生以其内子（妻子）九月十八日为五十岁初度，寄家用银十两，寿礼银四两，并作书，但言“糟糠之妻，百年倏半，南北异地，一椽未安，未办王阳之金，聊比东方之肉，牛衣展泪，雁帛缄情，寄此区区，略胜从公终饿死耳”云云。

是月初四、初五、十七等日，均因寂寥之甚，乡试之际，复试写册摺各二篇，可见先生尚存科考之念。

九月初二日得陶子珍、孙子宜并和先生所作水仙、杏花、垂柳、海棠四首。“子珍书笔简古极，有魏、晋之风，子宜亦雅炼无一凡语。词则陶词清绮，孙词婉秀，具深入草窗玉田之室。乡里多异才，非他处所欲望也。予赋诸词颇自誇赏，而都下无可索和者，因号寄子珍，属与子宜、眉叔、秋伊、心云诸君共和之。今先得二君佳什，视予作转拙矣。子宜年少而所就如此，门墙得此生，殊不寂寞也。”可见，先生还是谦逊有加，对培植后生亦

①搏，古代表铜乐器，形似钟，悬而叩之而鸣。亦说大曰钟，小曰搏。



义无反顾。

十三日为吴清卿编修(大澂)以手绘《古器图识》属题,即送其视学秦陇二首(五古):

其一

当代论金石,潘陈古癖推^①。
翰林谁继起,吾子擅清才。
余艺兼图绘,高斋足鼎彝。
读书期有用,都赵等舆台。

其二

百二秦关启,山河接陇凉。
至尊方侧席,大帅已平羌。
慷慨登车始,文章致治长。
此邦多古绩,余事及缣缃。

诗中明确提出了读书有用,文章资治;都朝舆台,余事缣缃的主张。

又为麀伯题《玉河秋泛图》七古一首:

玉河之水细山来,西湖太液相萦回。
东会潞河设闸七,建瓴之势如轰雷。
神庾百亿此津逮,千夫转运万缗费。
舟楫虽通不敢行,徒供鸥鳧水中戏。
火云三伏水熇熇,追凉逐队趋城东。
绿沉西瓜玉乳酪,轻车怒马行如风。
大通桥旁百肆集,冲波万道溅飞雪。
游人掷钱群儿争,出没惊涛狎鱼鳖。
我来正值秋深时,沿河十里无酒旗。
空舟三两乱鱼鲙,红阑暗淡摇寒漪。
谢公休沐理游屐,陈子放生载鱼出^②。
粤东二客皆好奇,我亦茸衫挈蛮榼。
西风飒飒吹榆杨,苍茫烟霭遥天长。
前朝废寺唯秋草,公主坟园空夕阳^③。

回舟忽入芦花际,萧骚大有江南意。
相怜方麀骑驴人,何日鱼菱作家计。
夕风转劲不得留,回车买醉天街楼。
幸有画图长在眼,明年相忆晋汾秋。

[注]诗前题“秋日大风,偕陈六舟、谢麀伯、陈逸山、徐寿鸿户部(树钧)、张研秋工部(兆鼎)出大通桥至三间而回。逸山绘《玉河秋泛图》以赠麀伯奉使山西,属予题诗云云。

十六日补撰前日(十二日)夕照寺纪游诗四首(录二首):

昔日平津馆,风流最可传。
爱才贤相业,行乐盛朝年。
花木凭谁记,楼台尽作田。
荒池留一曲,曾与照华筵。

画簾明将发,辇轺上太行。
河声三晋壮,日气九边黄。
地险风犹古,民贫学易荒。
澄清吾辈责,话别暮云苍。

[注]前题“重九后三日偕庭芷、六舟、逸山、邓献之郎中(琛)饮城夕照寺,并饯麀伯督学山右,酒毕同游万柳堂四首。”

是月,先后阅读《尔雅》、任子田《释缙》、《金石萃编》、《后汉书》诸序论、《毛诗礼征》、《潜邱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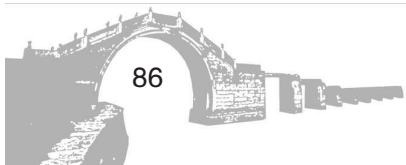
十月初二日开始,先生多次书写“殿卷”半叶、一叶、一开、二开不等,抑或为京试作准备?

初五日起阅读《禹贡锥指》,抄《唐韵

①潘,指潘伯寅侍郎;陈,指陈寿卿编修。

②陈子,指陈六舟,喜放生,故屢至此地。

③二闸有明代广惠寺,已废。又有福寿公主墓。



考》，校《汉书·地理志》等。

十三日阅朱竹垞与查德尹书，述李天生之说，谓唐人七律，凡同纽之字，皆不连押，杜陵于一、三、五、七句上、去、入亦必相间同用之，故于诗律尤细，云云。先生以为“予按之，亦不尽合，然其言极有理。盖所谓律者，如乐之有律吕，词曲之有宫谱，不可紊也。而此中又自有斟酌，盖同纽之字及双声叠韵之字，出句皆不宜相犯，以疑于平仄两用韵也，若对句则既属用韵可改者改之，不可改者究以语之工拙为主，不可顾此失彼也。至上、去、入相间也，尤不必拘与其相间而音仍属同部，不如连用而异部也。今日因取旧作五、七律，凡犯此病者皆改易之。”

十五日，因连夕月甚佳，张烛读书，倚窗而坐，不施帘幙，觉内外通明，旷无一物，吾肺腑中亦无穷出清新耳，因赋诗四章，以纪一时光景。

京邸冬夜读书四首

(一)

日入夜气定，皓月当窗隅。
晷短课常绌，篝烛还读书。
插架虽无多，撙经颇有余。
意专生默悟，力猛忘前纡。
随时理旧业，道一无岐趋。
礼为六艺本，名物尤根株。
此事未剖析，安足名为儒。
所苦乏记忆，一密嫌百疏。
深思始知艰，博探乃愈殊。
亦或遇创获，孤怡慰积痼。
间复及百家，流览息我劬。
有生秉孤尚，谁能惑他涂。

(二)

庭树叶尽落，上承月与霜。

银烛与相映，内外通清光。
茶炉养余火，风簾敞虚廊。
旷然无一物，星斗在我傍。
遂觉肺腑莹，清新发文章。
啸咏一俛仰，天地相低昂。
岂不患饥饿，明晨尚无粮。
此乐足予餍，进修安其常。
霜厚宿鸟噤，吾亦梦礼堂。

(三)

街头叫卖物，果饵醅饴糕。
杂以乞儿呼，月惨声弥高。
驱车忽雷动，隐辚一何骄。
上者走贵要，次亦竞酒肴。
苦乐虽云别，身心同其劳。
亦有就灯火，高视群儿曹。
摇头诵帖括，攘臂谈风骚。
生死囊鞬誓，吐纳侪蛟螭。
其间少才俊，大言益嚣嚣。
碑摊汉魏字，器列商周朝。
问以五经目，茫然堕云霄。
人怜不自恋，噉名忘中枵。
荏冉岁华逝，姓氏吹枯蒿。
同有此夜月，万籁争欢号。
闭门不相闻，冻竹风萧萧。

(四)

昨日中旨下，率钱修离宫。
读诏私太息，此举宜从容。
圣人秉纯孝，不暇权始终。
长乐楼百丈，积庆花千重。
取足天下养，承欢良无穷。
四海幸平一，物力尤未充。
岛夷怙群丑，鼾睡长安中。
诚宜法文景，励治威诸戎。
安可舍禁钥，危照甘泉烽。
台疏间一上，未得回宸衷。

贤傅造辟言，主德本至聪。
岂不念民瘼，何难罢新丰。
事关固根本，连章期诸公。
冗官未食禄，涕泪徒沾胸。
伏阙讵可效，草奏谁为通。
负此读书力，仅争章句功。
漆室夜深议，四顾无予同。

以上四首五言诗，一气呵成，从不同角度揭示社会现实，反映其为国为民而不得施展才能的抑郁情怀，同时以诗作回答以“语之工拙为主”的诗学主张。

二十五日校《汉书·地理志》。“近日本不暇为此事，以昨检一音，忽见太原郡广武条下云：‘河主贾夏屋山在北疑河’以为‘主字有误，因考全谢山、王石渠诸家之说，知为‘句’、‘主’之误。”可见先生治学之严。

二十九日阅《三礼通释》，共二百八十卷，分一千二百门。为释二百三十卷，为图五十卷。“首天文，终丧服。大旨发明郑学，而博采自汉迄今，诸家之说多所辨正，亦时匡裨郑义，体例依陈氏《礼书》，而确守古训，不同陈氏之好出新意。诚礼学之巨观，不朽盛业也。前有历城毛寄云总督（鸿宾）、湘阴郭筠仙巡抚（嵩涛）两序及自撰论略二十八则，冠以上谕及礼部奏议、进书、呈词。其书浩博无涯，诶穷年不能殚也。”

十一月，先生阅《旧唐书》浙中新刻本，发现误氏甚多，有脱落数行者。“近日局中诸君皆不知史事，又甚粗疏，所谓

‘书愈刻而愈亡’矣。”以钱、王、赵三家考订书校之多有疑问，亦发感想多处，如说“白（居易）性恬静，知难而退，遂一以诗自见，微之热中，竟至苦节不可贞矣，二人之仅以诗名，要岂本心哉。”“唐人以进士为宰相之极选，以诗赋为致治之本原，驯至国亡而犹不悟，聋虫瞎马并为一谈，史官无识奉为定论。”所谓“此名儒者诗赋书判、庸烂鄙陋之名儒也；此名公者进士宰相、齷齪朋党之名公也”。是为确评。校《后汉书》亦有所辨正。并杂阅诸子。

是月仍忙于题本、和韵，先生以为“此等诗，集中不宜多存，不复录稿。”故仅采诗赋三首录入《日记》。

（一）

夜题邓献之诗集七古一首^①

黄州诗人晋阳吏，十年宰县乏生计。
苦吟每和薄鞭声，载酒时联入山骑。
京官比屋无炊烟，仰望守令如登仙。
君独胡为解黄绶，翻携琴鹤栖寒毡。
竭来示我好诗句，别有风怀寄毫素。
衣上犹飞句注云，杖头曾拂天池树^②。
长安寥落无往还，余亦经常常掩关。
相约结邻枕书卧，还支手板看西山^③。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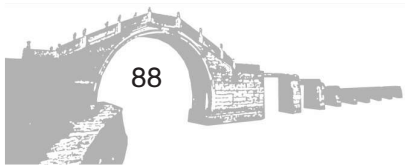
读史感事二首

瀛海空环大九洲，覆棋全局几时收。
河流东走鱼龙壮，烽火西连岛鼠秋。
台筑轩辕谁敢射，圃觴穆满已难留。
被衣一睡浑閒事，便解钧天万古愁。

①诗前题有“题黄岗《邓献之诗集》即酬其见赠之作。献之以蒲县令改官入都中。”

②君尝摄宁武令，著“天池风叶”等八咏。

③时与君有同居之约。



黜陟山中岂与闻，罪言谏草重纷纭。
将军铁券赎三死，大贾金钱策异勋。
已为免冠憎汲黯，徒传请剑出朱云。
洛阳痛哭终何益，输与当年万石君。

十二月朔日，读《史记》，校相关纪传，认为《史记》中亦有后人羸入、附入之语，并加以考证。

初五日，以为《旧唐书》中之论赞亦有极佳者，并一一加以点评，详见《日记》第5967~5970页。

初七日阅钱竹汀《养新录》论《张守节〈史记正义〉》合“汜、汜”为一字，遂列“汜”字有四音之误。先生一一作了考核订正，是为做学问之最。详见《日记》第5971~5973页。

初九日起阅、校《三国志》，文在《日记》第5975页、5979等页中。其余日子则阅《经义述问》、《楚辞·天问》等。

三十日，即癸酉除夕，偕同里张孝仲舍人（锡申）、史宝卿同年（慈济）寓斋守岁，论学达旦，因再用东坡《除夕》寄段屯田韵示二君：

我读佛氏书，论字分满半。
儒家反不识，伏猎貽笑叹。
文章学俳优，师友供狎玩。
淫声益侏离，大义日破散。
入耽博弈戏，出逐鸡狗伴。
置身或庙堂，遇事同盂旦。
铃尾听吏胥，俛首刮几案。
谬种束一轍，驯致酿大乱。
咎由昧六书，昏睡怠沃盥。
所以宣圣言，正名岂容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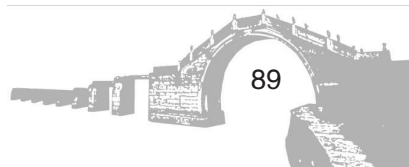
我老颇嗜学，孤陋乏讲贯。
幸为麻中蓬，扶此大心懦。
竭泽慰羡鱼，伐山恣取炭。
二君今旧雨，岁寒适我馆。
围炉共兹夕，谈深觉衣煖。
四邻爆竹喧，一室烛花灿。

是年正月，慈安、慈禧两太后撤帘，穆宗亲政。二月金顺奏抵肃州攻回军获胜。三月，荣全奏俄兵在伊犁任意勒索，索伦、锡伯、蒙、汉兵民望救甚切。四月，岑毓英部攻下云南地。左宗堂在毛目等地打败回军。禁江西额外加征钱粮。五月，白彦虎率陕西回军走嘉峪关外，企图赴乌鲁木齐。岑毓英攻下回军最后据点腾越。云南自杜文秀起义共十八年，至是告终。六月，左宗堂奏赴甘肃肃州。初次允许外国使臣觐见于紫光阁。闰六月，命清查各地违制征收亩捐、厘捐，次第豁免。七月，陕西回军西走，敦煌吃紧，朝廷命设防堵截。八月，肃州回军投降，左宗棠大肆屠杀。九月，庄洛山攻扰朝阳等，不久败走。十月，四川黔江发起毆死外国教士案。十一月，越南使来，仍请派兵协助镇压北圻。十二月，左宗棠请待准备好后择日出关越南。

是岁，何绍基死。^①

这年在浙江，7月27日，新昌县会党数千人，聚集起事，围攻县城，旋即失败。浙江省首批出国留学学生王文喈、陈乾生等8人，分别于这年及后两年出国留学。全省大雨，丽水尤甚，水淫、冰雹伤稼。

①何绍基(1799~1873)，清诗人，书法家。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州人。道光进士，官编修，四川学政。





刘宠散论

□ 钱茂竹

范曄《后汉书》载有《刘宠传》。在范曄之前的诸多《后汉书》中，亦多有刘宠传述。以《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版）所載，有谢承所著《后汉书·刘宠》，且有二则，一为卷五《循吏传》，一为卷六《刘宠传》。有司马彪《续汉书》卷五《循吏传》中《刘宠传》。有华峤《汉后书》卷三的《刘宠传》。另外在《三国志·吴书》中有刘宠之侄《刘繇传》。可见刘宠为历代史家所重。在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初学记》、《北堂书钞》及《文选注》中均引有刘宠事，足见刘宠确为古代官宦之师，人伦之表，让人启发良多。特据史籍所载，浅谈一二：

一

刘宠的清廉，自有其源，源之一在家教家学。

《后汉书》本传所载，他是齐悼王

之后。齐悼王是汉高祖刘邦之子。因悼惠王之子孝王将其少子封于牟平侯，牟平在东莱郡，故其子孙遂以牟平为家居之地。一直传至刘丕，即刘宠父。丕博学众家，学问深博，“号为通儒”。儒家主张仁爱为本，仁者，爱人也，提倡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倡廉洁之风，官廉则清，清则威生，威生则事行，故其基础在廉。刘宠自幼受此家教，遂打下儒学从政基础。本传曰：“宠少受父业，以明经举孝廉，除东平陵令，以仁惠为吏民所爱”。汉时实行察举制，以其人的品行和学问才干为考察依据，层层举察，逐级上升。这一举察制，固然受为官者和世家大族局限，但亦为下层人士所关注，刘宠就是受举之人。刘宠一任县令，就以仁爱施政于民。本传举一例：“母疾，弃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他受到百姓如此

爰载，挽车攀留不让离县，可见他平日待民的真诚态度。这里又见到刘宠是个孝子。汉晋时代，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李密《陈情表》云：“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孤老，犹蒙矜育。”刘宠也如此，母亡，按制当守孝三年，故必须返乡。但如今又不能忤逆民意，就只好轻服遁归，偷偷地换上便装，从别的道路归家奔丧。

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百善孝为先，孝是仁的中心内容之一，孝德是人伦的根本。如对父母不孝则何以为人，何以处世立身，世云“忠臣出孝子”，于国家忠义之士必在家中是孝子。试想，对父母不孝，怎会对国家对民族忠贞呢？刘宠从爱父母起而爱百姓而为国之栋梁，这是一步步实现的，可见孝德教育何等重要。重视家教家学，重视孝德传承是培养有为人才的基础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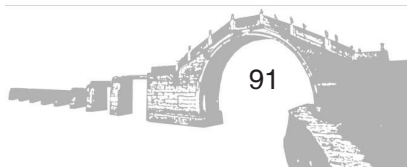
二

在各本《刘宠传》中，都一致认为刘宠任会稽太守是其事业的重点。以后才四迁为“豫章太守”，“转为宗正大鸿胪”“为司空”“拜将作大匠”，等等，最后他累登卿相。真是历职众多，在外是封疆大吏，朝内是卿相高位，可称位极人臣，权秉一时。但传中均无具体实例叙述。这不是无事可写，无迹可寻，而是比较起来均不及他在会稽太守任上之事，可见在会稽一钱太守事迹实在是刘宠一生事业的顶点。不只是刘宠一人之最，亦是凡列入“循吏传”之循吏的典型，《后汉书》各书作者才会如此处理此事。

《后汉书》本传云：当刘宠离开会

稽时：山阴县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间出，人携百钱以送宠。刘宠谢绝，问“父老何自苦？”于是父老们讲出肺腑之言，最后说“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盛情难却，宠只好择一钱受之。刘宠行至西小江，再前行就出山阴县了。他想，虽只一钱，总是百姓之钱，我何能领受呢？于是将钱投入河中。后人将此水称为钱清江。

从刘宠这一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点：一是安民，一是利民。这是作为循吏的基本要求，刘宠做到了，且做得十分好。凡事不在你想什么，做了什么，而在你做的效果如何。口头上讲得天花乱坠，实际结果是一塌糊涂，民不聊生，这怎么能取信于民呢？刘宠知道为官者首先要安民，让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恐慌担忧，没有怕前怕后。大家安心生产，安定生活，这是百姓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的生存之权。为此最根本的办法是“简除苛法，禁察非法”，一切从安民出发。刘宠就是如此做如此行的。父老们说：过去的太守是“时更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官吏不时来到乡里，扰民勒索，敲诈百姓，昼夜不绝，连狗吠也不能停止，弄得民怨沸腾。如此不安定的社会，百姓如何生活，如何生产呢？而如今刘太守守越三年，“郡中大化”，废除苛法，严禁鞭扑，则是“狗不夜吠，民不见吏”，百姓安定，人心怡乐。这真是“遭逢圣朝”，社会宁静了。民安才有民奋，才有生产发展，才有民富和社会繁荣。刘宠的第二个措施是利民。过去的苛法，最根本一点是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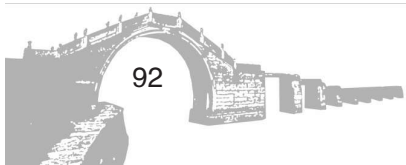


民之利，夺民之粮，掠民之财，使百姓穷困潦倒，以致饿死荒野，路有饿殍。刘宠明确为官者之首要职责在利民富民。《淮南子·泰族》云：“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所以安民利民是为官者之根本。《尚书·伊训》曰：“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以宽厚的政策去代替暴虐，则百姓就会信赖并归顺你。《尚书·泰誓下》又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关爱我的人，是我的主人，残虐我的就是我的仇人。百姓的安危、喜怒，百姓的感觉，民心的背向，是衡量为政者的唯一标尺。刘宠以民为上，以民为出发点，所以使“郡中大化”。百姓心明如镜，谁仁慈，谁苛虐，看得一清二楚。刘宠为官，深得民心。在东平陵时，百姓拦车塞道，不让回归；在会稽时，就有若耶山五六老叟，人赠钱以送的感人场面。这都是刘宠仁惠为怀，爱民安民利民的结果。《管子·牧民》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顺逆之间，全在民心。民心乐了，他也就乐了。忧乐与同，则为循吏，为良吏，才能称为父母官。《孟子·梁惠王下》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所以为官者就要与百姓心连心，他是公仆，是百姓之子弟。其精神境界决不在一己之私利，而在百姓之忧乐；在百姓之忧乐者，自己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快乐。

刘宠在会稽之为政就在安民、利民两事。这是仁政、德政的集中表现。

三

《刘宠传》叙其晚年，虽登高位，依然是清约省素，家无货积，真是两袖清风，别无长物。在司马彪《续汉书》本传中还有以下叙述：“宠前后历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贿，无重宝器。恒菲饮食薄衣服，弊车羸马，号为窳陋。三去相位，辄归本土。往来京师，常下道脱骖过，人莫知焉”。这里具体述说了他历仕显宦，依然居家清贫，无重宝器，菲饮食，薄衣衫，出门弊车老马，决不是那种高官厚禄者，乘肥马，衣轻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深思的是司马彪的刘宠本传在会稽为选受一大钱之后，赞叹道：“其清如此！”而在叙八居九列三去相位后赞叹道：“其廉俭皆此类也！”这真是两处点睛之笔，是最高度的概括。一是清，一是廉，刘宠这一人物的本质就是这两个字。而这两者是统一的。何以能一尘不染，原在廉洁自律。如果贪婪无度，贪财滥用，则无法清白一身。《墨子·辞过》云：“节约则昌，淫佚则亡”。是否节俭，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古人云：成于勤俭败于奢。中国传统道德提倡节俭，百德俭为首。《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俭了，就会清心寡欲，就会节制自己，就会遵守道德法制。没有制约，任凭胡作乱为，人就会走向反面，从经济开始道德沦丧，政治堕落，而亡国破家相随属。刘宠的节俭是出名的。司马彪的刘宠本传中还记有一段话：刘宠任东平陵时，“是时



民俗奢泰，宠到官躬俭。训民以礼，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这就是以俭来改变奢泰之风，以礼来教民有序生活，使人知道高尚与卑下。所以俭是修身养性的重要一着。刘宠以“俭”而有了“清”，有了“廉”，而有利于国，有利于民，个人得了千古赞誉之声。《刘宠传》最后以一小事了结全文：在刘宠经常不骑马不坐车而往返于京师至家的路上，一次过驿亭想去住宿，但驿吏云：我们正在打扫干净，以接待要来的刘大人，你不能在此住宿。刘宠就无言而去，他并没责备驿吏，更没摆出自己就是刘大人的架子，连身份没有表露就走了，完全是平心静气的姿态。这对驿吏固然是一个讽刺，而就刘宠讲则是由清而廉的必然表现，是一个平等待人的问题。没有平日的修养是做不到的。《老子·三十九章》云：“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没有百姓为根本，何有高官显宦？没有坚实的地基，何有高大的房子？只有低调、谦和，以百姓为上，才能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问题。

刘宠的清廉是一贯的，是一生的品德与作风，所以才会有一钱之举，一钱太守之誉。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如此做好事。能一贯如此，成为人的品行，成为渗透于内心世界的血肉，也就是成了衡量得失的价值观、荣辱观、生死观。所以不论在何时何地，能洁身自好，廉洁自守，才能清风自来。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做人、为官的是非标准，是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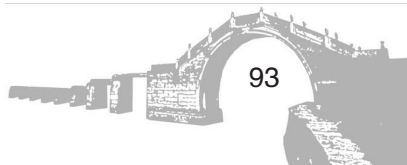
葆青春的不竭动力。

刘宠的清正廉洁就是如此！

四

行文至此，似乎还可以就刘宠的身后事说几句。

本传最后说宠“以老病卒于家”，没有交待刘宠的子嗣消息，但却写了他的弟弟：“弟方，官至山阳太守”。特别讲了其侄子即刘方之子：“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礼。兄弟齐名称”。当董卓入洛阳时，刘岱由侍中出为兖州刺史。他“虚己爱扬，为士人所附。”后来黄巾军入兖州，岱与之战，直至战死。这是一位死于皇事的人。其弟刘繇在丧乱的社会中，对南奔逃难之士人，携接收弄，人多颂之。我们在《三国志·吴志》中，可见到这位刘宠侄子《刘繇传》，那已经是东汉末年，群雄纷起，三国鼎立之时。刘繇雄据一方，与袁术征战不息。本传记他禀承刘氏家风清廉自守，刚正不阿情形。他亦以孝廉起家，为郎中，除下邑长，辟济南，为扬州刺史，最后为振武将军。他甚有谋略。十九岁时，其从父刘黠为贼所劫持当人质，他却能以智“篡取以归”，于是显名而举为孝廉。当为下邑令长时，郡守以一贵戚事托付他，他不愿以公徇私，坚持原则，宁愿弃官而去，而不屈从阿谀。后在济南郡做事。济南相系中常侍子，贪秽不循，中饱私囊，于是刘繇上奏揭发免除了他。由于他的刚直靖节，平原陶丘洪就大力推荐，举他为茂才。平原刺史说：陶公在前年荐举了刘的兄长公山，现在为什么还要荐举正礼（繇）呢？洪曰：“用公



山于前，擢正礼于后，这真是所谓御二龙于长途，骋骐驎于千里，”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刘繇很早就得到人们的赏识，纷纷荐举他为国所用。但此时汉末动乱，他又只好避乱于淮浦。汉帝知道他，下诏封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与扬州甚近，繇就不去扬州，而渡江南下，进驻曲阿。袁术派军队与之对抗，繇亦遣将隔江拒术，岁余不能下。不久，汉帝又加封繇为州牧，为振武将军。时繇有数万兵众。孙策东来，繇到豫章，驻彭泽。笮融率兵破了豫章城，杀了太守朱皓。繇与融战，初不利，后招合郡属县，终于打败笮融，融入山中，为民所杀。但不久，繇亦病亡，年四十二。可见，刘繇是汉末军阀纷争中一股强有力的汉室力量，在长江中下游与地方军阀长期征战，以自己的智谋和力量削弱了袁术等叛军。他是继刘宠之后刘氏的出色人才。可惜寿年不长，中道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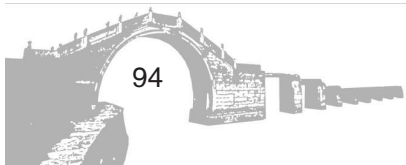
刘繇长子基，字敬与，十四岁时遭逢父亡之痛。他克尽丧礼，居家致哀。繇的旧吏送来金钱粮食，他一概谢绝，无所领受，受人们赞誉。刘基姿容美好，得孙权喜爱。当权为骠骑将军时，就提拔他为曹掾，拜辅义校尉、建中中郎将，让他随身建功立业。孙权为吴王时，就提升刘基为大司农。刘基深得孙权信任。“传”中写了两件事：一次，孙权宴请，骑都尉虞翻不慎醉酒违规，触犯朝廷。孙权欲杀他，威怒甚盛。这时，刘基就出面谏争，最后孙权终于原谅了虞翻。一次夏日大暑，孙权于船中

宴请，在船楼正欢乐之时，狂风大作，疾雨骤至，一时无以躲雨，权以冠盖遮身，又让刘基一同覆之，而其他则不得覆盖。可见孙权与刘基是如此亲密。不久权又擢基为郎中令。当公元222年，孙权称为吴大帝时，刘基为光禄勋，分平尚书事。真是位高权重，门庭显赫。基年四十九卒，孙权悲痛不已，就纳刘基之女为儿子霸之妻，四时宠赐，荣耀罕有。刘基有二弟铄、尚，都被任为骑都尉。

《三国志·吴志》为繇立传，且与太史慈，士变合传，又在妃嫔传、宗室传之前。这虽有时间先后的缘由，但亦有其重要性因素。可见，刘繇及其子刘基确系当年不可多得的人才，其祖刘宠的为国为民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传承并发扬！

刘宠仁惠爱人，一生清廉，追求高尚，拒污拒变。一钱之事，看似偶然，实出生性使然。清风所致，清白如镜。天地照之，人心举之，自身亦视之。于是清水清风，清如碧玉，长存于世。如今一亭翼然复出，屹立钱清江畔；乾隆御碑，浩然面世，昭告天下，加之一堂清辉，光照山川。这是最美的画图，最高大的建筑，是越地最秀丽的风光。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又隆重推出越剧《一钱太守》，深得广大群众好评，中央、省市首长赞许。一身正气，清音远扬是我民族精神的形象展示，也是春风化雨盛世盛举的无限动力。

刘宠的清廉风范长驻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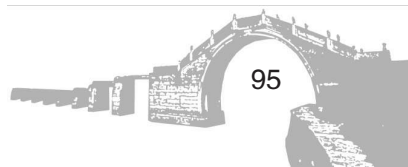


王羲之与会稽

□ 余德余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号淡斋，出生于琅琊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六岁跟随“永嘉南渡”队伍离开琅琊，于建邺（今南京市）乌衣巷居住。在父亲王旷、叔夫王廙指导下练习书法，七岁从卫夫人学书法，十二岁于父亲遗物中发现蔡邕《笔论》，秘而读之，十六岁，深为从伯父王导、王敦器重，赞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东晋太宁二年（324）出仕，“起家秘书郎”，咸和元年（326）为车骑将军，辅政大臣郗鉴选为东床，并在当年与郗璇结婚，次年出任会稽王司马昱友，为他提供了首次踏上会稽土地欣赏会稽山水之美的机会。咸和四年（329）出任临川太守，尝入深山，师法自然，研习书艺。咸和九年（334）为

庾亮看重，入其幕府为参军，不久升任长史。咸康六年（340），从伯父王导、岳父郗鉴相继去世，庾亮去世前，疏荐其出任江州刺史，不久即辞归建康。长达七年的退隐生活，王羲之游走于庐山、建康间，一边教献之习字，操劳子娶女嫁；一边潜心研习书论，提升书艺水平。永和二年（346），卫夫人之子李充走马上任会稽郡剡县县令，卫夫人也随子迁居剡县金庭。在李充为剡县令的日子里，王羲之曾前往浙东看望恩师，这是他第二次踏上会稽山水，为其后来乐为会稽内史、归老剡县金庭埋下了伏笔。永和七年（351）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在任四年，政绩显著。由于与扬州刺史王述的矛盾和疾病的困扰，于晋穆帝永和十一年（355）三月辞



职，居住于山阴县王家山，继续与谢安、许询、支遁等游历浙东山水，升平二年夫人郗璇去世，次年即携全家迁居剡县金庭，直到去世。

一、减税役，治贪官，政绩卓著

王羲之担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便有终焉之志”，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到郡务上。为了全面了解会稽郡的政务，他首先就是巡视郡县，观察了解政风民情。会稽郡辖领10县；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郟、始宁、剡、永兴、会稽。王羲之不仅跑遍了所属10县，还视察了永嘉郡所属的永宁、松阳等县。在巡视过程中，他一边听取所属各县长官的介绍，有时也深入民间听取三老的反映。通过巡视诸县发现：“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群黎，刑徒兼路，歿同秦政，惟未加惨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①百姓赋税繁重，政役繁多，且十分苛刻，已经到了不能聊生、揭竿而起的地步。为此，王羲之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以排忧解难，安抚民情，缓和紧张的局势。

1. 减免赋税，停止征役

王羲之利用手中权力，在辖区之内立即减免当年赋税，免取额外征收之税，规定缴纳的赋税也酌情减少。同时上书，托朝中诸友为民请命，向皇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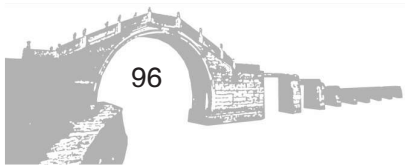
融，如给殷浩、谢尚、桓温上书，要求“增运白米，来者云必行，此无所复云。吾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然以在大臣之末，要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难？今便极言于相，并于殷、谢书，皆封示卿，勿广宣之，诸人皆谓尽当今事宜，真恐不能行耳，足下亦不可思致若言耶？人之至诚，故当有所回，不尔，坐待死之耳。”^②出自对于百姓关爱的拳拳之心，终于感动了桓温，运来了粮米，使百姓不致于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得以在原地度过灾荒。

王羲之认为：“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教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补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③东晋朝廷战争频仍，连年征发大量百姓服兵役和徭役，百姓不堪忍受，死亡叛逃，不可胜数。为了补充人员，地方官吏到处抓捕替代。有些地方甚至无法抓到替代之人，为此地方小吏害怕治罪，也跟着逃亡。按照东晋政府法律，凡是逃跑的，要殃及家人和同住之人一起治罪，为此这些家人和同住之人也跟着逃亡。百姓逃亡，政府所控制的户口日益减少，其原因也就在这里。针对此，王羲之主动地停止会稽郡内现有的各类杂役，并上书朝廷，“除其烦苛，省其赋设，与民

^①有关书札皆引自严可均辑《全晋文·王羲之》。

^②转引自徐斌著《旷古书圣——王羲之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



休息。”至于兵役，建议朝廷征调原来被判死罪而后来被减免的、或被判五年以上徒刑的人来充当：原来判死罪后被减刑的可长充兵役，被判五年以上者可充百工杂役，其家人随其迁出，以充实都邑。这样既可充实都邑人口，还可以杜绝他们走逃亡之路。

2. 开仓赈贷，禁酒节粮，惩治贪官

当时会稽郡百姓不堪沉重的赋役负担，生活艰难，不仅来自政府不合理的政策、制度，也有前任“论玄虚，怠于政务”，“此郡之弊，不谓顿至如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等人祸；也有天灾：“遂无雨候，使人叹”，“酷旱，忧重，顷快雨”。他想开仓赈贷，但决定权不在地方官，而在朝廷；上报朝廷，请求支援赈灾之粮，但当时灾荒并非一郡。“知郡荒，吾前东，周旋五千里，所在皆尔，可叹。”为此，他坚决要求朝廷同意他开仓赈贷，“行当是防民流逸，不以为利耶？此于郡为由上守郡更寻详，若不由上命而断中求绝者，此为以利，卿绝之是也。纵民所之，恐有如向者流散之患，可无善详。”认为开仓放粮是安定政局的最佳举措。由于王羲之的名望和与有关朝廷当政者的深厚关系，他们了解羲之办事公正，鲠直的秉性，加上上书请求理由充足，所以对他的施政做法大多默认，“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王羲之也感到欣慰，“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会稽之民也有幸赶上有王羲之这样的郡守，因此在灾害之年都能得到及时的救助，他们也乐于固守此

土。而对于当政者而言，也制止了流民的发生，稳定了会稽郡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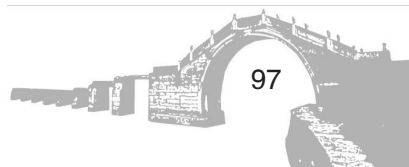
为了安定人心，进一步解决百姓灾后的吃饭问题，王羲之针对当时盛行的酒风，大胆地决定“禁酒”，希望通过遏制造酒，节约有限的粮食，以备饥荒，让百姓能得到更多的粮米充饥，防止流亡。然而，花天酒地，纵情享乐已成为官员豪富之家的生活习惯，朝廷迟迟不下禁酒令，为此，王羲之自得行使力所能及的权力，在本郡禁酒。他知道禁酒的关键是各级官吏的率先垂范，于是邀请本郡同僚，竭力呼吁：“断酒事终不见许，然守之尚坚，弟亦当思同此怀。此郡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在其倡导和垂范下，会稽郡的禁酒坚持了一年有余。

王羲之知道，减免赋税，停止征役之措施是从政策上为民减负，而开仓赈贷、禁酒则是救灾的临时措施。要想使百姓安定，还要解决施政过程中的贪官奸吏对百姓的盘剥问题。他在巡视各县时，发现监守自盗官府粮库的现象相当普遍，“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①仅余姚县负责管理官府粮库的官员竟已偷盗官米近10万斛。为此，王羲之及时地向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建议：“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果断地处置了一批贪婪成性的“硕鼠”，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整饬了粮库。

3. 关心时政，谋划国是

王羲之身任会稽内史，关心会稽百

^① 《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



姓安居乐业之外，还十分关注朝廷的大局。其时，北魏政权内部一度分崩离析，使得东晋朝廷再次掀起北伐的声浪，而掌握兵权的殷浩与桓温又互相对立、各行其是。王羲之赞成统一，但认为北伐的时机还不成熟。他曾多次写信殷浩和桓温，分别化解矛盾，但事与愿违。《晋书·王羲之传》云：“殷浩原与桓温不协，王逸少移书苦谏，欲画廉、蔺于屏风。又曲止北伐，皆不见听，果败于姚襄。”由于殷浩本人非军事帅才，加上北伐动机不纯，仓促出战，结果导致惨败，被废为庶民。王羲之只能无奈地“令人怅叹无已”。

王羲之还针对朝廷繁琐的政务提出批评，他写信谢尚说：上级衙门滥发公文，许多公文互相矛盾，使得下级疲于奔命，无所适从。“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他认为安定的长江东南地区，扬州这么大的地方，只要派一位能干的朝廷命官便可行使治理之职，而官吏越多，政出多门，反而治理不好。大胆提出简化政务，缩减官员的改革思想。

二、山水交游与兰亭修禊

东晋的会稽郡地处东南，依山傍海，郁郁葱葱的会稽山脉绵延于永兴、山阴、诸暨、上虞、剡县、余姚、始宁等县，南连天台山，北与宁绍平原相接，特别是境内鉴湖工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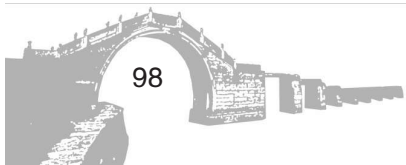
开发，形成了一块面积达206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泊，万顷碧波如镜，峰峦叠翠的山色与之相互映衬，遂使会稽郡赢得“山水之国”的美誉。东晋吴人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①王献之亦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②以右军将军的头衔出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素有山水之好，定居会稽正是适得其所。《晋书·王羲之传》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王羲之以其右军将军的爵位、会稽内史的官职，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在与东晋统治集团交往中形成的威望和品格，加之其突出的书艺和诗文修养，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其为首的会稽名士文人集团。他们有共同的山水爱好，也有共同的儒、释、道探讨主题，或聚会切磋，或书信研讨，无论是王羲之在位，或者是退隐之后，皆交往密切，共同为东晋文化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王羲之交游中来往频繁，用情最笃的莫过于谢安兄弟。虽然王羲之比谢安大17岁，但并不妨碍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谢氏居上虞东山，上虞距会稽城只有五、六十里，往来十分方便。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后，经常至东山看望在此隐

^①《晋书·顾恺之传》。

^②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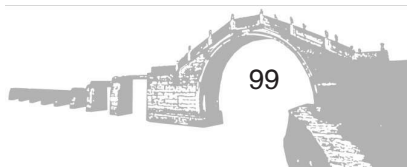


居的谢安，并直率地与谢安议论时事：“安弟寓居东山，纵情山水，教训子侄，遂使身遭禁锢，此是何苦呢？你岂不知桓温坐镇武昌，自养其大，数次兴师北伐，意在要挟朝廷，扩大自己势力与影响，若是再无人加以控制，无需多久，东晋之祚，必属桓氏无疑。”希望谢安赶快出山，为国效力。而谢安却说：“逸少之苦心，我当铭记五内。桓温首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灞上，百姓感泣，老幼出门抚慰军士，与此前庾冰、庾亮、褚裒、殷浩率军北伐相比，可谓大获成功。然而桓温却没有乘胜而进，临灞水而收兵，可见桓温北伐，其意不在于收复中原失地，而在于扩大自己的声威，覬覦江左。就眼前而言，作为晋室屏障的豫、扬、荆、徐四州，尚不在其控制之下，特别是作为京城门户的豫州乃由我堂兄谢尚镇守着，桓温就难以插手朝廷，他对我们谢家也必然另眼相看。我若在此时出任，不是给桓温把柄吗？”王羲之听完谢安的话后，十分佩服谢安虽隐居山林，却对世事洞若观火，了然于胸的分析和判断。自此他们来往更加频繁，王羲之将郗昙、庾友、桓伟、袁峤及自己的儿子王凝之一一引见介绍与谢安，谢安也将支遁、许询、孙绰等名士引荐与王羲之。《晋书·谢安传》云：“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谢安也经常到王羲之任所，羲之倾其所有待之。有一次谢安想要几页笺纸，羲之竟敞开库门，悉数送与。“王右军为会稽，谢公乞纸，库中唯有

九万枚，悉与之。”^①有次谢安爽约，羲之便如坐针毡，“一日不暂展，至恨叱而不可已，便怀不果东至，可恨。思叙，思闲暇必顾也。”王羲之退隐以后，谢安尚未出仕，两人来往更多。《世说新语·雅量》载：“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太傅神色方王，吟啸不言。”历来以此说明谢安遇险的气度，而此时的王羲之却已度入老迈之年，自然不能与壮年气盛的谢安相比。王羲之十分关心谢安出仕问题，“安石已南迁，其诸兄弟此改殊命萧索。”升平四年(360)谢安“东山再起”，接受了桓温的征召，王羲之深感欣慰。谢安出仕后，仍与王羲之保持联系，书信来往不断，还抽出时间，赴金庭探望，“安石停此过半日，犹得一宿，送近道，所以致叹，何物喻之？一十当浦阳，诸怀儿不可言！且不复行脚送，有绪叹，今此贪上道。”

许询也是王羲之交往最密切的朋友之一。《建康实录》卷八载：“询字玄都，高阳人。……迁会稽内史，固家于山阴。……中宗闻而征为议郎，辞不受职。遂托迹，居永兴。……既而移皋屯之岩，常与沙门支遁及谢安石、王羲之往来。至今皋屯呼为许玄都岩也。”《世说新语·栖逸》又云：“许椽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王羲之常与许询，支道林共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论属文。”许询还擅长玄言诗，晋简文帝尝称“玄都五言诗，可谓妙绝时

^①裴启《语林》，《太平御览》卷650。



人。”^①王羲之与许洵诗文酬唱也要费尽脑筋。有一次苦寻不得句，又正逢身体不好，犯了癩病，竟于病中得二十字：“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②后来许洵病重，发生水肿现象，王羲之很是耽心，多次去信问候，“玄都忽肿，至可忧虑。得其昨书云小差，然疾候自恐难邪！”王羲之凭着经验，一个人生病一旦发生水肿现象，也就预示其病已经十分严重，离死亡已经不远了。不久，许洵果然病逝，王羲之深感震惊和悲痛，身体不适，只得让家人去吊丧。

孙绰也是东晋卓越的文学家，文名盖世，“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③但因为孙绰门第出身不高，经常受到门第较高世族的欺负，而王羲之却对他没有这种成见。会稽内史上任伊始，他就选中了孙绰担任府中长史，并让其弟孙统担任余姚县令。孙绰年轻时就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在会稽郡中有广泛的人际关系。孙绰“博学善属文，少与高阳许洵俱有高尚之志。……绰与洵一时名流，或爱洵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洵。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答曰：‘高情远志，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④兰亭修禊的后序就是由孙绰执笔的。孙绰帮助王羲之结识了道教与佛教的两大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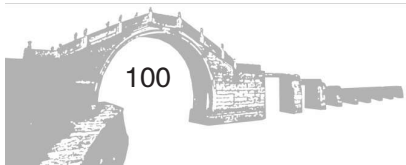
支遁，字道林，初出家吴郡，后出游至会稽剡县，又到石城山立栖光寺，山阴县建鸞台教寺。《世说新语·文学》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隼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支遁认为西晋向秀、郭象提出的“饥者一饱，渴者一盈”的自适满足算不上逍遥，只有“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遽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不速，则逍遥靡不适”的至人才是真正的逍遥。自足并非逍遥，至足之境才是真正的逍遥。这一观点迎合了东晋士族自感身份高贵，与寒门有别之心态，马上得到了士人的支持。“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所不得。后遂用支理。”^⑤使得王羲之由“轻视”，转为“被襟解带，流连不已”，对支遁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世说新语·文学》又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拊舞。”

①《世说新语·文学》。

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注引，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④《晋书·孙绰传》。

⑤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9年版。



可见清淡之风在当时人们心中的位置。支道林擅长草书、隶书，有养马、养鹅之习，很合王羲之胃口。王羲之曾多次带领徽之、操之、献之去见支遁，有意识让孩子观览寺中所藏经文墨迹和匾额、柱联，培养他们鉴赏书法的能力。

许迈，一名映，后改名玄，字叔玄，丹杨句容人。道士。《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弋钓为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当卒以乐死’。”王羲之晚年服食修道与许迈有密切的关系。《晋书·王羲之传》附有许迈小传，其中云：“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玄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之传，述灵芝之迹甚多，不可详记。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王羲之诸子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皆受家传的影响，都是道教信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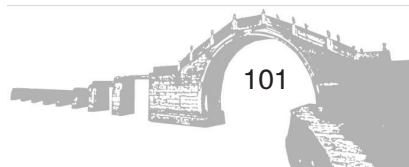
阮裕，字思旷，陈留尉氏人。晋成帝咸和年间除尚书郎，后去职还家，以疾筑室会稽剡县。阮裕年长于王羲之，羲之与阮裕交往中，表现的相当尊敬，《世说新语·栖逸》载曰：“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王右军与谢

公（安）诣阮公，至门语谢：“故当推主人。”谢曰：“推人正自难。”阮裕也十分推重王羲之，《世说新语·赏誉》曰：“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王应）长豫（王悦）’。”

王羲之、谢安等会稽名士集团在玄学和会稽佳山水双重影响下，从自觉追求“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玄谈心境陶冶，到转向与山水和谐共处，在山水中体悟“道”的含义，寻求心灵的宁静。永和九年上巳节于兰亭修禊活动，便是他们“以玄对山水”，“即以超越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态，进入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由相化而相忘”^①的一次实践。

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暮春之初，面对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曲觞流水”的山水环境，他们“娱目骋怀”，“畅叙幽情”。与会者四十二人中，多数为常居会稽郡人士，其中有王羲之及郡下属官十四人，如孙绰、孙统皆为会稽属员，王羲之儿子六人；谢安、谢万家住上虞东山；也有来自京城的王羲之内弟郗县，庾家代表庾友、庾蕴，当代泉雄桓温之子桓伟等。将三月上巳节的被禊习俗与曲水流觞结合只是活动的形式，而将“玄言”与山水自然结合才是活动的主旨。纵观二十六人写的三十七首《兰亭修禊诗》的主题，仍是人与山水自然的和谐相处。山水自然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可以给人消泯烦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东学出版社2001年版。



恼；山水自然没有偏爱，人人都可以享受：“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人们在与山水的自然亲近过程可以获得有益的体悟：“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山水自然的聚合和离散的变化与人的生命长短，原本于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人的快乐生活是短暂的，但人们创造的有价值的生活却可以遗泽后世；“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人们有益的活动和言论却可以不朽，传之永远。“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①在这里，山水自然不仅是“娱目欢心”对象，而且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激发思维和灵感的源泉，也是文人墨客观畅其中，并与之对话，与之交融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人也是山水自然的一个因子，人在其中领悟了生存的真谛。兰亭修禊之诗，就是修禊者在山水中悟道之作，由寓目山水而进入对人生玄理的思索。它使山水自然逐渐走入文学视野，并开始成为被观照的独立对象，从而为以后真正意义的山水诗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王羲之为兰亭修禊诗写的序文，即景抒情，从头至尾，紧扣自然天道的主线，流淌着对自我意识、生命价值的思索与追求，立意高远。前半部分感情明朗、快乐：暮春气象，兰亭

美景，高朋云集，饮酒赋诗；后半部分转为感叹：忧国之心的自然流露，将山水自然与人生玄理两者水乳交融在一起，从而将山水引入文学视野，这也是《兰亭序》在文学上的魅力吧！《兰亭序》作为文章固然美好，而比文章更为神奇，影响更大的还是其书法艺术，被后世书家称为“天下第一行书”。“他的创意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引草入行”，以求字形而流利，摆脱隶意，为后世称道；其二为“谋篇布局”，让书法更具画意，开创了书法的大格局，使书画熔为一炉。”^②这也是原本的“兰亭诗会”逐渐衍变为“兰亭书会”的原因吧！

三、归隐东土，魂系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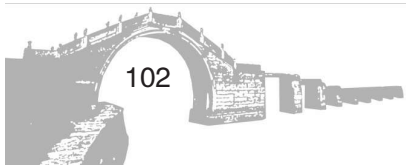
由于和前任会稽内史王述的矛盾，因为两人秉持的思想和性格的不同，不仅未能消解，反而由于王述守制期满升为扬州刺史，担任了会稽内史，这样王羲之就成为他的下属，加剧了这一矛盾：王述利用职权，“检查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促成了本来就官欲淡薄的王羲之“浮耻之，遂称病去郡”^③的决定。在此之前，王羲之已经将父母、兄长的故茔迁到了山阴。他在父母墓前宣读了辞官的《自誓文》，朝廷也批准了他的要求。

卸任后的王羲之过上了一生中都在向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

①王羲之《兰亭集序》。

②转引自徐斌著《旷古书圣——王羲之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



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①

在王羲之传世的书札中，有许多文字涉及到当年他与谢安等人常在会稽、东山一带登山临水，放浪形骸的记录：如“向与谢生书，说欲往，知登停山。”“王逸少顿首谢。七日登秦望，可俱行。”“昨若耶观望，乃苦與上隐痛，前后未有此也。”谢万废官以后，也居住在会稽郡中，王羲之常与他书信往返，在给他的书信中：“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去当去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尽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供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觉得全身而退，忘怀世虑，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

王羲之受到道士许迈的影响，修道服食丹药，在著名的《十七贴》及其他传世诗文中，王羲之多次谈到服散养生的情形。如“得散力，疾重而迎，进退甚令人忧念。”“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其实，服用寒食散等丹药并没有给他带来所期望的健康，相反使他的身体陷入长期难以治愈的痛苦病状。“吾下势腹痛小差，须用女萎丸，得应甚速也。”“得告，知中冷不解，更壮之显，甚耿耿。”“仆脚中不堪沉阴，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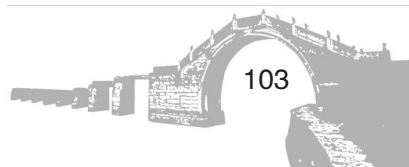
之。”^②腹痛，中冷，脚部发肿，皆是服食导致的典型症状，可见王羲之染病不轻。

王羲之归隐后，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关心朝廷时政。永和十二年（356）五月，姚襄从许昌北上进犯洛阳，王羲之心悬前线，写信桓温：“贼势可见，此云方轨，万万如志，但守之，尚足令智者劳心，此回书恒怀汤火，处世不易，岂惟公道。”为前方战争担忧着急。八月，得知桓温告捷，故都克服。王羲之大为振奋，《破羌帖》云：“桓公威勋，当求之于古，令人叹息！”赞赏桓温功绩。另一方面，王羲之对于桓温的野心早已察觉，对于势力和权力日益膨胀的桓温又非常担忧。当得知可以制衡桓温势力的谢尚病死的消息，王羲之十分震惊和悲痛。得知谢万担任豫州刺史，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的消息，又深为忧虑，因为谢万并非治边理乱的军事人才，他多方写信，却无济于事。后来谢万的失败，废为庶民，证明了王羲之的远见卓识。他更热切盼望谢安能早日出山，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谢安终于于升平四年（360）出山了，担任桓温手下的征西司马。这使王羲之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劝说谢安出山，谢安向他说的一番话，他彻底地放心了。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终生研磨，退居以后，他的书法艺术才真正达到了高峰，因为晚年安逸闲适的生活环境，使

①《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②《六艺之一录》卷149。



他才有高雅飘逸的心境来对待书法艺术。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的最大成就就在行书和草书方面，《兰亭集序》、《姨母帖》、《快雪时晴帖》等著名墨迹都是行书，而《十七帖》则是草书艺术的巅峰之作。晚年的作品，“章草”成分渐少，“今草”意蕴日浓。传世较为可靠的王羲之书迹，几乎全部是写给朋友的尺牍。今传《十七帖》的草书精妙之处在于结体稳健，章法生动，收放得宜，变化从心，浑圆筋劲，侧峰取势，重按轻转，意蕴深长。

王羲之晚年非常重视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除了精心传授小儿子献之以外，他还精心选择了另一位传人——王修，将他当儿子看待，将收藏的书帖尽数给其观摩，并且破了秘法不外传的老规矩，将自己精心书写的《东方朔画赞》作为法帖授于王修。他还接收了好几位入门不入室的弟子，精心传授，使王氏书艺得以传承。

四、翰墨传承，遗响千年

王羲之于升平三年（359）将山阴戴山的故居留给了王凝之，自己带领家人迁居剡县金庭。由于服食导致健康恶化，加之亲人妻子郗璇和孙女病逝的悲痛，加重了病情。升平五年年末，旷代书圣溘然去世，墓葬于剡县金庭瀑布山下。

王羲之生有七子一女，都得到了书法艺术的传承，人人能文善书，尤其是幼子献之继承乃父衣钵，又有创新，并

称“二王”。王献之以后至隋二百余年间，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四位环环接力，均与王家血脉相连。唐初由于唐太宗的钟情，书圣地位的确立，“二王”书艺得到了空前的张扬，但也使“二王”真迹散失殆尽。宋代以后的历代书法家皆皈依王羲之。元代赵孟頫云：“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①明代董其昌也云：“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如法则，所以为神品也。”但延续其风貌神韵的大多是唐代高手的摹临本和唐宋以后的摹刻本，真伪之考伴随着其后的名家和学者，但定格的王羲之的字形、体势的“法度”，却成为后世名家、巨子心仪，顶礼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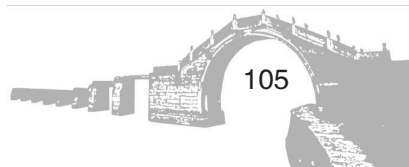
王羲之作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和千古书圣，其影响力渗透于多方面，其在会稽郡中留下的活动遗迹与民间传说不仅留存于历代志书当中，也活跃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有的墨迹还得到历代保护，发扬光大至今。《嘉泰会稽志》卷三“内史”条，卷十四“人物”，卷十六“翰墨”，皆对王羲之生平作了介绍，又在卷七“寺院”：戒珠寺；卷十“池”下列右军池、兰亭古池、王右军墨池、右军鹅池；亭：兰亭、王子敬山亭。卷十二“桥梁”：题扇桥、躲婆弄、笔飞弄；卷十三“古第宅”：王右军宅、王中令宅等有关遗迹及传说，皆一一作了详尽介绍。又在卷二十“诗

^①（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六艺之一录》卷280。



文”，专门收录《上巳日会兰亭曲水诗并序》。其后的万历《绍兴府志》卷九“兰亭修褉图、重修兰亭图”不仅有详尽的文字介绍，而且还绘有图示；卷十“宅”条下：录有“嵯王右军宅在金庭山”，“别业”条下云：“府城内王右军别业，今戒珠寺也，山阴地。”卷三十九“寓贤”，“方技”条皆有王羲之的有关介绍。康熙年间三修的《绍兴府志》也承万历《绍兴府志》体例，也一一作了介绍。乾隆《绍兴府志》针对以前诸志将王羲之引入“寓贤”、“方技”专讲山水之游，而“反没其政绩，殊非允协，录其为内史时事，列之名宦”，并专门在卷四十一“名宦”条下记录了其减免税役，上疏争之，东土饥荒，开仓赈贷，惩治贪官，关心国事等政绩。又于卷六三“寓贤”仍保留了前志的有关内容。清康熙仁和王复礼曾纂《兰亭志》一卷，乾隆间嘉兴吴增高辑《兰亭志》四卷，皆存。兰亭，原为汉时邮亭，由于王羲之在此修褉游宴，以

后就成为历代书法家的朝圣之地，作为胜迹的兰亭，因而得到了历代政府和文人的重视，不断得到重修；也因为鉴湖的湮废，兰亭的原址不断迁徙，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绍兴知府沈启在北宋时代的天章寺以北择地重建，才固定下来。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皇帝手谕，康熙御书《兰亭序》刻石和“兰亭”两字悬在亭上，地方重加修葺；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亲自登临兰亭，并写了诗。新中国成立后，又几经修葺，终成今日规模。如今，兰亭已成为书圣之地，每年三月上巳节为“兰亭书法节”，政府官员和书法家在此研讨书艺，研墨展翰，进行纪念活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西侧，还兴建了兰亭书法博物馆，二十一世纪初还创办了兰亭书法学院，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王羲之当年书写《兰亭序》用过的乌丝兰茧纸和为买扇老妪书写扇面和爱鹅等传说，如今也与经济挂上钩，刻藤纸，越扇、越鹅成为旅游商品。



张岱与项里

□ 闻 雁

张岱（1597~1679），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山阴人。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三不朽图赞》、《夜航船》、《快园道古》、《石匱书》等文学和史学作品，是后世公认的明末清初杰出的文学家之一。

张岱出身仕宦之家，高祖天复，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家庭又是书香门第，先辈均是饱学之儒，精通史学、经

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天复、元汴父子曾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志》及《山阴志》，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咸有著述。天复有《鸣玉堂稿》，元汴有《不二斋稿》，汝霖有《石介园文集》。

张岱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明中叶以后，宦官擅权，奸臣当道，特务横行，党争酷烈，内忧外患，愈演愈烈。贤能忠直，或被贬逐，或遭刑戮。与此同时，思想界涌现了一股反理学、叛礼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公开标榜利欲为人之本性，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性，主张童心本真，率性而行。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文人士

子在对社会黑暗绝望之余，纷纷追求个性解放，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他们一方面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文房四宝、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戏曲杂耍、博弈游冶之中，获得生活的意趣和艺术的诗情；另一方面在反叛名教礼法的旗下，放浪形骸，纵情于感官声色之好，穷奢极欲。在张氏祖孙的交游中，不乏这样的文人名士，如徐渭、黄汝亨、陈继儒、陶望龄、王思任、陈章侯、祁彪佳兄弟等。正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社会思潮、人文氛围，造就了张岱的纨绔习气和名士风度，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坦陈：“少为纨绔子弟，极爱奢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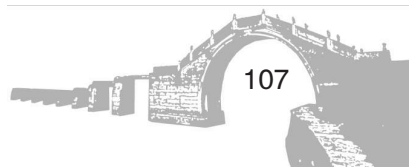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结束了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不久，清军大举入关，占领北京，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新的统治者。年届知天命的张岱经历了天老地荒的巨变：社稷倾覆，满清入主，民生涂炭，家道破败。

清军攻占北京后，继续南下，但遭到江南军民的顽强抵抗。浙东之士拥立在台州的明朝宗室郡王鲁肃王朱以海监国绍兴。张岱之父张耀芳曾于天启七年（1627）至崇祯四年（1631）九月担任鲁肃王右长史，张氏又是绍兴的巨族，因此朱以海监国绍兴后，立即幸临张

家。张岱后来也被任命为兵部职方主事，参与反清复明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很快以失败告终。1646年闰六月，绍兴沦陷，清军四处追捕支持鲁王监国的力量，张岱被迫避兵逃难。他随带一子一奴和一麓书籍，先后逃往越王铮、嵊县西北山中，最后在离绍兴城三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项里安顿下来。

项里，是一个僻静幽美的小山村，相传为当年项羽避难隐匿之地。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勿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项羽在山阴的传说，东汉六朝人的文字中未有记载，南宋陆游《陆放翁全集》中却有不少诗写到项里和项王庙，如《项王祠》、《项王庙》等，其中有“筑祠不知始何代，典祀千载谁敢删”之句。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在特定的时刻引起了张岱感情上强烈的共鸣。

张岱隐居在项里“琅嬛福地”。“琅嬛福地”，原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洞府，出于元代伊士珍《琅嬛记》。现实中的“琅嬛福地”是一座两层的门楼，第一层楼门上挂有“琅嬛福地”匾额，第二层有座小楼，站在上面可以遥望香炉峰和敬亭山。张岱在“琅嬛福地”附近建房三间，房屋背靠鸡头山，面朝项里江。堂前种植娑罗二株，可借其清荫遮住夏日的阳光；屋旁岸边广植柳树，显得格外幽静，是读书写作的理想所在。沿山的北面，村民的瓦房草舍、古老的大树、清澈的溪涧、翠绿的竹丛蜿蜒伸展，非常适合隐居生活。张岱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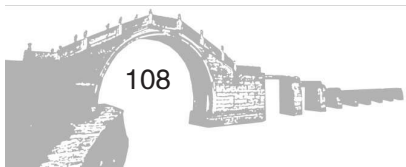
次到项里避难居住为清顺治四年（1647）七月，他在此地一边编修著名的史学著作《石匱书》，一边与外界联系，继续关注抗清复明的事业。写于1647年的《孝陵磨剑歌》一诗小注云：“丁亥七月十六项里记梦”，诗作形象地记录了张岱当时立志抗清复明的豪情。在项里住了两年多，顺治六年（1649）九月，在几位老友及家人的撺掇下，张岱搬回城里。

康熙四年（1665），张岱又在项里鸡头山营建了生圻，对自己的“百年之后”作了安排。生圻建在与住屋相向的鸡头山另一端，左边有一块面积约一亩左右的空地，张岱在上面搭建了一座草堂，里面布置着佛龛，挂着张岱画像，由一位和尚管理供奉事宜。周围高地种植很多水果树，有杨梅、橘子、梨、枣等。康熙十三年（1674），张岱年近八十，带着两个儿子和老伴移居项里。张岱在“琅嬛福地”定居后，继续从事著述、考订，同时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苦日子。他很少与人交往，因此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晚年生活的情况。他自己更名“石公”、“蝶庵”，又号“六休居士”，在寂寞的晚年，着手编写了《于越三不朽图赞》和《琯朗乞巧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

的文化遗产。

《于越三不朽图赞》共收人物109人，分为立德、立功、立言三门，三门中又各有子目。《于越三不朽图赞》在人物选取上一改过去仅以帝王将相、高官显爵者入史的传统，收录了众多位卑不为人所重者。如嘉靖年间智歼倭寇，以一人之性命“活千万人之性命”的山阴雇工姚长子；还有只存姓氏不闻名字，为救父兄“坐辟”之罪的孝女曹娥等。张岱侧重表现了人物的忠义节气和人性的高贵亮色。《琯朗乞巧录》一书没有出版，稿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该书分类辑录了古今智慧人士的诸多隽言妙语。

张岱后半生处在朝代更迭，社会急剧动荡的生活环境中，但他依然坚持修史著述。他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撰成《石匱书》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的明史煌煌巨著，后又续撰成《后集》以纪传体补记明崇祯及南明朝史事。他的小品文则以清淡天真之笔，写国破家亡之痛，寓情于景，意趣深远，在晚明散文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在颠沛流离中，张岱与项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在那里避难留居，最后选择在那里定居终老，项里，也因此成了张岱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



近代科学教育先驱杜亚泉

□ 黄 斌



生平及思想述略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绍兴府会稽县伦塘乡人。青少年时勤于举业，甲午战败后，萌发爱国忧患意识，渐生“讲求实学”以“济世救民”的抱负，毅然绝意仕途，开始广泛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并自学日语以了解国外科学发展状况。尝言：“甲午之秋，中日战耗传至内地，予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蹙然忧之。时方秋试将竣，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汨人心性，而

科举之误人身世也。”^①嗣后，以经史训诂之学为无裨实用之学，日夜研习李善兰、华蘅芳之书，由中法而西法，研习代数，并翻然改志购译书读之，得制造局所译化学若干种而倾心焉，以谓天下万物之原理在是矣。

当时，国人探索救国之道，或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或力求对国家政体实行西方式的变革。杜亚泉将两者作了比较，认为科学技术乃国富民强之本，与其进行无益的政治斗争，不如发展科技，从事实业。他说：“但政治与艺术（即科学技术）之关系，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

^①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是，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①

民国成立后不久，国内出现“党人争权”、“武人干政”的假共和政局，杜亚泉更是体会到实现民主政治的艰难，于是把中国的前途寄望于新阶级的生成。他预言，随着中国科技和经济的进步，社会将产生一个有力的新阶级——“科学的劳动家”，即“有科学的素养而任劳动之业务者”^②。他认为只要“此等科学的劳动家，以社会上之需要，日增月盛。国家社会间一切机关、职业，悉落于劳动家之手。故其时民众，已非曩时蒙胧无意之状态。除少数坐食之富人及若干无业之贫民外，皆为此有学识而任业务之人。此时以运动选举、诱致多数为能事之政党，无复可施之伎俩，不得不退而听若辈之命令。即平时戴鬼面以威吓人民之武人，其所持之快枪巨炮，彼等既不为之制造，亦不为之使用，则亦嗒然若丧，无复维持之策。其形式的军队，乃不得不撤除；其演剧的战斗，乃不得不停止。于是国家的民主主义，一变而为世界的社会主义。此时情状，固非吾人所能预料。惟知此时无所谓军队，亦无所谓政治”，^③此时

就可以实现政治民主、社会发达、国家昌盛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杜亚泉对科学技术及西方现代文明作了审慎反思，纠正以往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偏颇观点，但并未改变倡导科学的立场，始终坚信发展科技是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

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近代国人关注的共同主题，但采取的途径各不相同，有的主张转化（革命），有的主张调适（改革），很显然，杜亚泉属于后者。他认为走温和、渐进的调适路线，既可维持社会的秩序与保持稳定，又可促进固有文化的革新。他深谙“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④的古谚，因而坚信科学教育是最稳妥的调适方法，并将一生不辞劳瘁于此。

1898年，杜亚泉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期间自学理、化、动、植、矿物诸科及日文，遍读上海制造局傅徐二氏所译理化诸书，无师而能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并购置仪器，躬自实验。与学堂同事共研日文文法，未久亦能直译日籍而无阻。由阅读日文书刊而窥见世界新思潮，对中国传统学说不免渐生怀疑。据蔡元培（时任中西学堂监督）回忆：“先生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而讨寻哲理针砭社会之热诚，激不可遏。平时各有任务，恒于午膳晚餐时为对于各种问题之讨论。是时教职员与学生同一膳

①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③（杜亚泉著）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邵汉明、刘辉、王永平著《儒家哲学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厅，每一桌，恒指定学生六人教职员一人；其余教职员，则集合于中间之一桌，先生与余皆在焉。每提出一问题，先生与余往往偏于革新方面。”^①1900年，他转赴上海，办亚泉学馆，培养科技人才。亚泉学馆被称为中国“私立大学的滥觞”^②，1901年改名为普通学书室，编译发行科学书籍和语文史地等教科书。1902年夏，浙江南浔浔溪公学发生学潮，他应庞清臣之邀任校长，在开学演说时对学生提出殷切希望：“诸同学在校或他日离校之责任，第一当研究科学以补东洋文明之不足，第二研究固有之文明，与西洋之文明包含而化合之，……以为东洋之特色……”^③

翌年，杜亚泉返绍兴，与宗加弥、王子余、寿孝天等人在能仁寺创办越郡公学，任理化博物教员，后因款绌停办。1905年，他兼任蔡元培爱国女学义务理科教员；次年秋，赴日考察教育，购日文书籍数十种归；1911年，被推为绍兴旅沪同乡会公学校董。1924年，他在上海创办新中华学院，培养科学、实业人才，鼓励学生毕业后赴农村，从事教育及农村合作事业，后因经费不敷而中止。“一·二八”事变后，杜亚泉回到家乡，隔周进城为稽山中学义务讲授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等。

杜亚泉在倡导科学教育的过程中，

针对国人重事实轻原理、重应用轻研究的实用主义心态，十分强调科学研究和科学理性精神。他认为，“人类之对于自然界，能尽其利用之道者，皆由研究而来。研究愈精，则利用亦愈大。……吾人之思想，苟不实验之于自然界，则往往陷于谬误而生迷信。……犹苟能实地考求，则谬妄可以立破，障害除而神智自显矣。况吾人之耳目聪明，以练磨而益进”。^④为此，杜亚泉一直很重视科学实验及仪器设备建设。他在自学理化时，常购置仪器，躬自实验，曾因化学实验被玻璃炸伤面部。办亚泉学馆时，他常向学生分赠科学实验仪器，如化学实验所用的精致小天秤及铜码、测量用的皮带尺和酒准等。主持浔溪公学时，他劝校董以六千金购买东西图书和仪器标本，于校中设图书馆和仪器馆，并备置印刷器具。商务印书馆在他的倡议下，开办过标本仪器传习班，招收学徒，授以技术，培养自制仪器、标本、模型的人才。他还资助亲友开办制造墨水、理化仪器等教学用品的作坊。

为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观念，杜亚泉提出普及科学常识为急务，而方法以教育为最佳，且不能只局限于学校教育。他说：“夫教育云者，非限于学校教育已也，宜兼及于社会教育；且非指

①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1931~1934《书杜亚泉先生遗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丁石孙等著，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浔溪公学开校之演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杜亚泉、杜就田述《博物学初步讲义》，编者自刊。



高等教育而言也,宜注重于普通教育。”^①他把影响、教育人们的媒介称为“便利社会间心理之交通”,主张“以便利社会间心理之交通(如学会、讲演会、宣讲社、书籍、报章、杂志等,皆为心理交通之机会),促进社会之普遍化,使社会中各个人之心理,渐渐融洽”。^②他一生致力于编写科学用书和创办期刊,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己任,开创了我国现代科学教育的多项之先。

编辑教科书, 实践科学教育

20世纪初,在新式教育兴起的同时,学校急需各种新式教科书。怀抱“科学救国”之志的杜亚泉积极参与其事,特别是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长达二十八年的编译工作中,编辑了大量以自然科学为主的教科书。

1904年秋,应旧友张元济、夏粹芳之邀赴沪,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并将营业疲顿之普通学书室举而并入商务,自此在馆服务历二十八年之久。时正值商务馆发展时期,编译所由张元济任所长,高梦旦、邝富灼分别任国文部和英文部主任。入商务后,杜亚泉协助张元济组织编译人才,拟订出版计划,置备图书资料,编译所由此渐具基础。此后治学益广,除研究理化博物外,还致力于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伦理、音韵、医学等研究。其时

商务出版之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自然科学、博物等方面的教科书,大都出于其手。据王云五(后任商务总经理)述,杜氏“三四十年来编著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百数十种”^③。

二十八年中,杜亚泉编译了《动物学精义(第三卷)》、《盖氏对数表》、《中学植物学教科书》等,编写《化学工艺宝鉴》、《有机化学》、《下等植物分类学》、《共和国教科书矿物学》、《博物学初步讲义》、《高等植物分类学》等,校订《最新中学教科书用器画:平面几何画》(下卷)、《人生动物学》、《新法理科教科书》(春、秋季各六册)等,涵盖众多学科,内容丰富翔实,编排条理清晰。他与人合编的《共和国教科书生理学》,绪论和结尾概述人身构造及个人卫生、公众卫生,其余各篇分别为消化、循环、呼吸、排泄、神经、骨骼、筋肉、皮肤和五官,每篇又各分3章为解剖、生理、卫生,每章之中又有分节,还把内容概要列表便于通览,重难点配有相关插图,术语名称下多附记英文。他编写的《化学工艺宝鉴》,讲述合金、金属着色法、镀金术、冶金法、玻璃、带色玻璃、水玻璃、珐琅、人造宝石、陶器用着色料、火药及爆裂剂、烟火、火柴、色料、涂油、假漆、洋墨水、接合剂、漂白法、工场用水及饮用水、纤维精练及漂白法、染色法、洗涤及拔除污点法、

①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论中国之社会心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②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精神救国论(续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王云五《小学自然科词书》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防腐及贮藏法、烟草、糖浆类、肥皂、化妆品类、毒品及解毒药、试药制法等，附录米突长度表、克兰姆衡量表、立脱尔容易表、英镑衡量表、英国液量表。

杜亚泉治学严谨，编写态度认真，他所编教科书很多是“学部或教育部审定”之书，为中小学广泛采用，如小学《最新格致教科书》（3册）、《最新笔算教科书》（6册），曾风行一时；《盖氏对数表》1904年4月初版，1917年修订11版，1930年修订26版，1951年再版，影响之大，可以想象。

杜亚泉具有当时知识分子少有的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在编写人文哲学教科书时，也不忘把自然科学知识恰当地融入进去。他所编的《绘图文学初阶》是我国最早的新式国文教材之一，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在1902年出版，共分6册，供三年制初小使用。第3册以后的课文中蕴含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卫生等浅近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现了他主张对儿童从小进行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教育的观念，极有特色。这套书虽因不合稍后颁定的四年蒙学制而渐被停用，但对后来国文教材的编写起到了示范作用。高级中学教科书《人生哲学》是杜亚泉晚年精力所萃之作，由他在中学演讲的讲稿扩充而成，是以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为基础，以伦理学为落脚，以人生发展为中心，试图帮助学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科学的

人生观。他在《人生哲学编辑大意》中写道：“就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科学中，搜辑其新颖警切的理论，每周为学生讲述一次。……是书即撷取上述各科学的精义，而以人生的发展为中心，把此等科学，联成一片，使青年学生，于万有科学中，得约略窥见其根柢。”^①

该书没有“科学派”与“玄学派”对科学、人生观各执一端的偏执，而由自然科学谈及人文科学，整合中西哲学伦理学学说，出版后颇受学术界推崇。蔡元培曾说：“中学教科之人生哲学，本为旧日伦理学教科之改名，旧日伦理学中，虽亦有关于卫生及养心之说明，然皆甚略。先生此书，说机体生活及精神生活，占全书三分之一，以先生所治者为科学的哲学，与悬想哲学家当然不同也。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无不以折衷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②

除了编辑出版教科书外，博学勤勉的杜亚泉还参加了几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工具书的编纂。商务印书馆的旧版《辞源》有繁多的理科词汇，这些理科条目的写定、释义，都是由他和理化部的同仁所做，从而结束我国除《尔雅》外辞书只有“字书”的历史，开创了理化词汇释义之先河。如“水”字，我国从东汉《说文解字》开始一直解释为“水，准也”，直到编纂《辞源》时，杜

①杜亚泉著，田建业校《杜亚泉著作两种》，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②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亚泉才给予了科学的释义：“水，氢气氧气化合之液体，无色无臭。摄氏表百度则沸，冷至零度凝为冰。”^①他主编的《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更是“科学界空前巨著”^②。前者由杜亚泉及“共事者十数人，费时十余年”而成，被蔡元培称为“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③。后者融汇了古今中外动物学的科学知识，有著名动物学家的肖像、各种逼真形象的动物彩图、动物分布图、巨量的动物术语图解、地质系统及年代之对记表、动物学分类上之条目等，较好地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这两部大辞典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学及出版水平的突破和提高。直至今日，它们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此可知，杜亚泉以编辑教科书、传播科学为职志，成绩卓著，影响巨大。这些科学用书的畅销，不仅使商务印书馆成为20世纪初普及和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满足了当时学校教育对自然教科书的迫切需求，推动了科学教育的发展。正如当时《申报》主编张梓生指出的那样，“当民国初元之时，国内科学教育渐见发展，所借以为推进之工具者，杜亚泉先生所编各种理化博物教科书，其重要者也”。^④

编辑期刊，推动科学宣传

编办新式学术期刊是杜亚泉进行自然科学教育的另一重要途径。

1900年11月，由亚泉学馆出版、杜亚泉任主编的《亚泉杂志》（半月刊）创刊。“亚泉”之意，杜氏自谓：“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原素，线则在几何学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⑤《亚泉杂志》为半月刊，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八日（1900年11月29日）在上海创刊，亚泉学馆出版、发行，商务印书馆印刷、铅印，每月初八及二十三日出刊，是中国人自办的较早的自然科学杂志，为我国最早的科学期刊。内容多译自日文书刊，辟有论述、答问、科学消息、理科新书目等栏目，包括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和地学等学科，尤以化学内容丰富新颖。次年6月9日出版至第10册停刊。

杜亚泉想借此引起国人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兴办科技实业，进而达到富强国家之目的。他在发刊词中说：“今世界之公言曰，二十世纪者，工艺时代。吾恐我国之人，器器然争进于一国之中，而忽争存于万国之实也。苟使职业兴而社会富，此外皆不足忧。文明福

①《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②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③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

④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

⑤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泽，乃富强后自然之趋势。”^①该刊每期均有算题问答、化学问题、微积问答、质学问题等栏目，刊登的文章以化学方面为多。值得注意的是，《亚泉杂志》在我国第一次介绍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介绍当时新发现的化学元素如氩、氦、镭、钋等，发表了很多科学知识在生活中应用的科普短文，如《显影药水新法》、《自来水工业》、《防腐及贮藏法》等，还刊登破除迷信、普及卫生的文章，如《化学奇观》、《食物标准及食物各质化分表》等。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早期科学特别是化学的发展，并通过科普常识的点滴教育，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懂科学、爱科学。

因名称易与日本人所办的《亚东杂志》混同，《亚泉杂志》于1901年9月更名为《普通学报》，仍以宣传科学为主，兼载时事政治，设有经学科（含心理、伦理、政法、宗教、哲学）、史学科（含中外历史、地理）、文学科（含文典、修辞、诗歌、小说）、算学科（含数学、几何、代数、三角）、格致学科（含地学、化学）、博物科（矿物、动物、生理、卫生）、外国语学科、学务杂志（含学校教科章程、新图书评论、海外留学生通讯）等栏目，宣传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数理化、地质学、动植物学等学科知识。杜亚泉在该刊发表了《级数求和》、《有机物原质之鉴别法》、《心理学略述》、《岩山纪要》等文

章，通俗易懂，具有实用价值，引起人们的兴趣。1902年，普通学书室又发行月刊《中外算报》，它是20世纪初我国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对当时我国数学教育和研究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1903年3月，上海科学仪器馆创办旨在“发明科学基础实业，使吾民之知识技能日益增进”^②的自然科学杂志《科学世界》。杜亚泉的普通学书室承担了该刊的发行任务，他本人是重要的撰稿者。《科学世界》在1903年至1904年间发行12期后停刊，1921年7月复刊，至1922年7月出5期后最终停刊，前后共出版17期。《科学世界》是中国人所办的第一份纯粹科学杂志，其办刊理念为“输高尚之理想于我国民”；其办刊思想为“人非挫折不名，是非困难不成，纪其经历，皆师资也”^③，即通过刊物，树立一批历经挫折和磨难并取得成就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作为“师资”，激励国人^④；其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栏目的编辑原则为“有推理，有归纳，皆以上穷天巧求原则也”^⑤；其编辑原则“提要钩无”、“不关科学者不录”^⑥，奠定了近世科学技术期刊最基本的两大原则，即现在所说的创新性质和科学性质的两大特性，显示了清末国人办刊的新理念。杜亚泉在所写文章中常常感叹我国科学落后，希望研究之风盛行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他在《普通植物学教科

①《亚泉杂志》序。

②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科学世界简章》，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③④⑤⑥《中国期刊年鉴》编辑部编辑《中国期刊年鉴》2003~2004。



书序》中写道：“吾国植物学中，可谓黑暗已极，若吾辈欲将此黑暗者光明之，则当有千百之植物学家散布各地，苦心搜讨，联合学会，罗致书器，广费资财，延扩时日，始能胜任如此盛举。……吾不知悠久无极之时间中有无可以副吾辈希望之一日。吾尝设想至是，吾心急迫悚惧不可言状，吾辈同志或亦闻此言而具同情。”^①

1911~1919年，杜亚泉兼任《东方杂志》主编。《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是旧中国寿命最长的一份杂志，也是商务期刊方阵中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恢弘博大的《东方杂志》历经清末至民国各个历史关口，跨越了中国近现代两个历史时期。在它存世的近半个世纪里，战争不断的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各种政治势力在国内斗争交错，新旧文化思想碰撞激烈。从20世纪初创刊，到1948年12月终刊，中间除了辛亥革命、“一·二八”事变等特殊时期几度休刊外，《东方杂志》竟绵延逶迤达44年之久。历任主编有徐珂、孟森、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等多人。不知有多少高手名家在上面高谈阔论过，不知有多少编辑记者在上面默默耕耘过。那么多年来，《东方杂志》始终以启导国民为宗旨，寻求民族出路为重，致力于开启民智、联络东亚，努力介绍知识和传播文化。当时国内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无

一不在上面留下脚印，近现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上面轮番上演，几乎是全景式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现代史，堪称半个世纪中国的缩影。

《东方杂志》在创刊初期，仅汇编报章论文和介绍国内外时事。杜亚泉主持笔政时，适辛亥革命方兴，但政治并不清明，封建军阀势力的割据，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腐朽的封建意识与资本主义思想交织熏染，使社会精神道德日益衰败，人们思想极为混乱。当时我国爱国的有志之士，政治意识和求知欲望正日益发展，杜亚泉也深感需要有一种工具“以救国人知识之饥荒”，并加以“诱导”。正在此时，商务印书馆为刷新《东方杂志》，聘杜亚泉兼任主编。这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他一方面对《东方杂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自己笔耕不辍。他将该刊改为大本，加插图，扩充栏目，“撰著不染政党色彩，纯以学理国情为根据之政治论文，更详述世界大势，翻译东西名著以救国人知识之饥荒”^②，从而使之成为民初国内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政论学术性综合杂志。《东方杂志》在这九年中，每期都刊登了为数不少的科普文章：有关科技哲学的有《宇宙连续论》、《佛教与科学》、《宇宙之大观》等；有关介绍科技发明发现的有《空中飞行器之略说》、《动物与催眠术》、《干电池之制造法》、《一九一九年万国化学原子量表》、《雷铤及其效用》、

^①杜亚泉《普通植物学教科书序·科学世界》。

^②张梓生著《悼杜亚泉先生》。



《说时针》、《液体空气》、《美国无线电之改良》、《陶瓷器之电镀法及其价值》等；有关科技应用的有《空中战术》、《南极探险之效果》、《煤油之新用途》等；有关气象矿产工程的有《地震之研究》、《最近世界石油产额之变化》、《中国西部植物志》、《巴拿马运河工程纪》、《津浦铁道之黄河大铁桥》等；有关心理医药卫生的有《笑之研究》、《梦之研究》、《各国之红十字事业》、《论鲜果之滋补力》、《土葬与公共卫生》、《鼠疫之预防及看护法》、《卫生之研究》等。每期还有不少的科技插图，如《人造之目光》、《最近之世界大飞行家》、《镭锭之研究》、《最新式之黎盎水雷》、《英德之空中战争》、《驾救伤车妇女整理机件图》、《意大利地震后之惨象》、《巴拿马运河之工程》、《甘肃壮族黄河铁桥》、《万国鼠疫研究会开会摄影》等。此外，该刊“科学杂俎”栏目专门刊登短小的科普文章，如《蚁力可敬》、《发光之蛙及蟹》、《英人之食牛量》等；“内外时报”栏目也选录大量的科普文摘，如《金鱼之特种》、《运送火车之船》、《近代制纸法之变迁》、《晕船之原因》、《自流井产盐状况》等；“理想（科幻）小说”栏目刊有《新飞艇》、《元素大会》等。杜亚泉本人在《东方杂志》曾发表过《理科小识》、《食物

之养生法》、《镭锭发明者居里夫人小传》等文稿，撰写了《食物与卫生》、《镭锭》两本科学著述。该刊自创办起，每年为1卷，在杜亚泉主持的第8至16卷，刊载的科技图文颇多。

值得注意的是，杜亚泉经常从自己丰富的自然科学素养出发发表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如在《等差法》一文中以数学的等差级数来分析东西方利己与利他的伦理观，新颖独到，颇有见地。他还在其他杂志上就新旧思想、中西医学等问题展开辩论，提出“夫学术者在于实事求是，本无国界可言，安有中西之别？融会而贯通之，实为现今学者之责任”。^①

杜亚泉主张走温和、渐进的调适路线，采取稳健的科学救国道路，虽然与那个激进、动荡的时代有些不合，但在当时仍然产生了不小的积极影响。杜亚泉的一生，印证了他自己的一句诗，即“鞠躬尽瘁寻常事，动植犹然而况人”。他以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为重，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并通过多途径、多手段，科学、广泛地进行宣传和普及，对于今天具体贯彻和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启发颇多。他所从事的科学教育不仅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更注重科学方法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有助于我们克服当今片面强调知识等弊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①杜亚泉著《中西验方新编叙言》。



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民族英雄——姚长子



□ 应志铨

明末清初的绍兴先贤张岱，被公认为明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与徐渭同被誉为明代绍兴的两大才子。

张岱著述虽多，却很少写墓志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余平生不喜作诌墓文”。在张岱的《琅嬛文集》中，只有四篇墓志铭，其中还有一篇是为自己写的《自为墓志铭》。可是，张岱却偏偏为一个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雇农，写下了一篇墓志铭——《姚长子墓志铭》，铭曰：

姚长子者，山阴王氏佣也。嘉靖间，倭寇绍兴，由诸暨掩至鉴湖铺。长子方踞稻床打稻，见倭至，持稻叉与斗。被擒，以藤贯其肩，嘱长子曰：“引至舟山放依。”长子误以为吴氏之州山也。道柯山，逾柯岭，至化人坛。自计曰：“化人坛四面皆水，断前后两桥，则死地矣，盍诱倭入？”乃私语乡人曰：“吾诱贼入化人坛矣，若辈亟往断前桥，俟倭过，即断后桥，则倭可擒矣。”及抵化人坛，前后桥断，倭不得去，乃寸齧姚长子，筑土城自卫。困之数日，饥甚。我兵穴舟室榭以诱之。倭夜窃舟为走计，至中流，掣所室舟沉，四合蹙之，百三十人尽歼焉。乡人义姚长子，裹其所磔肉齏，葬于钟堰之寿家岸。

无主后者，终为牛羊践踏之墟，邻农且日去一锄，其不为田塍道路者几希矣。余为立石清界，因作铭曰：

醢一人，醢百三十人，功不足以齿；醢一人，活几千万人，功那得不



思。仓卒之际，救死不暇，乃欲全桑梓之乡；旌义之后，公道大著，乃不欲存盈尺之土。悲夫！

姚长子是什么人，使得张岱如此尊重呢？

绍兴至柯桥的104国道旁，一处小渚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距绍兴县革命烈士陵园仅一二里路之遥。纪念碑上的铭文为“姚先烈绝倭纪念碑”，也称姚长子纪念碑。纪念碑立于1947年6月，现为绍兴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梅堂老人的《越中杂识》和《绍兴县志》等记载：姚先烈，柯桥独山村人，为人作佣，名不详，因身材高大，故人称长子。明嘉靖年间，倭寇猖獗，时在沿海掳掠。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一伙倭寇由诸暨流窜至绍兴柯桥，想经舟山往海上逃逸。姚长子正在

田畝打稻脱谷，见寇至即持稻叉只身与倭寇拚死搏斗，因寡不敌众被擒。倭寇“以藤贯其肩，迫其向导”，姚长子佯装带路，把倭寇引入四面环水的化人坛。化人坛乃是柯桥的一个洲渚，只有南北两桥相通。此时，长子又以倭寇听不懂的当地方言密嘱村人：“等我引寇进入绝境，速拆断两桥，我死无恨！”村人照嘱，断敌归路。倭寇中计后，怒而用刀将其剁成肉浆。官兵和村民赶到，全歼被围的倭寇200（张岱写的墓志铭中一说130）余人。乡人为纪念姚长子，将“化人坛”改名“绝倭涂”，将南北两桥命名为“得胜桥”和“万安桥”，并在殉难处建纪念祠。

明末文学家张岱深深地为姚长子的壮举所震撼，特地为姚长子撰写了墓志铭，在《姚长子墓志铭》中，他为姚长子这位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计歼倭寇



百三十人，解救全乡百姓于劫难的佣仆树碑立传，赞颂其风节功绩：“醢一人，活几千万人，功那得不思？仓卒存之际，救死不暇，乃欲全桑梓之乡。”然而，“旌义之后，公道大著，乃不欲存盈尺之土。”姚长子的墓早已被“牛羊践踏”、“邻农去锄”而不存。

前些日子笔者又一次去寻访姚先烈纪念碑，看到周围环境比以前好了许多，政府有关部门在纪念碑四周做了石围栏，种了绿化，纪念祠也作了整修，周围100米范围明确作为保护处的建设控制地带。只是“姚先烈绝倭纪念碑”正面下方“明姚烈士遗象”已模糊难认，而背面记录姚公绝倭事迹的铭文更是风化不辩。

笔者认为，保护好、宣传好这一文物古迹，对于弘扬民族正气，具有莫大的意义。可惜的是，姚先烈的事迹，恐怕少有人知道。笔者在当地问了几个年轻人，他们竟然不知道姚长子纪念碑在什么位置。笔者也问了在纪念碑旁边田间劳作的一个老农，这座纪念碑纪念的人是谁，他也仅仅知道这是一个好人，说不上更多的道道了。

远在陕西的逍遥先生在网上知道姚先烈的事迹以后，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了一阙《金缕曲》：“千古姚先烈！仰

高碑、石栏幽穆，镜波冷冽。遗像模糊铭漫漶，谁识当年奇节？绝倭事、乡人难说。岁月承平诚堪恋，肯相忘化碧英雄血。青史在，凭披阅。人称长子真豪杰。看持叉、只身搏敌，鬼惊神慑。藤贯其肩佯带路，洲渚双桥呼挾。战得胜、万安传捷！成醢一人全桑梓，纵无名、毅魄光瓯越。钓岛恨，几时雪！”笔者也深为所感，附骥一阙：“草莽成英烈。赞姚公，无双智勇，义忠香冽。甘醢一人全桑梓，取义唯重气节。英雄事，后人评说。倭敌持叉相搏斗，怎忍看、涂炭乡邻血。丰绩在，长胜阅。悔堂慧眼钟英杰。纵无名，浩气冲天，敌酋胆慑。东海而今波不平，狼子野心挝挾。盼劲旅，齐鸣军捷。佑我中华山河壮，送春风、凯奏扬吾越。多少耻，一朝雪！”（金缕曲·赞姚先烈并奉和逍遥先生）

姚先烈，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民族英雄。

姚先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雇农，虽无名而更显英雄本色。而且是一个集勇（只身持稻叉与倭寇斗）、智（密嘱村人断前后二桥）、忠（忠于国家，心存民族大义）、义（为救村人而“我死无恨”）于一身的民族英雄。他是绍兴的骄傲，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